关于清除党内
右派分子的决定彙編

第五冊

（上）

Collection of the decisions concerning the purge of the Rightists within the Party

Volume 5

(A)

关于清除党内
右派分子的决定彙編

（五）

（党內文件·注意保存）

中共中央监察委員会办公厅編

出版說明

这本小册子里，选編了八十七件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党籍的决定和决議，仅供县委以上党委和有关党員幹部閱。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目 录

中共西藏工委扩大会議关于开除反党集团头子范明的党籍和軍籍的决議（摘要）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三日）

范明，四十四岁，陕西临潼人，家庭出身地主，个人成份学生，大学肄业，一九三七年参加革命，一九三八年在伪三十八軍入党。

范明自任西藏工委副書記以来，对中央規定的关于西藏工作的全部重大方针、政策，都另搞一套，和中央、工委对立起来。为了实現其反党野心，在党內、外培植私人势力，进行派别活动和分裂党的罪恶活动。

几年来范明一貫地进行反党活动，特别是一九五六年六至十月間，利用委托他主持工委工作的机会，篡夺了工委的領导，“独霸工委，上抗中央，下压群众”，制造所謂改革形势，提出改革成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在西藏工作的各个方面进行“大發展”。但是实質上范明的所謂改革是投降主义的，是用这种改革为他的反党活动創造政治資本，以实現其反党野心家的目的。在这一期間，不論在党的工作上、政治上和經济上都受到了極其严重的損失。

虽然几年来中央不断地对范明进行了教育（如一九五四年西藏工作討論会議，“九四”指示，一九五七年三月政治局会議，等等），工委也經常地对范明进行了帮助、教育和斗爭，即使在一九五六年在实行他的“大發展”的五个月內，党的許多組織和党員也在許多重大問題上对范明进行了抵抗和斗爭。但范明始終

堅持其反党立場毫无悔过之心；繼續用阳奉阴违的两面派态度，更猖狂地进行反党活动，並且把他对党的滿腔仇恨和他的資产阶級个人野心家的政治、組織观点，写成一个徹头徹尾反党的"新西遊記"小說提綱。范明反党阴謀活动的全面大暴露，就是从揭發"新西遊記"小說提綱开始的。

經过幹部会議一百多天的揭露和查証，大量的事实証明，范明八年来的反党活动是多方面的、始終一貫的，其反党罪恶的主要事实如下：

一、反对目前党在西藏的反帝爱国統一战綫方針。他反对中央以反帝爱国作为划分上層人士左、中、右政治态度的标准，說这是"主观主义的、片面的、沒有根基的"；並提出所謂"爱国、团結、进步"的标准，和中央相对抗。

二、范明一貫地反对党在西藏的財經方針。一九五一年他坚决反对經过西南局批准的"統一物資、統一採購、統一供应"的方針。当时工委負責同志为了照顧团結，迁就范明的意見，同意在統一政策之下，另外成立一个採購分处，負責独支人員所需日用品的採購工作。尽管如此，范明还是另搞一套，破坏了上述的統一方針。在物資上把中央拨給工委的财产当成私有財产，迟迟不交給工委的財政机关；在採購上抬高物价，搶購物資，反对中央当时对藏鈔採取"不理、不問"的方針，公开支持藏鈔；在供应上另搞一套供应标准。主张發展西藏的資本主义，用"我們出錢出力，他們（指貴族、上層——註）得名得利"的办法，"无形中發展了資本主义，削弱了封建社会基础"。一九五六年利用他主持工委工作的机会，把財政方針由供給財政轉为建設財政。"要全党各业各行都要学会花錢"，"錢花不完要打屁股"。破坏統一採購的原則，准許各单位自行採購內貨、外貨，並且准許以領代报。由于"大發展"和因为"大發展"而来的"大收縮"，給国家造成了一亿元以上的巨大浪費。

三、在青年工作的指导上發展青年主义、民族主义，培植与

支持团工委成为反党的“独立王国”。他提出与党的反帝爱国相对立的“民族青年統一战綫方針”，强调“西藏青年負荷量很大……由于西藏落后，沒有自己的工人阶級，西藏青年担負着一部分工人阶級的作用”。一九五七年四月六日向中央团校的藏族学員大談革命不能輸出，“革命这件事是不能輸出的”，要依靠“革命自己內部的力量，才能去完成……好象中国革命成功，只有依靠中国人自己起来革命”。誣蔑我党我軍解放西藏藏族人民是輸出革命。支持与袒护团工委以团代党，拒絕工委各部門与財政机关的检查，使团工委成为横行霸道，人人側目的“独立王国”。

四、在对敌斗争上反对中央公安部的指示，誣蔑中央公安部是“取消主义”。

五、在西藏幹校的教育方針上，他强調幹校是“革命与反革命斗爭的雛形”，要他們用两面手法搞阶級教育，用發动与組織学員訴苦等办法，来破坏当时統一战綫的方針。

六、一九五六年下半年把西藏日报变成他的反党工具。宣传他的反党的政治观点，如：西藏进入了改革的新阶段；改革形势的形成；“政教昌隆”；批評工委是“保守主义”，等等。夸大个人作用，提倡对他的个人崇拜。如一九五六年九月一日报紙在刊出范明关于大力培养藏族幹部、發展藏族党員的报告时，地位显著，全文都用老五号楷体，接着很多消息都提到“学習了范明同志的报告，克服了大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九日西藏佛协分会成立的报导中說：“范明同志的講話，一次又一次的被热烈的掌声打断了，講話結束时全場报以經久不息的掌声”。（这篇报导是范明审查过的）。利用报紙，打击好人，包庇坏人。如打击周川萍和周所領导的拉薩建筑工程处，包庇开汽車軋死人的罪犯赵洪袠，压制群众对团工委严重揮霍浪費現象的揭發与批評，等等。

七、“大發展”。一九五六年利用委託他主持工委工作的

机会，假借改革之名，为他的反党活动創造政治資本，以实现其政治野心家的目的。他用歪曲中央指示和工委决定的手法，利用幹部的革命热情，在西藏工作的各个方面进行"大發展"。說西藏"已經进入了一个可能进行和必須进行民主改革的新阶段"，"西藏需要进行民主改革和必須进行民主改革的呼声，已經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呼声。西藏統治阶級已經在表面上不能也不敢不拥护、贊成，甚至連反革命分子也沒有人敢于公开表示不贊成"。强調他的所謂改革要成为一切工作的中心，所有宣传、統战、組織、公安、青年、妇女、財經等各方面工作都要围繞这个中心。把仅供中央参考，未經中央批准的西藏地区五年工作規划作为他增設机构、增加人員、进行大發展的行动計划。

为了乞求上層同意他的所謂改革，他的賄买政策是：不問政治情况，"无一遺漏"地予以安排，大量送錢，不管收获；只强調安排、照顧、封官、送錢，不强調教育、改造。他的宗教政策是："發展宗教"，"政教昌隆"，"共产党永远不会反对宗教的，因为共产党永远不会反对人民，所以是永远不会反对宗教的"；"喇嘛是西藏的知識分子，是将来幹部的源泉"；成立喇嘛班是"宗教上的大革命"；在改革前先将喇嘛养起来，"衣食住行包下来，就是充分的政治"。說"西藏工委、西藏軍区"是在"英明的領袖""达賴喇嘛……的直接領导下"；地方政府的僧俗官員是"和广大群众有密切联系的和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經驗的本民族幹部"。利用他代理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第二副主任的机会，开了十七次常务会，通过决議四十七項，这些决議主要是进行他的所謂民主改革的各項准备工作，实际上把自治区筹委会变成了推行他反对党的現行政策的反党活动的合法工具。

八、他一直反对中央的方針。一九五七年三月，范明为了給自己的"大發展"进行辯护，在三月二十二日給中央並主席的信中，公开地猖狂地反党反中央。一九五七年五月之后，在中央严

格規定的編制方案和工委其他同志的监督下，一方面他不得不被迫地参与执行"减戶、减口"的工作；另一方面却不仅保留他原有的全部的反党观点，並在許多重大問題上繼續进行其反党活动。如私自在对內对外的会議上宣传改革准备工作，規定政协的六大任务，提出西藏右派的五条标准，等等。

九、他誣蔑党，企圖改变党的性質。他培养藏族幹部的路綫是："不要在阶級成份上打圈子"，"除个别人外，一律不准查政治、查历史……只要沒有現行活动，一概不追究"。"西藏所有的官員、貴族及其子弟，商人及其子弟，广大的农牧民，相当一部分知識分子都是幹部来源"。

他强調藏族幹部"本身带着天然的馬列主义"，强調發展党員不能"忽視了在中上層、貴族中吸收培养"，說上層的作用大，"他們都富有社会經驗"，在群众中有威信，可以吸收入党。方針是："全党全軍人人动手"，"改变这种手工业生产的方式而採取机器生产的方式"，"大胆地、大量地、正确地……發展藏族党員"。为此还誣蔑"工委本身存在着严重的保守主义，大民族主义和宗派主义"。說"自己当兒媳黑婆婆虐待兒媳，自己当婆婆也虐待兒媳"。

他把工委的負責幹部分成三类，只有他和白云峯等是忠心耿耿为党工作的，其他同志都是吃閑飯的，並且反动地叫囂"应該清党"。

十、他反对中央对西藏所有的重大方針政策，誣蔑中央和中央的負責同志。中央对西藏採取和平統一的方針，范明就主张分治。对中央各部一些不符合他的意見的指示，採取干脆打回去的办法。如一九五六年中央公安部不同意工委社会部全部併入筹委公安处，和經中央同意的中央监委对赵洪蒙案件的决定等。

他誣蔑中央对高崗的处理有宗派。他說："高崗可以将功折罪"。說"孙作宾定为右派是与高崗問題有关的"。在他看来到处都有宗派。

十一、他一貫地破坏工委的統一領导，污蔑和丑化工委的負責同志，企圖篡夺工委的領导权。不滿意現在几个书記名字的排列次序，曾經質問"张（經武）、张（国华）、譚（冠三）、范（明）"这样的排列次序是誰規定的。他說："經武是主席办公厅主任，是中央代表兼書記"，經常不在西藏；"国华是司令員兼書記"；"冠三是政委兼書記，又分工主管軍区工作"；把仁山看成是平級中的下級，而且到西藏不久；只有他是"書記兼軍区副政委"。他为了达到"当西藏的家"的目的，用一切捏造、誣蔑的办法激烈地反对国华同志。一九五六年六至十月，他利用經武、国华离藏，中央委托他主持西藏工作的机会，"独霸工委、上抗中央、下压群众"，利用工委組織实現他反党的資产阶級个人野心家的政治、組織路綫。他对中央的电話、电报指示和当时在京的經武、国华同志所提的意見，一概置之不理，他对分工委和工委部門对他的作法进行的抵抗和斗爭，都給以压制和打击。

范明一貫地破坏工委的統一領导，他避开工委用做报告、参加会議、私自召集会議和个别談話等方式，私自按他自己的一套去传达、布置，有时用造成事实的办法把他已經講过了的講話記录交給書記处处理，强迫签字。尽管这个記录已經他审閱过、修改过，仍然要照样写上："本文未經本人审閱，如有錯誤由記录負責。"

十二、包庇坏人，包庇反革命，打击好人。原西北西藏工委的組成人員是極端复杂的，除从西北地区党、政、軍系統一〇四个单位抽調和在西安招收来的一部分人員之外，当时在一野政治部联絡部做客的、在共和公司工作的伪軍政人員（未經审查）也基本上全部随軍来藏。仅据这次会議中查对，当时随范明进藏的旧人員和有政治、历史問題的人即达一百一十三人之多。其中：伪校以上軍官三十，伪尉以上軍官四十二，反动党团骨幹分子十一，伪政府官員二，有政治历史問題的分子二十八。这些人員

中，从三青团員、国民党員到国民党省党部書記长（国民党青海省党部書記长薛文波），从国民党軍队的排、連长到师长，其中軍需人員特别多。范明不仅对工委說：这些人都是經过审查的，刷下去几百人，旧人員也是經西北局批准的，他沒有带一个私人。而且对他們異常重用，早在进藏之前，在甘肃、青海、宁夏、綏远等地，負責筹备进藏物資的（如騾馬購买、物資購置等）全部是这些人。在三反中由于范明的包庇，这些掌握过經济大权的人都安全地过了关。

这些伪軍政人員、反动分子都是范明、白云峰的所謂統战幹部，特别是那些"官"比較大的，进藏后都分配担任了比較重要的領导职务，一九五三年工委精簡清洗之后，其中的一些人又由范明、白云峰介紹到青管局工作。范明还誣蔑工委精簡这些人是政策上犯了錯誤。

一九五七年整編时，他为了保存亲信，叫白云峰从各单位指名調出三十多人，其中多数是政治、历史不清的旧人員，介紹去青藏公路管理局工作。

范明对于坏分子、反革命分子关怀备至，但对于在工作中、运动中（三反、肃反、整風等）对他提过意見的，对他的"据点"、宗派成員有意見的，"不順手"的，一律給予打击。

十三、在党内划圈圈，搞宗派，进行蜘蛛网式的宗派活动，分裂党的团結和統一。范明在入藏途中，就有宗派活动，当时的西北西藏工委就有联絡部派、临潼派、三十八軍（伪三十八軍）派、鉄路派等亲、疏、厚、薄之分。入藏之后，把西北进藏幹部作为他的資本，制造所謂西南、西北不团結的問題，来分裂党和破坏党的团結和統一。

范明"自認为是西北幹部的头头"，他在选举"八大"代表时說："如果不选我当代表，对西北幹部是会有影响的"。"八大"开会前，国华同志根据会議规定，建議去一个列席的，並具体提出白云峰，范对白說："国华因我不能出席，所以才讓你代

表我”。他把和他有关的或者过去曾經有关的人、单位、地区都划在圈里；反之，就划在圈外。圈里的亲近、重用；圈外的排斥、打击，实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政策。他不仅在西藏划圈圈，而且还把宗派圈圈划到中央負責同志的头上。

为了实現他的反党野心，范明把党的某些組織和部門看成是他的据点。当作他的据点的有工委組織部（整編前）、团工委，看成他的据点的有青藏公路管理局、日喀則分工委。同时还在某些机关安置亲信作为耳目，收集“情报”。为了在实現其反党路綫时减少阻力，还以白云峰为核心，拉攏陈竞波（工委委員，統战部长）、夏仲远（工委委員、財委書記），組成了他的組織、統战、財經的“三关口”。据点不容許別人插手，老虎的屁股摸不得，否則就是別人“鬧宗派”，他上書邓小平总書記，大声疾呼：“現在西藏党內……鬧宗派和不团結的傾向又开始大大地滋长”的主要原因，就是白云峰当不成組織部长，梁枫当团工委副書記还有人反对。他把党看成股分公司，李林初是大革命后的脫党分子（范的老师），一九四八年八月重新入党，进藏后由于范明的堅持提为工委宣传部第一副部长；梁枫入藏前是兰州一个中学的教导主任，一下提为团西藏工委的副書記。

范明为了扩大宗派势力，採用各种办法，如周末聚餐会、請客吃飯、逛林卡、打麻将和提倡生活問題可以随便些，“男女都可以有情人”，和女同志拉拉扯扯等庸俗手段，来联絡感情，引人上勾。只要听話，相信范明，拥护范明，他可以封官許願。一九五六年他对白云峰、陈竞波、夏仲远說：“你們現在虽然还不是工委委員，但要起工委委員的作用，你們的工委委員問題，不久就可以解决。”玩弄手法把曾实提为工委办公厅副主任。暗示刘士元可以升为統战部副部长，准备提拔付生做統战部副部长或外事处副处长、或分工委副書記。他关怀他的宗派成員，为他們爭名、爭利。給白云峰爭工委委員，要他身兼掌握西藏交通命脈——青藏公路，和培养西藏革命幹部——西藏公学的“两大任

务”，“进可攻——反党，退可守——独立王国”（白云峰語），待机“二返长安”。給梁枫爭团中央委員（一九五四年），爭团工委書記，还想讓她代替白云峰当組織部副部长，当西藏团校校长。

他利用宗派成員互相串通联絡，交換与传遞情况，来宣传其反党观点，用誣蔑、捏造，散播流言蜚語等卑鄙手段来誅除異己，陷害好人。

十四、写出了徹头徹尾的反党綱領——“新西游記”小說提綱。这个提綱系統地集中地表現了他的反党面目。在“丙、解放后的西藏”的全部六十条材料中，有五十条是歪曲、捏造的。他一开始就“打算把这个作品作为揚雄的太玄法言……压根兒沒有想掩盖冲突，掩盖矛盾，避开权貴，”实現他“死以前把人罵完”的誓言，准备这个作品象太玄法言一样，在他死后的若干年才被人刊印、流传。为了写这部小說形成了以范明为首的有吳健礼、黄琳、李宗清参加的所謂“四君子协定”，提出了“保密”，“不当逃兵”的要求。这里应該指出：李宗清同志在抄写提綱时，發現其中有問題，並且在幹部会議开始后就勇敢地予以揭發，是正确的，是应該表揚的。約四万字的“新西游記”小說提綱，是个徹头徹尾的反党綱領，反对党的民族平等、团結、合作政策。組織上丑化党，丑化党的領导，丑化党的幹部，美化自己，美化自己的亲信，美化自己的姘头。范明为了写他的反党的“新西游記”小說，未經工委領导同志任何人的許可，利用职权私自調走工委办公厅、統战部、研究室和軍区的絕密、机密文件、資料三百份，将其中二百五十一份带到西安交給工委西安办事处的一个旧人員保管。

十五、品質作風極端恶劣。生活上鋪張浪費，十分講究闊气、排場，爭汽車好坏，爭房子大小，爭走路先后，爭座位上下，凡是有关个人享受、出头露面的事情都要爭。道德敗坏，長期与黄×通奸，黄怀孕后还說“孩子是×××的”，由白云峰出

面責成已与黄×断絕恋愛关系的×××进行检討，黄×結婚后，还繼續与她通奸。此外，还企圖强奸某女幹部，因被拒絕，就說該女幹部有政治問題，予以陷害。

上述事实說明：范明的反党活动不仅是多方面的，而且是一貫的，他是有目的、有綱領、有組織的反党集团的头子，徹头徹尾反党、分裂党的極右分子。

范明所以墮落成为資产阶級政治野心家、反党反人民的右派分子，是有他长期的历史和思想根源的。他生于沒落的地主家庭，从很早起就具有强烈的沒落地主資产阶級的个人主义思想。参加革命后，虽然党对他不断地进行了批評、教育和斗爭，但他始終沒有放棄其地主資产阶級的反动立場，和認眞批判与改造其資产阶級个人主义的丑恶思想。因此，随着革命形势的發展，他的个人权力欲望和政治野心日益增长起来。把成績記在自己賬上，錯誤与挫折推到党和其他同志的头上。夸大个人的作用，吹噓个人的成績，打击別人，抬高自己。他为了实現其政治野心，必然和一些党性不純、臭味相投、有个人野心的分子結合起来，进行派別活动，破坏与分裂党的团結与統一，成为反党集团头头，走上了反党反人民的罪恶道路。范明的政治野心家的面貌的完全暴露，絕不是偶然的，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时期，无产阶級与資产阶級两条道路展开尖銳斗爭的形势下的必然發展結果。

整个会議过程，范明的态度始終是極端恶劣的。在大量的事实面前，狡辯、抵賴，抗拒交代。經过一百〇四天大会、小会的揭發，逐条查証和批判之后，还在最后的交代中說："我的反党事实虽然鉄証如山，但思想动机上沒有反党的影子"。

根据范明上述罪恶事实，工委决定：开除范明的党籍和军籍；建議撤銷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員会常务委員等一切职务；收回国家和人民所給予他的勛章、奖状等一切荣誉品。

中共西藏工委扩大会議关于开除反党分子白云峰的党籍的决議（摘要）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日）

白云峰，四十三岁，陕西韓城人，家庭出身富裕中农，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三二年入党。工委委員，历任西藏工委組織部副部长，系直屬党委書記，团西藏工委書記，自治区筹委財政处处长。现任青藏公路交通运輸管理局副局长、党委第二書記和西藏公学副校长、党委書記。

白云峰是范明反党集团的"次帅"和"軍师"。其主要反党罪恶事实如下：

一、从一九五二年范明反对中央对西藏的和平統一的方針，主张採取"先分治而后統一"的方針开始，六年来白云峰的政治观点、路綫和范明反党的政治观点、路綫是完全一致的。他把范明作为他取得各种地位的"靠山"，对范明的私話奉如聖旨，对中央、工委的重要指示长期地一貫地採取抵抗态度。他反对中央以反帝、爱国作为划分上层人士左、中、右的政治态度的标准，他和范明一样也主张不提反帝而以爱国、团結、进步作为划分政治态度的标准，他說："团結，主要指与汉族的团結；进步，主要是贊成改革，否則就談不上进步。有这两条才是真正的爱国"。他誣蔑党的統战政策，攻击謾罵我們在西藏几年来的工作。

一九五二年他积極提供意見，协助范明写出反党反中央的"关于目前西藏地区統一战綫工作中几个策略問題"，並建議范不要用个人名义，要用統战部名义提交工委。一九五六年范明搞

"大發展"时，白为范出謀策划，提出"必須由过去的供給財政轉为建設財政"，"反对保守思想，必須把預算花出去"，"过去的編制受財政限制，今后編制不受財政限制"，"过去編制为財政服务，現在为工作需要（指"大發展"）服务"。在幹部来源上，提出在藏工作的幹部，可以介紹其子弟（包括其亲朋故旧）来藏参加工作；在發展藏族党員上，提出預备党員可以作介紹人，提出發展党員的"速成法"和"党外培养的时間短，党內培养的时間长"等办法（即馬馬虎虎吸收进来再培养——注）；在团的工作上發展青年主义，培养与支持团工委成为"独立王国"；在中央批准在藏族青年中建团以前，他和范明、梁枫合謀發展"团友"，並說"不讓發展团，我發展团友"；在"大發展"时，只要团工委提出来，要啥給啥。为了保証团的系統能够隨便花錢，在工作需要的借口下，还叫团工委、財政处联署頒發了一个破坏財政制度的关于团的系統經費开支的单行規定。

一九五六年他在北京了解了中央"九四"指示的精神之后，仍向参加八大会議的四川負責同志提出：要在四川"招收一些学生"，同时未經任何請示，告訴派到福建、广东的招生組，把招的学生送到西安。一九五七年四、五月間，在"工委忙于收縮"工作时，他私自批准了实質上是反对收縮、繼續进行"大發展"的团工委一九五七年的工作計划。在实行中央的"六年不改，适当收縮"方針之后，他对中央决定的政策極为不滿，当他受工委委托在后方办事处主任会議上传达这次会議的精神时，他批評經武同志根据中央指示对西藏局势所作的發言，传达了范明的歪曲、捏造的西藏情況介紹。（工委有决定，范明所談的情況不准下达）並对他的亲信說："范書記在这次会上，講了很多政治情況，講得很痛快，过去对这些情況是不了解的，受了工委的蒙蔽！"

二、白不仅在他們的亲信中传播与灌輸他和范明的反党观点，还肆意的誣蔑中央，說"我国第一个五年計划，是国防工业

一馬当先"；"双輪双鏵犁不适用于中国，造了很多，造成很大浪费"；"我国工农业的發展速度赶不上人口的發展速度"，等等。白云峰到处宣传范明"能幹、敢作敢为、能写文章，敏感，做的工作比其他書記多"。同时他在幹部中，主要是在他的亲信中，造謠誣蔑工委其他書記。攻击誣蔑中央領导同志和苏共領导同志。

三、自一九五二年初到一九五七年六月，白云峰任工委組織部副部长期間，一貫的包庇坏人，包庇反革命，打击好人。随独支进藏的幹部来自一百零四个单位，成分極为复杂，其中国民党的軍政人員，从排連长到师长，从三青团員、国民党員到省党部書記长(如国民党青海省党部書記长薛文波)，占了很大比例（現青管局仍有国民党校級軍官三十余人，連同反革命、历史上有政治問題和违法乱紀的坏分子共三百余人，占該局幹部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仅白云峰在这次会議中交代，他認为是坏人和政治历史不清的，就有九十八人（由他私人介紹到青管局的三十八人不計在內）。这些人的情况八年来白云峰不仅不向其他書記反映，还分配他們担任重要的領导职务（有些是根据范明的指示）。

他排斥工农幹部，說他們"文化低，能力弱"。他排斥軍队轉业幹部，說他們"不懂地方工作"。他喜欢"听話"的小知識分子，喜欢政治历史不清、品質作風恶劣，但是会吹、拍、捧的人。因此在白主持工委組織部工作时，长期是非党員和政治历史不清的人員管理幹部工作。白云峰承認他和范明包庇的坏人和重用的旧人員旧軍官在一百人以上。

白云峰在使用旧人員上，有他一套反党理論，他說："旧人員历史复杂是社会原因"；这些人是好人，"在旧社会不問政治，現在也不問政治"；"好人能作坏事，坏人也能作好事"。他主张"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因此，他認为組織部門和保衛部門是对立的，"象社会部那样对待幹部的政治历史問題，就把幹部日塌了"！（毁了的意思——注）一九五七年整編时，大批幹

部內調，他和范明預謀之后，为了保存亲信，从拉薩各机关、各分工委决定內調的人員中，指名調出三十多个从西北进藏的幹部，（主要是旧人員）私自介紹到青藏公路管理局工作。当时，青管局的幹部不仅成分極不純潔，而且还有很大缺額，但在范明的指示下，他把康藏公路管理局撤銷后的所有幹部，全部調回四川，一个也不要！为了补充缺額，他在兰州、西安两地，从西藏內調的幹部中、退职的人員中、他的亲朋故旧中，以个人名义介紹了三十八人（有二十四个幹部）到青管局工作，其中大部分是政治、历史不清的人員和旧軍官。

这是包庇的一面，还有打击的一面，仅据白自己交代，除去工委書記之外，他打击的仅工委副部长以上、分工委副書記以上的幹部，就有乐于泓、牙含章、王华、杜舒安（以上四人已內調）、王其梅、惠毅然、宋贇良、张平凡、刘肇功等十个同志。

四、白云峰利用工委組織部的职权和形式，在党的許多部門中，安置他們的亲信，培植宗派力量。为了拉攏幹部，提拔亲信，不經过会議討論，用批条子交各业务处办理的方法来提职、提級，实际上白云峰就是組織部，組織部就是白云峰。白云峰的“有求必应”，甚至“不求也应”，不仅是为了树立个人威信，而是一箭双雕——既落了个“好人”的名声，又拉攏了幹部。他私自委任工委西安办事处副处长刘江霞为代理党組書記，却长期排斥另一个副处长李德明于党組之外。封官許願，他对在日喀則分工委工作的白銘章、李天民、夏时清同志說：“你們好好幹，工委有个意見，讓你們当分工委委員”。他不仅歧視妇委，謾罵妇委，而且还用組織部的名义，建議工委撤銷譚冠三同志兼妇委書記的职务，以梁枫代之。在他离开工委組織部去青管局工作之前，为了給梁枫爭地位，私自給团中央写信說：“团西藏工委应浒梁枫任書記”。

范明反党的宗派活动，主要依靠了白云峰的組織和策划。他为范明策划，拉攏工委委員、統战部长陈竞波，工委委員、财委

书記夏仲远，他說："陈、夏領导的部門很重要"，"范明提的問題，沒有他們支持就难以通过"。在白云峰亲自动手进行"爭取、团結"之下，以白为核心，由白、陈、夏組成了范明的"三关口"（組織、統战、財經）和"一流幹部"来反对工委。

五、白云峰是"表面道貌岸然，实则卑鄙难言"的伪君子。一九五四年解决西藏党的团結問題时，他在会上慷慨激昂。他說"根本沒有什么西南、西北的不团結問題，我們是党的幹部，不是范明的幹部"。但却私下对范明說：会議上的那些發言"是被迫才这样說的。"一九五七年对侯杰同志（原工委財經部副部长）去青藏公路交通运輸管理局任副局长和党委副書記他是很不願意的。但他認为党内也应該"耍手腕，看誰耍过誰"，"他們越排挤我們，我們越应該显得大方"。他和范明預謀之后，就劝慕生忠發一个欢迎侯杰去青管局的电报。慕生忠对白極为信任，言听計从，白对慕却是表面恭維、利用，背后打击。本来他散布的誣蔑工委負責同志和中央的流言蜚語，数量是很多的，但由于他一貫"慎言"，"心里做事"，在人們中間騙得了一个老老实实、勤勤恳恳的"好人"的印象，甚至很多被他打击过的同志，也沒有怀疑是他在"挟嫌报复"。

西藏地区开始整風之后，白（在西藏公学工作）"为了表示自己願意进步"，發报給工委："要求工委将直属机关在整風中对我的意见轉給我"，另一方面写信給范明，說孙作宾、孙殿才已定为右派，提醒范明"警惕"。这次会議中关于范明的"新西游記"問題刚在大字报上揭發之后，他立即从范明处要去草稿，連夜閱讀，对陈竞波同志說："新西游記是一个政治性很强的东西，如果写成后那是两条路綫的斗爭"。他在小組会上說："写的是两条路綫的斗爭"。当揭發出"新西游記"的人物刻划部分之后，对梁选賢（工委委員，日喀則分工委書記）和陈竞波說："这眞写的坏"！对梁表示："范明这一次眞的要垮了！"埋怨范明說："你为什么跌这样的活呀！"並为范明划策，叫他"要

鎮靜"，"好应付过关"。范明的"新西游記"提綱被揭發后，白云峰违犯工委不准私自召开会議的規定，非法召开会議，破坏对范明反党罪恶的揭露。在牙含章和范明查对材料时，白挺身而出，猖狂地打击牙含章，包庇范明。他掩护黄琳銷毁日記，黄琳为了銷毁她和范明、白云峰等人来往的記录，叫白把她的日記托人带到兰州，当組織上讓她交出日記时，她用一个沒有写字的本子頂替，把日記本偸偸燒掉，明明两个本子的大小相差很大，白云峰却硬說黄琳托他設法带回兰州的就是这个本子。

白云峰的道德也極为敗坏，和一些女同志的关系極不正常。

白云峰多年来一直不滿意党对他的使用；在进藏之前因未当上大荔地委組織部长和专員而深为不滿，进藏以后因一九五二年未当上工委委員，后来未被选为"八大"代表、西藏监委委員和副書記，一九五七年收縮之后未当上工委組織部长或秘書长，因而长期对工委領导心怀不滿。在他的历史問題上，是一連串的对党隐瞞和欺騙；从白在这次幹部会議上对他的历史所做的交代来看，他曾长期向党隐瞞一九三五年他在韓城中学考試时，曾經写过文章駡紅軍搗乱，在剿共宣传队和特务談話时說："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等叛党行为。白曾两次与党失掉关系，並曾向剿共宣传队供出高德輝、薛何防两个同志，一九三五年、一九三六年长时間与特务高雨亭、张子正在一塊鬼混，並与张子正一塊去投考伪中央軍校教导团。他对西北局所做的結論一貫表示不滿，他在一九五六年列席"八大"会議时，瞞着工委，私自将自己的档案带到北京，假借国华同志的名义交給中央組織部，要中組部对他的历史重作結論。並和他的亲信刘江霞（工委西安办事处副处长）互相串通包庇，叫刘将他的历史材料准备妥当，白到京后又私自發电报叫刘江霞到中央組織部为他的历史問題作証。这明显的是心怀鬼胎，有意欺騙組織。这次幹部会議上被揭發后，証据确实，他还是装聋卖傻，始終不肯老实交代。

白云峰在对上述錯誤的几次交代中，态度極不老实，一貫避

重就輕，遇到关鍵性的問題就“記不起来了”，企圖狡賴。

上述事实說明：白云峰是范明反党的政治路綫的忠实执行者，是范明反党宗派的积極策划者和組織者，是一貫欺騙党、对党不滿、长期进行反党活动的極右分子。为此，决定开除他的党籍，撤銷其一切行政职务。

中共西藏工委扩大会議关于开除反党分子梁枫党籍的决議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日）

梁枫，女，四十三岁，陝西临潼县人，家庭出身富农，个人成份学生，一九三九年入党，原任共青团西藏工委副書記，是范明反党集团的成員之一。其主要反党罪恶事实如下：

一、忠实地执行范明的反党路綫，在青年工作上發展青年主义。

梁枫提出了不要反帝爱国的“民族青年統一战綫的方針”，强調西藏青年可以起一部分工人阶級的作用；把青年团降低为“不分民族、阶級、信仰、职业的”“爱国进步的群众組織”，把青年团和爱国青年联誼会等同起来；把青年要有单独的青年組織的原因庸俗化，說什么“如果青年沒有自己的組織，……势必和成年以及老年人在任何事情上都搞在一起，……青年人要鍛炼身体，他們要打球，而成年却不很需要，老年已不适合作这种运动了，如果都来打，会把老人累坏了；如果都不打，你們青年就会不高兴了。……，这就說明单独的青年組織是必要的”；一九五六年提出了与党的現行政策相对立的“向社会青年进行阶級教育”的方針。並在修筑机場的民工中，組織訴苦，上書要求改

革，以配合范明的“改革形势的到来”；一九五七年九月还在西藏日报上發表反对中央“六年不改”的文章說：“必須向青年講清楚，我們的任务就是如何工作，为改革創造条件。”

二、把团工委变成反党的“独立王国”。

一九五六年她两次以团工委副書記名义在西藏日报上發表关于建党方面的带指导性的反党文章，号召“大力地大胆地放手地發展藏族党員”，“在机关和社会上發展一批藏族党員”，要訂出“协助党發展藏族党員的詳細規划，訂出具体措施，以保証这一工作的順利进行”。她对团工委党支部委員和全体党員說：“团工委党支部一定要發展那些作用大、影响大、經过考驗、年齡大……的入党。”梁枫不仅把个人置于党支部之上，粗暴地干涉支部工作与生活，而且不經任何請示，擅自决定成立青年參观团、代表团、团校学員队的党支部，私自决定党支部的負責人。

她反对党对团的領导，强調团組織的垂直領导，团的組織的建立和委員会人选的决定，应由上級团委批准，而同級党委的权力只是同意和贊成；把直屬团委抓在手里，不受直屬机关党委領导，反对工委关于西藏团校由西藏公学領导的决定，强調西藏团校要受团工委領导；公学团委要設在团校，称团校团委会，强調团的幹部也要团的組織管理、分配，“你們組織部”（工委組織部——註）不能“拉我們的幹部”，她主动地用团工委名义提出工委青委的組成名单。一九五七年不經請示，擅自决定取消拉薩市爱国青年文化联誼会。

在梁枫眼里沒有党的組織，一切工作請示只找范明，要幹部直接找白云峯。她忠实地执行范明的反党路綫，反对中央和工委的正确路綫，抗拒工委的領导，和工委唱对台戏，拒絕工委各部在业务上的領导，几次拒絕工委监委、組織部、直屬党委和筹委財政处的检查。一九五七年因为沒当上团工委書記，就在工委負責同志面前大哭要求內調。

梁枫对团工委实行家长領导，一貫个人决定問題，即使通过

会議形式，也还是她“說了算”。她也不尊重团工委委員的职权，說“不作团的工作的委員不了解情况，提不出多大意見，委員会討論了，还不是按我們的意見办。”事实上团工委即梁枫，梁枫即团工委。她一方面强調下級对她把持的团工委的服从，但是她極不尊重团中央的領导，一九五三年团二次代表大会时，因为爭代表，爭中央委員（原来她沒有准备出席，后因范明在京开会她才去的）未达到目的，控告团西南工委“不公道”，同时对于沒有讓她在大会上發言，書面發言又沒有登报，也提出質問，一九五六年罗毅同志同中央代表团来藏时，召集直屬机关团的幹部开会，了解情况，她因为忙于看戏不去参加。还誣蔑“中央青年代表团不了解情况，提的意見沒价值，工作不好。”

她对团工委实行家长統治，和地主家庭的泼妇一样，横行霸道，蛮不講理，打击給她提意見的幹部，她搞宗派，分亲疏。团工委有梁（枫）派、丁（心）派，吹拍派、挨打受气派之分。以梁枫为中心，“五虎将”为骨幹，把团工委搞得烏烟瘴气，邪气十足，毫不正派；办公会上自由主义滿天飞，这个机关长，那个幹部短，制造各种各样的流言蜚語，黄色情調自由泛滥，拉拉扯扯，吹吹拍拍，互相恭維，自我吹嘘。凭个人好恶对待和使用幹部，凡是对她唯命是从的，会吹、拍、捧的就是好幹部，就吃得开；凡是“不順手”的，提过她的意見的就坏得要不得，就打击、排斥、調走。张生荣的能力不强，作風也不好，因为是她的学生，就从拉薩小学要来提为团工委少兒部副部长，但是却想讓胡琮（团工委統战部副部长）給张作幹事。赵洪蒙是肃反中的重点分子，因为他可以替梁写文章，尽管赵思想反动，品質恶劣，还是把他提为团工委宣传部副部长。赵因开汽車軋死人被逮捕后，她通知社会部說“赵洪蒙不能和一般犯人一样看待，如有条件另找房子关押，房子和生活应予照顾”，打电話叫社会部讓赵回机关工作，（被拒絕）写信、送苹果表示慰問。在討論赵的处分时，她强調“赵洪蒙在思想意識上有毛病，但在工作上是优秀

的"，"如果开除党籍，押三年这个幹部就完了"。由于她的包庇，范明的支持，改变了工委监委对赵的处分决定。

三、梁枫不仅有"衣錦还乡光宗耀祖"的封建思想，（她的母亲是改嫁之后死掉的，解放后，她硬把她母亲的棺材弄出来和她的父亲埋在一起），还十分追求資产阶級的生活方式，極端講究闊气、排場。虽然她对自己的錢"錙銖必計"，她派公务員到街上給她买毛綫，借口顏色不合，坚决不要，迫使公务員不得不把这些毛綫自己买下。但是她对公家的錢，却是揮金如土。

一九五六年团西藏工委召开的全区青年代表大会，出席代表六百一十名，工作人員三百多，开了十天会，花了二十五万元，平均每人每日四十二元，除布匹、綢緞、口紅、雨衣、香粉、洋伞、被子、毛毯都要購置和每人每日平均十一元的伙食以外，买的招待品平均每人每日有紙烟五十支，点心一斤，糖果半斤，苹果五两（从印度进口的）。一九五六年举办的兒童夏令营，有二百九十六个兒童参加，搞了十天，花了七万多元，平均每个兒童二百四十元，夏令营購置的物資达二百零九种，除了文娛、体育用具，化学药品与仪器等应有尽有之外，平均每人每天有：面包一斤多，白糖近四两，每人被褥一套，洗漱用具一套，棉花七点六斤，紅領巾一点四条，暗扣七个；二点二人一个帐蓬、一个垫子。梁枫还在总結中写道："在物資准备上，存在着更为严重的問题，有关活动物資未能及时从內地运到，搞起活动来缺这缺那，因而限制了活动更广泛多样的开展。"这样，团工委从一九五六年三月到一九五八年四月揮霍国家財产达二百万元之巨。

梁枫对整風的态度一貫恶劣。西藏地区开始整風之后，很多单位对团工委有意見，她不仅压制批評，給幹部分工讓他們反駁那些对团工委意見最多的单位，还想把提意見最多的同志调到团工委进行斗爭。幹部会議开始后一貫避重就輕，包庇范明，不肯老老实实交代。

上述事实証明：梁枫是反党的右派分子，决定：开除党籍，

撤消一切行政职务。建議团中央撤消其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員的职务。

中共西藏工委扩大会議关于开除反党分子曾实党籍的决議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日）

曾实，四十岁，广东揭阳人，家庭出身贫农，个人成份自由职业者，一九三八年入党，一九四一年因地下斗爭失敗要求退党，为当地党組織秘密放棄（即开除党籍）。一九四五年一月环境好轉后参加部队並同时重新入党，原任工委办公厅副主任，工委書記处秘書。系范明反党集团的成員之一。其主要反党罪恶事实如下：

一、曾实是出卖革命同志的叛徒。据他在这次整風中交代：一九四六年东江縱队北撤之前，他由本地游击队員王砲光口中得悉，我一游击小組准备攻打当地地主陈美記（与曾实有亲戚关系），由于曾实事先向地主的兒子陈应恭告密，陈美記作了准备，致游击队員伤二、牺牲一。陈应恭当即酬謝曾实伪鈔二万元，並繼續給曾的家庭以生活照顧。（陈应恭写来的証明材料为酬十元）

二、曾实是范明反党集团成員之一。他为了达到依靠范明解决历史問題，和向上爬的目的，主动和积極地鑽進了范明的反党集团，成为范明在工委办公厅的“情报員”和范明忠順的“狗腿子”。他为范明吹噓說：范明在民主改革中提出的所謂依靠上層的阶級路綫是“創造性的馬列主义”，說范明“有魄力，綜合能力强，是少有的优秀幹部”；整風开始后又为范明的所謂“大潑

展”进行辯护和开脱，說：范明所主持的“大發展”工作，实际上是有困难的，其他几个書記又不在，能搞到这样是不錯了。他主动地在范明的宗派成員之間联絡感情，消除誤会。他給范明組織周末聚餐会，拉攏幹部，並假借各种机会与名义，設法滿足范明喜欢排場、闊气的生活，他在負責同志面前察顏观色，十分殷勤，但是他承办的事情，总是根据范明的意圖和顏色行事。在范明的意圖下，打击牙含章，散播牙含章的坏話；掌握办公厅的工作与“情报”。他給范明搜集、匯集各方面的“情报”，据他交代：在范明面前，曾給二十多个同志进过讒言；使办公厅的許多同志互相猜疑，有人人自危之感。他在內地治病时还給范明通風报信，告訴范明：“田璞可能定为右派，来往要小心！”

由于曾实的“忠实”，范明也为曾爭級别，爭地位，不遺余力，不顧有关部門和其他同志的反对，玩弄手法提曾为办公厅副主任。白云峯則两次告訴审幹办公室恢复曾实在重新入党以前的革命历史（实际上是恢复党籍），由于审幹办公室的同志反对，未成为事实。（龔彬同志有电报証明，曾实亦自行交代；白否認有此事）

他为了回內地治病，在几个書記之間鑽空子，挑拨关系。在国华同志面前說范明已經同意他回去治病，在范明面前又說国华同志已經同意他回去治病！他假借国华同志的名义，給范明买送礼的手表，用国华同志的錢給范明的亲信买东西。关于工委妇委的組成人員問題，周仁山同志因不了解情况把梁枫（范明的老婆）的名字勾掉了，曾实不向仁山同志說明，而专門把这个名单拿給范明看，从中挑拨仁山同志与范明之間的关系。他从范明处知道仁山批評他沒有“稜角”（沒有原則的意思）之后，对仁山極为不滿，在下面說仁山同志的坏話。

三、曾实为了把持工委办公厅使办公厅，成为范明反党集团的陣地，一貫採用極端卑鄙的手法拉攏一部分人，打击一部分人。为了拉攏人私自許官許願，答应温万华任秘書处副处长，赵景仁

任保衛科科长，王尧炳（历史不清楚）可以入党。把党的机密文件交給不应閱讀的同志閱讀，还說“这样可以搞好关系”。他排斥、打击对他“不順手”的幹部，罵这些同志“笨蛋”、“混飯吃的”、动不动就要“撤职”、“停發工資”甚至叫“小心你的脑壳”。在打击之后又常常用請客送礼等办法进行拉攏。对一直不順从他的幹部，就利用职权把这些同志搞走。他为了“效忠”范明，撇开工委秘書长和办公厅其他負責同志，自行处理办公厅各处的工作。为了給范明搜集写“新西游記”小說的材料，私自从工委办公厅、研究室等机关拿走了大批党的絕密、机密文件和資料。

四、机关开始整風之后，他为了給范明打掩护，破坏鳴放，私自組織几个書記的秘書开会，規定他們，“鳴放前要經过我审查”。同时用工委整風办公室名义自行布置直屬各单位找“毒草”。在办公厅秘書处散播：“內地整風开始时，有些年輕人，沒有受过鍛炼，在鳴放时提出很多意見，結果到后来整成右派”。又說：“你們鳴放时要站穩‘立場’，提意見要好好的考慮”。

上述罪恶事实說明：管炎是反党分子、叛徒。决定：开除党籍，撤消其一切职务，送回原籍处理。

中共重庆市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議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张文澄党籍的决議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八日）

中国共产党重庆市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議和市委第八次全体委員（扩大）会議，在省委領导下，遵照中央的整風方針，通过大鳴大放、大爭大辯，揭發和批判了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长张文澄的右派面目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徹底粉碎了张文澄及其右派反党集团企圖篡夺党的領导的阴謀。代表大会一致認为，这是重庆市党組織整風运动和反右派斗爭的一个重大胜利。这場斗爭的胜利，对于巩固和純潔党的队伍，提高党員的共产主义覺悟，加强全市各級党組織的坚强团結，进一步提高党的战斗力，有着極为重大的意义。

一九五七年五月，正当資产阶級右派猖狂向党进攻，同我們进行你死我活的斗爭的紧要关头，张文澄及其右派反党集团为了实現他們企圖篡夺市委領导的个人野心，就瞅准了这个时机，糾合一批党內右派分子，同資产阶級右派，里应外合地向党發起总攻击。张文澄利用市委常委和市委宣传部长的职权，处心积虑，百般曲解党的方針、政策，打乱市委的整風和鳴放部署，把他所領导的党的宣传文教部門，作为向党进攻的陣地。他积極支持与指使宣传部門和报社的党內右派分子向基層煽風点火，力圖使当时的大鳴大放脫离党的領导，按照資产阶級右派的計划發展，把运动引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方向，以便于資产阶級实行复辟。

张文澄为了实現篡夺市委領导的罪恶目的，在市政协第二届第一次全体会議前，他在市委召开的参加政协会議的党員大会

上，公开反对市委关于“党員必須維护党的方針政策，对于一切反社会主义言論要坚持說理斗爭”的正确指示，曲解党的政策，取消阶級斗爭，解除党員的思想武装。並竭力替資产阶級右派吹捧，貶低党的領导作用。在市政协会議上，資产阶級右派分子向党的进攻已达到令人忍无可忍的地步，他却得意忘形地为右派分子捧場、撑腰、鼓掌欢呼。在大会發言中，他以故作自我检討的姿态，憑空捏造許多口实，污蔑市委、攻击市委，明枪暗箭，極尽恶毒攻击之能事。在市的文化艺术新聞出版界座談会上，张文澄又公然违背市委指示，把座談会完全变成右派分子嬉笑怒駡向党进攻的場所。当右派分子的进攻达到登峰造極的时候，别的同志都極为憤怒，主张反击，而他却仍認为“放”得不够，助长右派分子的囂张气焰。会議結束前，他又在發言中，对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論大加贊賞，說“在这次会上找到了共同語言”，“我們的爱和憎是一致的”，並同右派分子異口同声地說“墙和沟主要是党造成的”，为資产阶級右派增加了向党进攻的資本。座談会后，党内外不少右派分子就趾高气揚地拿张文澄的講話来煽惑群众，对各基層党組織施行猛攻。这就充分說明，张文澄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和党外資产阶級右派分子一模一样，而且实际上已成为匯合党内外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統帅”。

张文澄一方面对党是这样的刻骨仇恨，疯狂进攻；另一方面对右派分子則情长誼深，爱护备至。他公然违抗組織決定，替右派分子刘盛亚在大张旗鼓鎮压反革命时期所写的、曾受文艺界严肃批判的、为反革命分子辯护的反动小說“再生記”翻案；並且批准报紙刊登解放前专写反共文章的反动文人王向辰（老向）向党进行新的进攻的文章，为其恢复“名誉”。直到反右派斗爭期間，他还竭力替一些右派分子进行辯护、开脱。

张文澄还以封官許願和私人拉攏等手段在市委宣传部、文教部和报社内部拉攏王匡时（市委宣传部副部長）、謝予（市委宣传部馬列主义教研組組長）等右派分子，結成右派反党集团，进

行反党阴謀活动。

这个右派反党集团的一个重要手法，是利用掌握的党的政治思想工作部門的便利条件，在党內外散布修正主义思想，百般歪曲党的"百花齐放、百家爭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为資产阶級服务。他們假借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题目，宣传阶級斗爭熄灭論，取消党的領导，取消政治战綫上和思想战綫上的"灭資兴无"的任务。他們把"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政策，說成是"社会主义的劳动竞賽"，积極主张开放思想領域內資产阶級思想的自由市場，为資产阶級思想爭夺地盘，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論爭"自由"，他們搬用資产阶級虚伪的超阶級观点，提倡"要站在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立場"来办报刊。实际上就是要用資产阶級的立場、观点来办报刊，篡改党报的政治方向；他們主张用不要界限，不要是非标准的鳴放，来代替党的政治思想工作，以便使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逆流自由地向党冲击；他們並以反"教条主义"作幌子，借"独立思考"、"自由爭論"为名，公然地大量地散播資产阶級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平均主义等思想毒素，从思想上腐蚀党的队伍。

张文澄及其右派反党集团的另一个反党手法，是利用合法的工作职务和党內民主权利，进行非法活动。张文澄为了实現其卑鄙的个人野心，曾一再在市委直屬机关党代表大会、市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和省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进行各种非法活动，兴風作浪，狂妄地攻击省委和市委。在省党代表大会上，张文澄因为想当八大代表的野心未能达到，就反对在中央机关工作的八大代表候选人，企圖破坏省党代表大会的选举工作。去年春季，他利用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議的机会，故意歪曲全国宣传会議精神，污蔑省委"把中央的精神传錯了"，公开反对省委的正确領导。

在党的生活中，他們以資产阶級的民主观点，来反对党的民主集中制，只要民主，不要集中，只要自由，不要紀律，經常利

用作报告、講課和学習会等合法形式，以"探討理論"为名，散布各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謬論。攻击党的領导，丑化党的領导幹部。

张文澄还恬不知恥地以四川地下党的"头面人物"自居，一貫散播地方主义情緒。以虛伪的"关心过去四川地下党的同志的利益"，"替地下党的同志說話"的面孔，拉攏某些思想上不够健康的人，在党內划小圈子，挑撥地下党的同志和老区来的同志之間、本地幹部和外来幹部之間的关系。企圖利用这种地方主义情緒和宗派活动，挑起党內的爭論和混乱，破坏党的团結和統一，以实現其个人野心的目的。

张文澄所以成为右派分子不是偶然的。他出身于地主資产阶級家庭，長期受資产阶級的教育。入党以后，一直保持着原有的阶級立場，把党看成是猎取名利、实現个人野心的工具，在党內搞个人野心活动。在历次阶級斗爭的紧要关头，他总是站在与党对立的立場，同党两条心。例如在土改和"三反"中，曾包庇过地主和反革命分子。他在市委的集体領导中，一貫以反对派的面貌出現，与党唱对台戏，破坏党的統一領导。几年来，党組織曾多次对他进行过严肃的批評教育，但他不仅沒有悔改，反而怀恨在心，反党活动更变本加厉，当此社会主义革命进一步深入的时候，他就不能繼續在党內隱藏下去，終于現出原形，公开叛党。

代表大会一致指出，张文澄的这些活动，集中地反映了資产阶級的利益和願望，是与党的利益、社会主义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根本不相容的。象张文澄这样已經在党內掌握了一部分領导职权的人，他所进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对于党的事业所造成的危害較之一般党內右派分子更为严重。应当看到：由于党中央和省委的正确領导，由于全市人民和全市各級党組織的努力，重庆市几年来的工作成績是巨大的，市委对于中央和省委的方針指示是堅決貫徹执行的。全市各級党組織是团結的。所以张文澄及其右派反党集团的阴謀未能得逞，而是被徹底的粉碎

了。但是，由于张文澄所进行的公开的和秘密的反党活动，已經严重损害了党的团結，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党的統一和集中領导，削弱了党的战斗力，給党的思想工作和文教工作造成了一定損失。他已經成为資产阶級右派分子。因此，必須把他清除出党。代表大会經过討論以后，一致决議：开除张文澄的党籍，撤銷他的各項职务。鑒于张文澄的各种罪恶活动在許多地方遺留的毒害和影响，必須繼續徹底进行消毒工作。只有这样，才能維护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的純潔。

代表大会認为，全市各級党組織和全体党員，应該从张文澄的反党罪恶事件中認真吸取教訓，百倍地加强党的組織工作和思想工作，在中央和省委的正确領导下，为胜利地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历史任务，保持党的純潔和加强党的团結統一，作經常不懈的斗爭。

一、充分發揮工人阶級先鋒队的作用，时刻警惕地保衛社会主义建設，善于引导千百万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虽然已經在各个战綫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这个革命还在繼續进行，特别是思想战綫上的革命将是較长时期的任务。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中，主要矛盾是資产阶級和无产阶級的斗爭，資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斗爭。这种两条道路之間的斗爭，必然要反映到党內来。各級党組織必須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工作的領导，把灭資兴无作为党的政治思想工作的根本任务。每一个共产党員在这两条道路的斗爭中，不仅要站稳工人阶級的立場，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且必須站在这一斗爭的最前列，团結群众与党內外各式各样的企圖削弱党的領导、削弱无产阶級专政、走資本主义道路的傾向进行坚决的斗爭。巩固革命胜利，保衛社会主义建設。

二、努力不懈地学習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增强党性鍛炼，坚定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每一个共产党員都必須用馬克思列宁主义把自己真正的武装起来，不断地提高政治水

平和思想水平，使自己能够銳敏地鑒別什么是馬克思主义的，什么是反馬克思主义的。学会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則来指导实际工作。特別要反对那些叛党分子用来作为反党工具的修正主义。

三、發揚工人阶級的革命精神，在党內清除一切資产阶級个人主义思想。資产阶級个人主义是一切罪恶的根源，是与共产党員的党性絕不相容的。每一个共产党員都必須徹底进行自我改造，不斷地改进工作作風。必須經常警惕資产阶級思想的侵蝕，反对鬧名誉、鬧地位、爭权力、爭待遇。必須无条件服从党的利益，不能把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对立起来。必須虛心謹慎，戒驕戒躁，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共产党員一定要有朝气，一定要有坚强的革命意志，一定要有不怕困难和用百折不挠的意志去克服任何困难的精神，一定要克服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絕对平均主义和自由主义，否則就不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共产党員。

四、維护党的团結和統一，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各級党組織必須加强党的統一和团結的教育，进一步發揚党內民主，在民主基础上加强党的集中統一的領导。必須严密党的組織，坚决把一切混入党內的阶級異己分子和反党分子从党組織內部清除出去。每一个共产党員都必須服从党的組織，自覺地遵守党章党紀，牢固地树立党的团結利益高于一切的观念，把个人严格置于党組織和群众的监督之下。党內民主必須保証是按照有利于党的事业的原則进行，不能松懈党內的战斗意志与团結。絕不允許反党分子和个人野心家利用党內民主生活来分裂党和破坏党的团結和統一。

五、巩固和加强党的領导，与一切削弱党的領导，危害党的利益的現象进行坚决的斗爭。每一个共产党員和党的幹部都必須有維护党的領导威信和坚决服从党的領导的高度自覺性，都必須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綫、党的方針政策和党組織的决議。有无这种自覺性，是測驗一个共产党員是否眞正具有共产主义覺悟的重要

标志之一。

我們徹底粉碎了张文澄及其右派反党集团的罪恶阴謀，取得这一斗争的胜利，証明了党的整風运动的正确性和必要性。全市各級党組織应将本决議向全体党員深入传达，結合实际情况，認真組織討論，用高度的党性原則教育党員，克服党內存在的各种錯誤傾向，在加强党的集中統一領导的同时，必須繼續深入整風运动，有系統地在知識分子和人民群众中，加强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爭取全民整風运动的完全胜利。为完成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事业而奋斗。

中共重庆市委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张显仪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张显仪，男，現年四十岁，地主家庭出身，本人学生成分，一九三七年八月入党，同年参加革命工作。历史上曾因洩露党的机密，暴露組織，受过党內警告处分。原为重庆市委候补委員、中共重庆市工会党組書記，重庆市工会主席。

张显仪在担任市工会領导工作期間，在政治上搞工团主义，組織上鬧独立王国，發展資产阶級个人野心，和另一反党分子邓平結成张邓联盟，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恶罪活动。

其主要恶罪事实如下：

一、有一套完整而系統的工团主义論点，反对党对工会的領导。

在一九五七年九月向全总提出的"关于工会工作的几个問題"的反党文件上，他認为："重庆不是那样标准的工团主义、

經济主义”，“自从全国和本市在一九五三年反工团主义和經济主义后，多数工会組織独立作用發揮較差”，以此为他进一步反对党中央的正确工运方針开辟道路；他認为：“工会組織沒有很好發揮作用的原因，不是工会保証与服从党的領导有問題，主要是党对工会領导有問題”。“党对工会支持不够，干予过多，卡得过死，限制了工会独立活动”。他还認为：他“自己是最了解工会业务的，最能代表群众利益”，“市委不懂得市工会的具体业务，不了解工会的情况”。因此“市工会不听市委領导是很有理由的”。他狂妄地要求：“首先在全党再一次大規模地發揮大辯論，进行依靠群众、依靠工会、正确認識工会作用的教育”，这就十分露骨地反映了他摆脫党的領导的反动工团主义思想；他反对中央既定的工会工作任务，提出“發动、教育与监督”作为工会的工作任务。他片面强調“人民內部矛盾突出了”，要求无限制扩大工会权力，並且“要用法令加以明确，从制度上加以巩固，工会工作才有合法依据”，“只有如此，工会說話才算，腰干才硬，才有法令制度向行政监督”。“不改变配合地位，要改变“工会是行政的尾巴”，是不可能的”。他甚至主张“工会是最高的权力机关”；他还有“现在厂矿企业內部組織和工作有互相打挤，重复劳动”的論調，言下之意，厂矿企业只要有工会独立存在，独立活动，其他的群众組織似乎都可以退出。

二、长期来搞独立王国，与党分庭抗礼。

一貫借口垂直領导，歪曲全总指示，在重大方針政策上，公开抗拒党对工会的領导。例如一九五五年的基層工作会議，市委指示以貫徹增产节約为中心，张競一再抗拒执行。又如不經市委指示，擅自搞工会积極分子活动月；拒不执行市委批准的幹部編制数；頑抗市委对运输电影院鉄椅問題的指示；拒絕移交文化宮、招待所等等。在工人整風中，更猖狂地以“發揮工会組織作用”为名，向党爭夺領导权，露骨地表現了他的反党野心。

三、与反党分子勾結，操縱反党集団向党进攻。

张显仪一貫野心勃勃，一心想当市委委員，經常无耻地与市委負責同志比高低，当其个人野心未得滿足时，就不择手段地勾結反党分子邓平，操縱反党集団，猖狂向党进攻。例如，在市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由于他未被选为市委委員，竟不惜与反党分子邓平勾搭，利用大会主席团成員身分，私自把代表們向主席团提的有关工会問題方面的紙条，拿給邓平看，暗示要邓平也遞条子去要挟重鋼党委作检査交代，並为张活动选票。张还鼓动邓平煽动陈孝篤同志收集資料，攻击市委，又如三届工代会前，张有意泄露桑林、邢广信同志回市工会工作的机密，唆使邓平召开反党集团密会，拒絕貫徹市委对市工会領导幹部安排的意圖。事后，邓平还向张作了“彙报”。就这样与反党集团一唱一和，狼狽为奸。

四、破坏党的幹部政策，实行資产阶級的幹部工作路綫，維护家长統治，扩大个人反党势力。

张显仪歪曲、破坏党的“德才兼备”的幹部政策，执行資产阶級“用人唯才”的路綫。一貫重用資产阶級右派和未經改造的資产阶級知識分子（有的政治面目不清），打击、排斥工农幹部；取消思想斗爭，麻醉、腐蝕幹部。

为了扩展个人反党势力，他竟不惜利用职权，封官許願（經初步統計，张曾当面对六人許以提职加薪），拉拉扯扯，进行宗派活动，以維护家长統治，扩展独立王国資本。

五、长期以来不过党的組織生活，成了市工会的特殊党員，不遵守党的紀律和保密制度，将中央、省和市委發給市工会党組的絕密文件，随便拿給他的爱人、反党分子袁振翔和他的女兒看，並給袁带到印制公司去传閱。入城初，掉了大烟，私自辱打警衛員；回家接小孩，随便带手槍、警衛員，炫耀个人身分；滥用职权，破坏劳动就业法令，私人介紹一些亲友入厂工作等等。

张显仪走上叛离工人阶級的反党道路决不是偶然的。他长期

坚持資产阶級立場，在政治上發展工团主义，在組織上搞独立王国和扩张个人野心，最后就必然發展到进行反党活动。

张显仪的反党活动，严重地损害了党的威信，破坏了党的团結和統一，特别是他在工会工作中，放毒甚广，腐蚀和毒害了不少革命幹部。因此，給党的事业造成了难以估計的损失。

市委对张显仪的錯誤，早就有所察覚，曾多次帮助、教育和批評，尤其是近年以来，对其教育帮助更为殷切。但张显仪竟採用了一貫施用的卑鄙伎俩，公开拒絕党的监督，因而其錯誤一犯再犯。

市委第八次扩大会議期間，当其反党錯誤被全面揭發和批判后，张显仪的态度仍極不老实，企圖減輕罪責，蒙混过关。

上述事实說明，张显仪已堕落为資产阶級右派分子，經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一日市委第十一次全体委員会一致通过，开除张显仪党籍，並撤銷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中共重庆市委文教部支部大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陈孟汀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陈孟汀，男，四十四岁，四川省达县人，地主兼資本家出身，学生成分。一九三八年七月入党，曾任区委书記、县委委員、西南文教部高等教育处副处长等职，现任中共重庆市委文教部副部长。

陈孟汀是以张文澄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在文教战綫上的一員悍将。在去年大鸣大放期間，他与党内右派分子张文澄、王匡时等串通一气公开叛党。他利用其作領导文教、衛生系統整風的便

利条件，四出作报告、演講，大肆煽風点火，鼓动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在三月十六日市民盟高等学校基層工作会議上，他站在資产阶級的立場上对党进行攻击，他說："馬列主义者不迷信自己的学說"，实际上就是号召盟員不要信仰馬列主义；他說："如果相同才談那是逢迎"，实际上是号召盟員同党唱对台戏；他說："思想工作的任务"和"团結知識分子的先决条件"是"使大家思想活潑起来，敢說，願說"，实际上是煽动民主党派向党进攻。六月上旬資产阶級右派向党进攻已达到登峰造極，但陈孟汀意犹未足，竟进而明目张胆地号召群众反党反社会主义。他在师专对学生講話說："党的荣誉是不能保証的"，公开号召学生要"破除对共产党的迷信"，要象储安平那样的"放"，"要用'五四'爱国运动的精神来对共产党进行一次总检查"。他还在大会上攻击市委書記辛易之同志要党員站稳立場的指示，公开号召党、团員不要立場，不要原則。並提出"愈鬧得兇、愈能發現人才"，"向党提意見最多的才是正面人物"。他还支持右派分子推翻学生会說："要是学生硬要推翻学生会，那就讓他推翻，推翻了还好些"。八月中旬反右派斗爭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是陈孟汀仍有意违抗党的領导，在普通中学教职員大会上，公开号召要"破除对共产党員的迷信"。

在此期間，陈孟汀还竭力反对中央、省、市委关于鳴放的正确指示，积極主张不要領导，不要有計划地放。在三月十六日市高等学校院长、党委書記会議上，他歪曲中央宣传工作会議的精神，公开反对党委对鳴放的部署，污蔑省委扩大会議精神是"收"；在五月二十七日和二十八日北碚区和沙磁区高等学校会議上，他公开反对当时中央关于学生暫不鳴放的指示，認为"学生的問題不在于如何放而在于放够"，主张"学生应立即鳴放，以爭取主动"；六月在师专他违背了市委关于控制广播电台的指示，放任右派分子繼續控制电台，在八月十二日中专幹部大会上，他公开反对市委書記辛易之同志关于整風应馬上轉入反右派

斗爭的指示，主张繼續鳴放和辯論下去。

陈孟汀这一系列反党罪恶活动，助長了文教系統右派分子的猖狂气焰，特别是师专由于他的亲臨兴風助浪，情况更为严重，牛鬼蛇神一时十分囂张，以致激起周围农民的憤怒，都拖着标語，提着浆糊桶到学校来向他們兴师問罪。

在反右派斗爭中，陈孟汀公然篡改党中央反右派斗爭的方針政策，竭力保护右派分子过关。他公开提出“既有右派言論，又在鳴放中积極煽風点火的人，不能算是右派”；他主张不要对右派分子进行斗爭，公开提出对右派分子要本着“团結—批評—团結”的公式，实行和平談判，不要逼之过甚；他主张不要对右派分子进行严肃处理，公开提出“对右派分子，不論罪恶大小，只要自动坦白交代，一律不登报、不斗爭、不处分”，並号召群众“不要对右派分子过分敌視”。陈孟汀对省委关于右派分子教师应向学生作检討的指示，他擅自决定中学党委不予执行，当中学又查出一批右派分子需要及时进行斗爭时，他却强調要中学党委“在各校一律开展大辯論，並把右派分子摆进去一齐辯論，不单独进行反右派斗爭”，以致使中学在查漏中已查出的一批右派分子，一直无法展开斗爭。

陈孟汀还利用文教部门审批右派分子的职权，反对和阻止基層党委把一些罪恶昭著、众所公認为右派分子的人划为右派。他曾反对和阻止西师、西农、师专将右派骨幹分子罗容梓、任达远、蔣同庆等划为右派。並多方保护右派分子张文澄、龚燦光、李忠祿等人，阻止群众对他們进行揭發斗爭。

陈孟汀这一連串的破坏、阻挠，給文教、衛生系統的反右派斗爭造成了很多困难和一定损失。

陈孟汀还妄想从思想上瓦解和腐蝕我們党的队伍，經常利用各种机会，明目张胆地系統宣传他的資产阶級修正主义思想。他竭力取消党的領导和貶低党的領导地位，在民盟幹部会上公开說：“党的力量达不到的地方，盟的力量可以达到”；在普中和衛

生界的整風报告中，公开提出要与包括右派分子在內的資产阶級知識分子建立集体領导，並称他們为“高級将領”。他公开反对批評“先专后紅”的思想，說“不能要求先紅后专或先专后紅”，实际上是主张幹部只专不紅，他还污蔑省委批評某些人“向科学进軍变为向人民幣进軍的提法是一竹桿打死一灣灣人”；他恶毒咒駡党的积極分子：“是教条主义与經驗主义的天才結合家，是对上唯唯諾諾，对下打击的人”，声言“要以諸葛亮揮淚斬馬謖的心情来处理共产党員”，以平所謂“民憤”；他竭力取消政治战綫上和思想战綫上“灭資兴无”的任务，否定思想工作中馬列主义的指导原則，公开污蔑“典型批判是牺牲一个人”，是“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的作法”，污蔑“省委对毒草“草木篇”的批評是引伸，不能服人”；主张“以‘能言’、‘能辯’、‘能合’作为政治思想工作的标准”，主张“香花与毒草应有平等地位”，主张“思想工作应求同存異”，他混淆敌我界限，甚至袒护反革命分子，把有的反革命分子当作是有缺点的好人，主张“按人民內部矛盾处理”；他还为反革命分子、貪污盜窃分子翻案，恶毒攻击历次政治运动，污蔑“三查三整”、“三反”、“肃反”、“思想改造”都左了，並在民盟幹部会上講：“三反前重庆工作是粗暴的”等等。他歪曲党的民主集中制，認为“尊重少数人的意见是新的民主的含义”，他竭力污蔑、詆毀苏联，散布各种破坏无产阶級国际团結的言論。在匈牙利十月反革命事件發生后，他公开說：“社会主义陣营內部也有分裂的危险”。

为了篡夺党的領导，陈孟汀除与党內右派分子张文澄、王匡时等相互吹捧、勾結，結成右派反党集团，站在一个政治立場上，共同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以外，並以封官許願和加高薪等种种私人拉攏办法，在党內外竭力培植个人勢力，同党对抗。他还与社会上的右派分子情长誼深，亲如兄弟，如右派分子管相桓給他私通密信，无話不談，管在給他的信中恶毒攻击“党委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假手群众，借刀杀人”，但却称陈孟汀为“家长”，並

叫他不要把此事告訴党組織，而陈孟汀就照办了。陈孟汀自解放以来他还安插了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政治面貌不清分子王良枢（肃反对象）、楊开勛（历史反革命分子）等多人在国家机关和事业机关工作。在作市文教口肃反办公室主任时，陈孟汀还曾违抗党的政策，甄别时他对該定为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主张不定为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对該捕的主张不捕。如对銀行学校的反革命分子郭作仁，他認为是政治历史問題，主张“不以反革命分子論处”。对地質学校殴打領导的現行反革命分子郑宝琪（已捕），他認为开除也不好，送去劳动教养也不好，学校开大会斗爭也不好，“主张把他調离学校就行了”。最为严重的是市广播电台反革命分子康捷，市委已批准送劳动教养，但他却擅自将他留在机关工作。

以上事实充分說明，陈孟汀是資产阶級在我們党内的代理人，是一个穷兇極恶的資产阶級右派分子，是党的叛徒。他之所以成为右派分子，决不是偶然的。他出身地主、資产阶級家庭，从小就立志要揚名显亲，光耀門庭，做地主父亲的“忠順兒子”，而且被家里人誉为“少有大志”。他抱着这种資产阶級个人野心混入党内，二十年来，虽經党耐心教育，但他一直堅持原有立場，不願接受改造。他对地主資产阶級生活念念不忘，直到解放后，他还为他父亲画象“重温兒时旧梦”。他一貫在党内爭名誉、爭地位，同党离心离德，对党極不老实。一九四二年整風，为入党时隐瞞参加复兴社外围組織“忠义救国会”的历史，曾受过审查斗爭，而对党不滿。一九五三年在西南文教部工作时，因闹分散主义，搞独立王国，又曾受撤銷党内职务和行政撤职降級的处分，因而对党更加仇恨，竟至当資产阶級右派向党猖狂进攻的紧要关头，公开出卖党和工人阶級的利益，並和张文澄等右派分子結成反党集团与党外右派分子里应外合，猖狂向党进攻。在这次反右派斗爭中，态度極端恶劣，經过多次斗爭，非但毫无悔改誠意，反而猖狂向党反扑，对党进行恶毒污蔑。为了严肃党

紀，純潔党的队伍，經支部大会討論决定，开除陈孟汀党籍，並建議撤銷其一切职务。

中共重庆市財政局支部委員会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戎占芳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七日）

戎占芳，男，四十岁，中农（土改前为富农）出身，学生成份，山西省山阳县人，一九三七年四月参加革命，一九四〇年四月入党。参加革命后历任指导員，軍分区供給部副部长，軍区后勤部軍需处长，重庆市財政局副局长等职。原任市財政局局长，党組書記。在一九四八年因犯本位主义的錯誤和有严重的腐化堕落行为，党內曾受留党察看两年处分。

在整風期間，市財經单位三級幹部会議上揭發了戎占芳很多极为严重的反党罪恶。

戎占芳是一个極端自私自利的資产阶級个人主义者，有浓厚的个人名利慾望。正是从这一点出發，长期对党不滿，以致一步一步地走向反党道路。一九五六年省、市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戎極力詆毁省、市委領导，破坏省、市委領导威信，否定工作成績。說市委領导作風是"大小都抓，主次不明，零敲碎打，步子很乱"。說省委的报告"談工作成績多，談缺点不够"。並毫无根据的利用他堂侄虛构的事实，在会上質問省委"遂宁专区×县在統購統銷中严重違法乱紀，捆綁了貧僱农四、五百人，省委知不知道？处理了沒有"。同时还在会外說"为啥这样大的問題，县委書記都不敢反映"（經調查並无其事）。恶毒的攻击党在农村中的阶級路綫和粮食統購統銷政策。在討論八大代表候选名单

的时候，戎表示不满，与右派分子张文澄一唱一和，反对中央分配省的八大代表名单，主张"拉下几个，添上一些"，並同意打电报給中央"顶回去"。选举新的省委委員和市委委員时，戎也有意混淆视听，制造混乱。去年夏季戎占芳在中央高級党校学習，当資产阶級右派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戎附和右派的言論。右派分子徐光攻击中央説"中央对反右斗爭的形势估計錯了"。他也表示赞成，並和徐光站在一起向党进行恶毒的攻击。

长期以来，戎占芳一直对市委的領导是採取抗拒的态度。如市党代表大会經費开支問題，本来市委負責同志已經同意了，不应成为問題，但由于戎对市委一貫不滿，因此就借机向市委写报告，要市委責成有关經办同志检查，其实是要市委检討，更恶毒的是威胁市委承認所謂錯誤。与市委唱对台戏，将市委的"軍"。当市委答复"特殊情况經領导批准可以报銷"后，財政局还打电話質問市委説"請問市委什么叫特殊情况。請予解释"。与此相反，戎占芳对其它方面經費开支，就不是这样，如对民主党派的經費，则叫幹部对他們不要"扣"，並說"多給点錢，他們就笑哈哈了"。由此可以看出，問題的实質並不是执行制度的問題，而是蓄意和市委对抗。他还極力主张在市人委成立总党組来与市委分庭抗礼。

戎占芳上述反党活动，經过財經单位三級幹部会議和財政局党支部、財政局系統幹部大会的批判、討論，业已徹底揭露了他的右派面目和反党罪行。当其反党罪恶被揭露后，在經过組織教育和批判下，戎占芳尚能低头認罪，对其錯誤有一定認識，並有悔改表现。根据上述情况，經支部大会討論通过，决定开除戎占芳党籍，並建議行政撤銷原有职务，另行分配待遇較低的工作，降两級。

中共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委員会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张鉄民党籍的决議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日）

张鉄民，男，山东平原人，現年四十二岁，文化程度大学肄业，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入伍，一九三八年八月入党，一九三九年二月轉正。历任民运股长，政工科长、宣教科长、警衛团副政委，华东軍区及山东省人民政府交际处副处长，青岛市軍管会交际处处长，青岛市委統战部副部长，上海幹部学校副校长、校长，党委会副書記、書記，一九五七年四月調我院任副院长，党委委員。

张鉄民虽然入党多年，但是由于他的地主資产阶級本質沒有得到改造，存在着严重的个人野心及修正主义观点，因而在民主革命胜利后，他即和党的关系發生距离，一九五二年任青岛市委統战部副部长期間，政治上即开始蛻化变質，工作消極，生活上享乐、腐化、个人主义严重，因此，三反中被撤銷打虎司令員。当时，本拟給予留党察看处分，后見其檢討尙好，有轉变，未予处分。但其本性未改，竟發展到大鳴大放时公开与党对抗，誣蔑中央的鳴放方針，对党委的决議拒不执行，並以装病不上班来要挾組織，和党内右派分子范雨舟、齐銘盘及犯有严重反党錯誤的渚怀曾勾結起来，进行反党小集团的活动，从内部向党进攻，对党外右派分子的进攻起了支持和配合的作用。反右斗爭后，党委进行整風时，其反党言行被揭發出来后，曾多次进行斗爭，並在党委扩大会上和四川省委召开的四級幹部整風会議上进一步进行了揭發和批判。其主要反党事实如下：

一、抗拒誣蔑中央方針政策：他首先反对重庆市委派来帮助我院工作的刘家栋同志（市委常委、建交部部长）堅持貫徹中央和省、市委抓紧时机大鳴大放的指示，在党委会上蛮横无理地与刘冲突說：“只有你刘部长才是真正的革命，你才能領会中央鳴放精神，我就不能。”“你当过部長，我也当过部長，也帶过工作組去帮助工作，沒有見过像你这样的領导。”党委决定停課鳴放，由张鉄民向教师交代，張竟拒絕执行党委决定，並裝病不上班达一星期左右。在这期間，又散布了一系列的反党謬論。他向院长助理牛富海同志說：“停課我不管，我不負責。刘部长决定的你去找刘部长。”“我們不能这样作，我們不能将純潔的青年推到敌人那边去。”又向其他党委委員說：“为什么我們要自己制造匈牙利事件。”“青年人是单純的，脑子一热什么話都能說，什么事都能作。”尤其严重的是市委要党委書記石昌杰同志向张鉄民提出警告后，他在一次党委会上竟又繼續放毒說：“中央北京吹来一股風，我院不能跟着去赶浪头。逼着共产党員反党是最反动的。”这一系列的言論，其中心思想就是否定阶級斗爭的客观存在，把右派分子向党猖狂的进攻說成是党制造出来的。这不仅是对党的恶毒誣蔑，实質上是企圖在阶級斗爭紧要关头袒护包庇右派。此外，在反右斗爭后，他竟然不同意对畢业生进行政治审查，对人事处幹部說：“这些青年娃娃有些什么問題呢?!”这說明他修正主义的系統性和頑固性。

二、严重的个人野心，一貫的反对党委和党委書記石昌杰同志，他一来就对石昌杰同志在行政会上所作的介紹極为不满，認为石和他都是同級副院长，为什么石走了，他才負党政工作全責。他对党委集体領导也極不尊重，党委和四人碰头会（党委正、副書記，党員院長，院长助理組成的）常不参加，或中途賭气退席，有时还睡覚。平时工作消極，党委会分給他的工作，他往党委書記身上推，堅持要他作时，他就說用党委的帽子来压他。背后，又向幹部說：“石、韓（党委副書記）是掛帅的，我

是当将的，”發泄不滿情緒。他在負責处理人民来信工作中，对坏分子楊熙麟誣告石昌杰同志在肃反中誣害好人，因而是反革命問題，他不但未及时交党委討論，相反为楊熙麟捏造的所謂恋爱問題还派院長室秘書主任去調查，以表示对楊的关怀。坏分子余恭祁誣告石昌杰同志打击报复，他又别有用心的压了一个多月才交給党委。

三、他与齐銘盘、范雨舟、蒲怀曾四人由于气味相投，逐步的結成了一个反党小集团，张鉄民是首脑。如范、蒲鬧个人情緒，要求調动工作，石昌杰同志不甚同意，张就背后进行拉攏討好，向蒲說：“沙坪壩这个鬼地方，蚊子有几十种，有机会到部里（中建部）替你反映。”答应范在党委会上支持范調动工作。蒲平时对石昌杰同志态度最兇，张說蒲虽有些急燥，但精神是好的，今后，党委应發揚这种精神，拉蒲反石。有的党委委員說齐的缺点，他就替齐开脫，說这是石昌杰同志的缺点。並在許多重大問題上，他們常一唱一合，与党委唱对台戏，使党委会常陷于僵局，分裂与破坏党的团結。

四、反右斗爭中消極怠工，在不少关鍵問題上，支持右派意見，与右派分子同流合污。反右斗爭中，有些重大会議，他常无故缺席，党委分配給他的斗爭任务，很少主动抓，甚或推了不管。並說：“右派言論是資产阶級思想，”“对右派完全認为是敌我矛盾是左傾，完全認为是人民內部矛盾是右傾。会相互轉化，”以此来混淆敌我矛盾，並在院务会議上支持右派分子赵长庚一九五七年建筑系不招生的主张，对多数群众的正确意見不加理采，会后还买糖果請赵长庚召开座談会，会上右派分子指着党員教师罵，煽动师生併系，他却一言不發。更奇怪的是在他罢工期間，他还主动接見学生，說：“供热专业在重庆不能办，我院师資也差。”直接支持了右派分子大鬧併系併专业的阴謀活动。

上述事实說明，张鉄民已經墮落到右派分子的泥坑，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員起碼的条件，为了严肃党的紀律，純潔党的队伍，

維护党的团結和統一，根据中央三中全会关于处理党內右派分子的原則，經支部大会及党委会通过，四川省委批准开除张鉄民的党籍，行政上撤銷其原有一切职务，工資級別从十一級降为十五級。

中共成都市委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叶石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五月九日）

叶石，男，四十五岁，山西省汾阳县人，自由职业者家庭出身，学生成份。一九三七年参加工作，一九三八年入党。历任七月剧社社长、魯艺分院秘書、文化服务团团长、晋綏分局教育科科长、宣传科长、成都軍管会新聞处长。現任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市人委副市长。

一九三九年因浪費公款十余元，受党內劝告处分。

叶石攻击省委，否認阶級斗争，反对阶級分析，散布修正主义的反动观点。

去年三月，叶石在北京参加中央宣传工作会議时，曾在有党外人士参加的小組会上攻击省委，他說：李井泉同志去年二月在省、市級机关党員科长以上干部会上，传达省委召开的地、市委書記会議的报告和主席的报告精神不一致，他認为李井泉同志过分强調了阶級斗爭，对去年知識分子思想乱不乱的估計过分了，他特別对李井泉同志报告中提到的把敌对思想搞臭很不滿意。在宣传会議期間，他給市委宣传部肖菊人同志打电話叫停止传达他在学校政治工作会議上的总結（这个总結大体是根据李井泉同志报告的精神作的）。由京回来后，他又召集中学党員校长开会，

进行学校政治工作会議的所謂“补課”，他在这个会上說：“不能用粗暴的办法一棍子打死，不能过分强調阶級斗爭”，“人民內部矛盾是主要矛盾，要正視我們的錯誤”，“总的說来，成績是主要的（否則与国民党一样），但那个具体单位則当具体分析”，“鬧事說明了有官僚主义”，“保护人民，不保护官僚主义”，“香花毒草是要分，但在某些时候，一时划分不清，不要着急去划”，“不能迷信經典著作，要考虑我們的民族特点，传統要求”，“学苏联不結合实际，把凱洛夫、申別廖夫捧为聖旨”，“教育界的最大危险不是修正主义，是机械的学習苏联，一定要反对教条主义”。

叶石並在市委宣传部部分科长幹事中間散布“李井泉同志的报告和主席报告的精神不一致”的謬論，在他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宣传部科长馬錫祿、吳其茂、李友竹等在座談杜心源同志准备在省委宣传工作会議上的报告初稿的座談会上攻击省委說：“省委在貫徹百花齐放、百家爭鳴方針的指导思想上有教条主义”。会后馬錫祿以市委宣传部的名义向省委宣传部写报告，要省委从指导思想上检查“教条主义”。

一九五七年召开市团代会之前，陈先澤同志向他請示对团委准备的报告有何意見，他說：对新的問題提得不多，主要是能解除对青年束縛、限制，使他們更活跃，他在这次团代会的开幕式上講話时，也强調要解除对青年思想的束縛和限制。

在大鳴大放时期，他进行煽風点火活动，攻击党的領导和党領导的各項运动。

叶石煽風点火的反党活动，最突出的表現是在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二日在市話剧团的講話。他在講話中說：“过去是敌我矛盾为主，只許規規矩矩，不許乱說乱动，有些人就扩大化了”，“过去对敌斗爭养成了党員怀疑群众，把人民內部矛盾看成是敌我斗爭，把思想問題与政治問題混淆起来”，“我們党是在运动中成长起来的，运动就是整人，学会了一套整人的方法，因此就

培养出整人的党員”，“过去我們党对群众太粗暴，很过分，这应是領导上的責任，今天不能再站在統治者地位，要虛心听取群众意見，扭轉脫离群众的作風”。“偏激是难免的，压了很久怎能不偏？否則就是“收”而不是放，要放就不要怕偏激”。“我們入城以后，住洋房，坐汽車，脐屁影响，养娇了幹部，这股風是从上面吹来的，所以整風就要先整領导”。“党員因为有組織，党是执政的党，因此党員敢討便宜，群众則向隅”。“希望大家大胆地談，以后再不会有肅反那样的运动了”，“以前那些运动，党員都是整人家的，現在人家整我們一下，有什么不可以？”“过去有些同志犯錯誤就記一笔賬，运动来了就整，这就是“零存整付”，以后不会这样了”。“这正是鳴放的机会，目的是教育領导，而不是教育大家”。

叶石还歪曲党的幹部政策和建党工作。他說：“过去是軍事时期，培养的軍事幹部多。今天大力培养知識分子幹部”，“几年来發展党員未走群众路綫”。

叶石对于省委宣传部批評市話剧团演出的“雷雨”、“桃花扇”极端不滿，並借此事公开攻击省委宣传部。他明知話剧团演員对省委宣传部的批評不滿，竟在市話剧团全体工作人員大会上說：“演出‘雷雨’、‘桃花扇’外边意見很多，为什么不可以演？我是硬着头皮，沒有表示态度”。並且說：“有两种艺术，一种是能够立刻产生教育效果的，如在老解放区，演出一出参軍的戏，台下的人就踴跃报名参軍；另一种艺术是曲曲折折为政治服务的，如‘雷雨’、‘桃花扇’就是”。他主张把話剧团固定下来，建立剧場艺术，不必下厂下乡。这說明他和党的文艺为政治服务和文艺为工农服务的方向是有严重分歧的。

一九五七年六月發生“二师事件”时，市委指示叶石亲自去处理，叶却說：“他們正在找我，叫我去挨打嗎？”因而不敢前去。

此外，叶石在去年以前，就先后散布了許多不滿和攻击省委

負責同志的流言蜚語，有些完全是造謠。

叶石反党並不是偶然的。他是一个資产阶級知識分子，虽然入党已二十年，但是，他的資产阶級个人主义的思想、立場，並沒有得到根本的改造。他的名督地位观点严重，有浓厚的驕傲自滿情緒。他認为党对他的"提拔慢了，参加常委迟了"，因而对党不滿，对副市长名次的排列，他也認为把他排后了，表示不滿意。他願意听人奉承、贊揚，不願意受人批評监督，当党的組織对他进行了批評的时候，他就对党表示不滿。在一九四二年整風运动中党會对他的历史問題进行过审查，就对党不滿，和党有了距离。由于他的个人慾望得不到滿足，对党不滿，几年来，工作日益消沉，散布流言蜚語，甚至採取造謠的手段，对領导同志进行攻击。他貪圖享受，生活特殊，想做官不想做事。在两性关系上不够正派，曾和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一个有政治問題的女护士拉拉扯扯，关系曖昧。一九五四年，有一次他还託人由成都带皮袄到北京出售。由于他长期缺乏自我改造一直保持着資产阶級思想，他对社会主义革命有一种本能的不滿，当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和資产阶級右派猖狂进攻的时候，他头脑中的資产阶級思想就活跃起来，接受了修正主义的反动思想影响，这种修正主义的政治观点和他的資产阶級个人主义思想相結合，就使他走上了反党的道路，最后墮落为党內的右派分子。

叶石的問題是在去年八月間开始揭發的。去年十一月市委扩大会上又作了揭發批判。在省委四級幹部会議以前叶石虽然作了几次检討，但未接触主要問題。並在去年十一月市委扩大会前后收回有关笔記，以圖应付。在省委四級幹部会議成都市小組会上，一开始态度就比較老实，接触到主要問題，三次检討一次比一次深入。由于党和同志們的帮助，在最后一次交代中除承認了大家揭發的重要事实外，並主动交代了一些問題，也有所批判，态度較好。

根据以上情况，經一九五八年五月九日中共成都市委第七次

全体会議討論决定：开除右派分子叶石的党籍，撤銷党內外一切职务，另行分配待遇較低的工作（工資級別降三級）。

中共四川省委批准开除右派分子謝文炳的党籍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謝文炳，男，五十八岁，湖北人，中农出身，教授成份，一九四八年七月入党。原任四川大学副校长、校党委常委。

一九二八年后历任武汉大学、成都大学、安徽大学、厦門大学、燕京大学、四川大学英文教員、外国語文教授，一九五〇年后任四川大学校委会主任委員、支部書記、副校长。

一、主要反动言行

1、攻击党对知識分子的政策，反对党对知識分子进行思想改造。謝在学習“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时，認为“从旧社会来的知識分子就其本質説仍然是資产阶級的説法已経过时了”，在一九五七年四月省委宣传工作会議的發言中，恶毒地攻击党对知識分子的政策，反对党对知識分子进行思想改造，他説：“我国的知識分子，特别是高級知識分子，到了现阶段，即社会主义建設的阶段，一般不仅在政治上起了根本的变化，就是在思想上也基本上具备了社会主义思想”，“思想改造在提法上不能老一套，說知識分子个人主义根深蒂固等等提法，都不恰当”。

2、在大鳴大放时期，伙同校內校外的右派分子和四川的右派头目潘大逵等人向党进攻。一九五七年五月潘大逵在[illegible]

家中与謝进行密談，潘告訴謝“罗隆基說党和知識分子的矛盾是党的小知識分子和党外大知識分子的矛盾”，謝說：“这話有道理”，並認为川大党員校长外行多內行少。又向潘說：“农院迁院是有問題的，沒有詳細討論，我当时想把这个問題拿下去討論，但戴校长說省委已作了决定，拿下去討論会搞乱”。謝又攻击当时川大整風說：“川大鳴放还沒有很好展开，大家有顧虑，李政委在川大作报告，沒有讓所有的人听，可能是李政委放不开”。一九五七年五月，謝到極右分子李景清（川大总务长，伪四川省府統計处統計长，統計处国民党区分部書記）家中与李策划向党进攻，他們主要攻击党的領导：“成都市高等学校的党員校、院长有很多外行，电工学院有五个外行，成都工学院有两个外行，川大有两个中学生”，“越是老幹部，宗派主义越严重”，“省委对整風沒有决心”。又支持右派分子徐守愚（川大教授）在党委召开的座談会上放农院迁校不当的問題，准备“将省委一軍”。

3、抗拒党的領导，在党內和党外进行反党的宗派活动。一九五一年，中央和西南局决定由周太玄来川大接替謝文炳担任主任委員，調謝文炳去西师，当时川大在倪受禧、謝文炳等人的策动下，掀起了一个反对周太玄，挽留謝文炳的風潮。一九五三年秋，中央和省委决定彭迪先作川大校长，謝表示不滿，認为彭不能作川大校长，謝对戴伯行同志作第一副校长也表示不滿，認为应当由他作第一副校长。又先后与省委派到川大工作的邻光同志和赵光荣同志採取不合作态度，在幹部中散布，“戴伯行不果断，保守，不抓中心工作。丁耿林是个病号，他当党委書記，不仅不能加强党委領导，反而使戴的工作不好搞”。又积極树立个人威信，与倪受禧互相吹嘘，与倪、李等人搞小集团。在今年二月省委四級幹部会議上，还說把李景清划成極右分子，把徐守愚划成右派分子，他“想不通”。

二、斗爭中态度

态度不好，在許多問題上进行辯解，检討缺乏誠意，交代問題不徹底。

三、結論和处理决定

省委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批示：将謝文炳划为極右分子，开除党籍，撤消其四川大學副校长职务，保留教授职务，降級（由教授三級降为五級）。

共青团四川省委整風領导小組对右派分子賀惠君的处理意見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三日）

賀惠君，（女）四川成都市人，官僚地主家庭出身，學生成份，一九四七年入党。历任青年团成都市委學生部副部长，學校工作部部長，青年团四川省委學校工作部部長，现任共青团四川省委副書記。

賀惠君的錯誤事实：

一、攻击肃反

賀惠君对党审查她的历史心怀不满，到处散布誣蔑肃反的反动言論。如說："省委对敌情估計过高，採用的是胡适的实用主义，大胆假設，小心求証"。"这次肃反，地下党同志都沒有跑脫……，这完全是省委宗派主义情緒的錯誤，是扩大化"。还說："省委把地下党看得太糟了，总認为地下党的复杂，省委有宗

派主义，整地下党”。她对于去年二月李政委报告中所說的“肃反成績是主要的，缺点是不可避免的”，很不滿意，並說：“說得那么容易，把别人搞錯了，說个缺点是不可避免的就算了？”又說：“現在听說民主人士要复查肃反，才忙着修改結論”。

她于一九五六年八月和一九五七年四月先后写了約一万字的“意見”，企圖推翻党对她的全部审查結論，她誣蔑党組織不是“全面的、历史的”看待她的問題，完全否認受了胡風思想影响。她写道：“我的思想与胡風反革命集团的思想不仅毫无共同之处，甚至是毫无相似之处的”，“无論就我的思想面貌和实际行动来考查，是根本沒有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任何跡象的”。她甚至誣蔑說，“沒有看出胡風集团是反革命，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問題，这是全党的問題”。

她还煽風点火，挑起受审查的人对党不滿。她向黄桂芳說：“你不要那么簡单地对待結論，可不要輕易放过。我对結論非一个字一个字的扣不可”。又叫陈賢聪向組織上要結論看，並說：“这是一輩子的事啊！”

二、反对省委去年二月扩大会議的精神，反对阶級分析，散布修正主义的反动理論

她說：“省委二月扩大会議过分强調了阶級斗爭，硬是有問題，与中央精神不符，省委在这个問題上有教条主义”。又說：“李井泉同志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精神有抵触情緒，思想不通”，“李井泉同志如果有自我批評精神，就应该公开承認那个会議的偏差。”她反对去年省委宣传工作会議和省政协会議上印發“草木篇”等材料說：“会上老是發这些文件，好象这些問題严重得很”。李政委批評了她在政协会上的發言对学生思想缺乏阶級分析，她很不滿，散布說：“根本問題是省委和我們对青年的估計看法不一样”。“李政委死死抓住这个問題不放，我看硬有点教条主义”。他把长寿中学团的幹部进行思想工作中有簡单

粗暴的缺点歪曲說是传达了省委二月扩大会議的結果，並亲自在这一調查报告上加批語說："对有敌对阶級情緒的学生，也只能採取长期、耐心的团結教育的方針，不能歧視打击。"一九五七年上半年她在川大講团課时說："土改、三反、五反等阶級斗爭的經驗已經过时了，要放到博物館去了"。

她还散布反对无产阶級专政，反对党的領导的修正主义反动理論說："大規模的阶級斗爭既然已經結束，就意味着国家机器作为鎮压敌人的作用就要逐漸減少了"。"南斯拉夫大力精簡机构，运用工人委員会去代替。这样就使国家权力逐漸削弱，国家逐漸消灭，这确是一个理論性問題，南斯拉夫是有他的理論根据的"。又造謠說："中央正在考虑取消宪法中关于党的領导的明文規定，党将依靠自己的党員在群众中取得信任，通过他們来实現党的主张"。

三、在鳴放期間，把矛头指向省委，向党进攻

当右派向党进攻的时候，賀惠君心情激动，跃跃欲試，写信給范鏡英(团重庆市委組織部副部長，与賀惠君是中央团校同学)說："去年我在北京醞釀着的許多思想、許多观点在这段时間突然成熟起来……好几天来，我总是手痒痒，想写点什么……"。他煽动赵万忠說："現在是大变动时期，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不管是那个，不对就要斗爭"。

她到处散布誣蔑省委說："省委不敢大胆鳴放"、"省委有顧虑"，"成都市各中学停止鳴放一定是省委的意見"，"省委不讓鳴放完全是錯誤的"。又說省委和各大专学校党委思想不通，"把中央精神捂着捏着的，不敢与群众見面"。她向四川日报記者說："四川日报怎么沒有文匯报放得热闹？"；向文匯报記者說："隨便啥事，开始总有人思想不通，你們批評了好嘛！"她曾多次表示要向中央写报告和向邓小平同志反映她对省委的"意見"。去年团中央大学工作部長曾德林同志来成都时，

賀惠君向他“反映”了她对省委的“意見”。章澤同志随小平同志来成都时，賀惠君又向他反映說：有些大专学校党委对学生鬧事問題的看法和我們不一致。

四、大量散播流言蜚語，咒罵各級領导同志

她对省委書記李井泉同志进行了許多恶毒的攻击，想要李井泉同志下台。甚至說：“中央正在下放幹部，若是放个省委書記下来，把李政委調到中央去就好了！”她还攻击杜部长“沒有主見，李政委說啥就是啥”；戴伯行（川大副校长）“很空虛”；吉喆（四川师范学院院长）“老朽昏庸”；崔雄崑（原团四川省委書記）是“伪君子”；史立言（原川西团委書記）“夸夸其談，作風不民主”；李培根“講話罗嗦，不接受意見，在团省委沒有威信”。

五、与賀天熙、苏良沛等結成反党集团，有組織、有綱領、有計划地向党进攻

賀惠君为了达到她的个人野心，一貫进行宗派活动，破坏党的团結。她把党分成“外来”与“地下”。一九五零年她对牛耕（团成都市委常委）說：听說武汉就因为老区同志对地下党同志不信任，現在全体地下党同志已提出罢工。又对黄桂芳（川大团委書記）說：其实地下党的同志差不多都有能力，都作了不少工作，而老区来的幹部，工作能力不强，鬧了不少情緒和問題，党对他們並不怎么計較，对我們反而过不去。她被提为团省委副書記后，認为是“配角”，还說“副書記可当，組織部长絕不会讓我們当的”。

肅反后，以賀天熙、苏良沛、賀惠君为首，包括李曉云（苏良沛的爱人）、詹大風（賀惠君的爱人）曹淋（賀天熙的爱人）共六人互相勾結，結成了反党集团，利用“茶会”的形式，大量散布反对肅反，攻击省委，攻击領导同志和修正主义的反动理

論，在鳴放期中就更为猖狂，活动和联系更为频繁。反右派斗爭开始，賀惠君听了党內的报告以后，即向其反党集团成員洩露机密，打招呼，並且互相訂立攻守同盟，彼此通風报信，企圖抗拒运动。

本人認識和交代程度：

反右斗爭开始后，賀惠君想借口生病蒙混过关。領导上通知她回机关检查，开始也是避重就輕。經过大、小会批判和个别談話，才交代了她的反党思想言行及与賀天熙、苏良沛等結成反党小集团及訂立攻守同盟等主要問題。参加省委四級幹部会后，承認了她是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表示願意悔改。

結論与处理意見：

賀惠君出身官僚地主家庭，受了十几年資产阶級教育，抗战末期，由于爱国主义思想的影响和追求个人出路才参加了党的組織。入党后未認真进行思想改造，反把党的地下工作成績看成是个人的功劳。虽然她一再受到党的重視和提拔，仍然說党对她不信任。解放初期認为党有宗派主义，肃反后对党就更加仇恨，与賀天熙、苏良沛等結成反党集团。在大鳴大放和国际修正主义浪潮的影响下，她便完全站到了右派立場，作为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員之一，与其他成員一道，有組織、有綱領、有計划地向党进攻。大量散布攻击肃反、攻击省委、攻击領导同志和修正主义的反动言論。因此，賀惠君已堕落成为党內的極右分子。但賀惠君是最早交代他們的反党集团和訂立攻守同盟的人。因此，建議从寬处理。即：开除党籍，撤銷一切职务，由十五級降为十八級，留用察看。

中共四川省委批示：同意将賀惠君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撤消原有职务，由十五級降至十八級，另行分配工作。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中共云南省委財貿大口整風領导小組关于处理党内極右分子李文煥的意見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日）

李文煥，男，現年四十二岁，河北省完县人，中农家庭出身，本人学生成份，汉族。一九三八年八月参加革命，同年八月入党。参加革命后先后曾任过科員，会計主任，厂长，科长，站长，办事处副主任，副处长，处长等职。一九五五年七月由西南区合作办事处調来省供銷社工作，任省供銷社副主任。

从李文煥的历史上看，他自加参革命后，屡次动摇，貪汚腐化，对党一貫不老実，两面三刀、阳奉阴违，旧商人意識严重，和私商勾勾搭搭。在軍队搞生产时，屡次违反党的政策，破坏市場和軍政关系等。一九五七年阻碍和破坏省委財經会議的决議，反对和篡改党的对資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政策和供銷社以採購为主的方針，强調云南特殊，不执行总社关于开發山区經济的指示。在反右斗爭和整改中，利用职权包庇右派分子，並支持其爱人李培芝向党进攻。在任用幹部方面，重用地、富、反、坏、右，排挤打击工农幹部。在組織上阳奉阴违，对抗領导，挑撥离間、破坏团結和党的財經紀律等等。但是李文煥在检查时，不正視以上錯誤，态度極不老実，採取拖、推、賴、抗的手段，拒絕党对他的批判和教育。經省委六月十一日批准，划李文煥为極右分子。

根据李文煥上述反党罪恶及其态度，財貿大口整風領导小組于七月十日会議上研究对李的处理意見是：开除党籍、降职降級，工資由原来的十一級降为十五級，撤消現任党内外一切职务，分

配到基层工作。作什么工作請省委决定。当否！請省委指示。

中共云南省委批示：开除李文焕的党籍，撤消原有职务，另行分配待遇較低工作，到内地农場担任生产队副队长，工資由十一級降至十六級。

中共云南省委批准开除右派分子谢加林的党籍

（一九五八年五月）

謝加林，男，三十五岁，云南建水县人，地主兼資本家家庭出身，学生成份，一九四三年四月入党。历任县委書記，地委組織部副部长，省委組織部处长等职，一九五六年任省委組織部副部长。

謝加林是郑敦、王鏡如反党集团的骨干分子，是未經改造的資产阶級知識分子，是抱着个人做伟大事业的不純动机入党的。入党后，拒絕党的改造，一直追求个人的名誉地位，想当城工部长，地委宣传部长，达不到就与党离心离德。謝因公外出，别人代理其职务时，就对党怀疑不滿，以为党看不起他，不尊重他，不把他当个地委委員。当上地委秘書处长后，又不合“兴趣”。任宣传部长时，仍然不滿說：“一切工作有地委書記抓，我落得个清閑，幹多少，算多少”，工作消極不負責任。謝加林在整風鳴放中煽風点火，向党进攻。反右派斗爭中，又支持包庇右派，破坏反右派斗爭。在历史上也是站在地主、資本家的立場，处处为他們着想，征粮时怕侵犯工商业，对地主則强調“說服”。謝执行的郑、王反党集团的一套幹部路綫，在过去政府的保安部时，也把許多特务分子安插在我們重要崗位上。他的反党是一貫的，

由来已久的。除其主要反党言行与郑、王一模一样外，他与郑、王反党头目以及反党骨幹分子梁家等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一九五七年春謝到思茅后，即与梁家互相吹嘘，梁家写給昌恩澤的反党詩，謝甚为欣赏，並为之传颈，繼續为梁家拉攏昌恩澤，以便更好的为梁家服务，並为梁家的“精神爱人”“棉花姑娘”題字留念等等。他們互相勾結，狼狽为奸，幹了許多反党的勾当。

（一）整風鳴放中，煽風点火，破破反右派斗爭。整風开始，謝加林在郑、王反党头子指使下把省委的反右派重点，当成了反党的据点。郑敦到广播电台，王鏡如控制党群大口，謝加林則分掌人民出版社，謝在出版社等地完全按照郑、王意圖进行反党活动。謝煽动出版社的右派向党进攻說，“現在是大变动时期，阶級斗爭已基本結束，內部矛盾突出了”，“大家不要顧慮，要抱着主人翁的态度。国家和党有錯誤，应該提出意見”，“我們沒有什么根本利益不一致的地方，希望大家开誠布公，决不报复”。到处找右派談話，鼓励右派，頗得右派的信任和尊敬。組織部出現了反党大字报后，郑敦、王鏡如、謝加林、臧野农开了秘密会議，謝等坚决主张不批判，要保护右派的积極性。以后謝又将出版社右派的言論加以总結和提高，提出了党和知識分子的“关系問題”，猖狂向党进攻。反右派以后，謝又以沒有右派，挑拨离間，人人过关，組織幹部下乡，混淆大是大非，为右派辯护等阴险的手法，以圖保存右派实力，破坏反右派斗爭。謝离开出版社后才反出了右派，右派分子还来找謝保护。謝到昭通后，仍抗不执行地委关于反右派的指示，使右派反不下去。

（二）执行郑、王反党集团的幹部路綫。

謝不提工农幹部的培养和提高，而强調“必須克服輕視知識、輕視技术的傾向，充分發揮技术幹部的潛力”，他在組織部所依靠的也是一批未經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反、坏、右分子。肃反时文山地委拟定刘振江为阶級異己分子，謝不同意說：“地委也

有缺点……"。不同意开除抽大烟的女流氓出党，对右派分子苏澂、李茂奇等十分賞識，还准备将李提为副处长。学習"八大"文件时，以謝加林为首的，成立了"提高研究小組"，其成員全是右派分子。因此，在他們領导下，放出了大量的反党言行。省委党校的四个教研室五个正副主任及实际負責人中，有四人是有严重問題的，对这些人，謝都極賞揚。省委决定加强党校的幹部配备，謝则执行郑、王指示，强調党校潛力大，不給配幹部，而将自幼受法西斯培养的李耀东提为党委副書記，陈尔弼（反革命分子）、童澤民（坏分子）安插到文化学校，並吸收童重新入党。国民党区党部执行委員郑汝磐，謝也一貫吹嘘。使右、反、坏分子篡夺了党校、文化学校的一定的領导权。反之，他却丑化和打击老幹部和工农幹部，誣蔑农民幹部"放債、买田、雇工、出租土地做生意、搶購粮食者佔三分之一强"。四級幹部会議間，与郑、王一起要打击王靜同志，發动幹部处同志攻击閻南君、李清祥等同志，誣蔑閻"机械，头脑簡单"，"田芳春蛻化了"，企圖将老幹部致于死地。此外，謝借口幹部地方化，說内地民族自治县要配民族幹部来当第一書記，"要把是否能联系民族群众，真实地反映民族群众的意見与要求，作为挑选与考核民族幹部的重要标准之一"，与郑、王同出一轍。在穩定提高幹部的方針提出后，一九五七年謝受郑、王的指使到思茅后与梁家一起布置地委組織部提拔知識分子幹部、技术幹部和民族幹部，並規定了調整第一書記的三个标准是：（1）不称职；（2）文化低；（3）历史不清。要对全区的县委第一書記作普遍的調整。阴謀把老骨幹撵走，由地、富、反、坏、右来篡夺党的領导权。

（三）不执行党委的决議和指示，攻击省委。

省党代会后，攻击省委不虚心，不民主，並参与臧野农向省委写的"最后通牒"，在整風下放到昭通工作时，又拒絕执行地委对反右派斗爭和生产大跃进的指示。

謝加林的态度是很不老实的，开始說自己沒有个人主义，最

多只是思想問題，第二次检査虽戴了帽子，但具体事实全部否定，並說，不是有意識的反党，他还有正确的地方。領导小組三次要他写書面检査交代，抗不执行。

中共云南省委批准：开除右派分子謝加林的党籍。

中共云南省委批准
开除右派分子梁家的党籍

（一九五八年五月）

梁家，反右斗爭前任思茅地委書記。

（一）污蔑省委領导同志，反对省委領导，破坏地委集体領导。他到处散布說：“宋政委在的时候待人很热情，現在的省委接近不上”，他在幹部面前到处污蔑謝富治同志說：“謝政委不了解情况，乱批評我們”，“二月地書会上謝政委駡了我二十八次，駡黄天明三十一次”。高喜峰在元江开会，电話传达謝政委的指示，梁家每看到电話記录就說：“哼！傾盆大雨又来了”。高喜峰从元江开会回地委，当講到謝政委批評思茅的时候，梁家就恶狠狠的說：“謝政委就是駡人”。污蔑于一川同志，“沒有鍛炼，說話沒有譜气”。他对省委各部門的負責同志，也統統进行过人身攻击。他对省委两位主要負責同志这样的丑化污蔑，絕不是一般的不滿，而是証明他对党有刻骨仇恨的实际表現。

对省委請示問題，梁家說：“我有一条經驗，請示省委解决問題，要放連珠砲，机关槍，一个接着一个，否則，不解决問題”。他就是用这个“經驗”，为調拨粮食問題，接連向省委發了十三份“通牒書”（这是鄭敦在那里时發的），煽动幹部反对

省委說："对省委各部和上級党委不要迷信，思茅区的幹部对省委太老实了，老实人会吃亏的"，"省边委就是只从民族方面考虑問題，省委宣传部就是不行，它下發的东西要頂回去，云南日报沒有思想性"。对調幹部問題，办农場問題，修建房子問題，地委搬家問題等等，他都煽动过幹部反对省委或者挑撥过省委各部的关系。

他对反党集团的头子和骨幹分子郑敦、王鏡如和謝加林，則是另外一种态度，尽量为他們吹噓，在幹部中树立他們的威信說："郑敦进步快，到晋宁是为了創造当好县書的經驗"，"王鏡如是老幹部，老县委書記"，"謝加林忠誠老实，态度很好"。这与他对待省委的态度就成了一个極为显明的对照。

他对省委一切指示不传达，破坏地委集体領导，宣揚个人一套，他破坏地委集体領导的主要手法是吸收很多沒經过改造的知識分子幹部（科长、副部长等）参加地委扩大会，以代替地委常委会。常以"統一思想"为幌子，使別人接受他的反党阴謀，企圖使地委会成为他反党的工具。

（二）忠实的执行郑、王反党集团的幹部路綫。梁家在思茅到处打击老幹部，拉攏、重用知識分子幹部和对党不滿的幹部，包庇地、富、反、坏、右分子。

一九五六年党代会期間，打击老幹部尤为突出。他假传是省委指示（郑敦策划的）騙取地委同意，斗爭孙明同志，三次斗爭馬田存同志，企圖把他們赶走。他利用党代会，除强調选县委委員要：（1）本地幹部；（2）民族幹部；（3）[illegible]幹部。企圖把外来幹部全部赶走外，还亲自跑过普洱、[illegible]江、景谷等县，策划以毛[illegible]（右派）代替馬田存，以孙忠秀（本地知識分子）代替蘆修桃，以宋光（右派）代替王[illegible]，企圖把外来第一書記赶走，並散布"老幹部只能当总統，不能当总理，不能放在最重要的工作崗位上"等等謬論，在思茅区到处流行，对边疆工农幹部[illegible]县委第一書記，梁家始終反对，[illegible]幹部，說："都是些

干脆不要”。

到处封官許願安釘子。封王坚为地委常委、組織部长，尹宜公为地委委員、宣传部长，苟彬为地委委員、文教部长，昌恩澤为副州长（均系地方幹部），省委未批准，梁家又挑动他們对省委不滿。

到处散布地方主义，拉攏对党不滿的人。昌恩澤找他談思想問題，梁家就送他一首詩：

想当年，　　綠叶婆娑；　　自归郎手，
青少黄多；　休提起，　　　提起来珠泪洒江河。

他形容地下时期如何得势，解放后如何倒霉。梁家說：“老幹部提級是照顧，新幹部提級是应当的”。老幹部衰退，蛻化，新幹部文化高，进步快，作用大。

（三）积极破坏反右派斗争。在整个反右派斗争运动中梁家的态度是：（1）当右派猖狂向党进攻，反右派还未开展时，梁家积極召开各种座談会（文教界），煽風点火，組織平反，配合右派向党进攻。右派駡我們之后，梁家一一握手道謝說：“人不伤心不落泪，树不剝皮不会死”，肃反伤了大家的心，我們这些人脱光了衣服都是一样的人，我代表地委向大家道歉”；（2）反右派斗爭刚开始，思茅区还未認真鳴放，他即违背省委“想尽一切办法放透，把右派放出来坚决反击”的精神到处作报告，大叫徹底反右派，組織右派退却，造成鳴放困难；（3）反右派激烈进行中，他又到处作“整風和反右派斗爭”的报告，污蔑党对知識分子是宗派主义，党对工人农民是官僚主义，党对少数民族是大汉族主义，党对商业工作是主观主义，並把这一切归罪于老幹部的蛻化。他强調“反右派斗爭是人民内部的阶級斗爭，要和風細雨”，“一面反右派，一面反三个主义”，有意轉移反右派的斗爭目标，制造混乱；（4）处理右派分子的时候，梁家又强調“宽大处理，多加照顧”，开右派座談会，給右派带信去北京控告，並煽动右派翻案。因此，右派称梁家是“思茅区的太阳，

梁家的声音，才真正是党的声音”。

尤其阴险的是他趁分区負責同志多数外出剿匪之机，积極策划破坏分区的反右派斗爭，企圖把分区領导赶下台，掌握武装，进行他的反党活动。

（四）对边疆民族政策方針問題上直接和省委相对抗，他积極主张边疆要全寨入社才适应民族特点。他很早就主张地主入社，地主子女入党入团。他重点試办的一个“高級社”，地主分子，民族上層佔一半多。主张扩大自留地。在直接过渡地区对待債务問題和奴隶問題上，他背着省委，对下提出与省委完全相反的政策。对奴隶解放政策篡改为：“奴隶主和奴隶一齐入社，發展生产自己贖身”，对边疆鎮反省委一九五七年提出的“零打碎敲，不放松有利时机捞一把”，故意改为“零敲碎打，碎步前进”的方針。恶毒地是所有这些，都是省委明确提出以后，或他提出經过省委駁斥而仍然背着进行的，显然是反省委的。

对边疆幹部，他主张党委机关尤其是党委領导幹部要民族化，污蔑汉族幹部有統治民族幹部的“五条繩子”。到处罵大汉族主义，根本不提反对地方民族主义。

（五）对于农村，他和郑、王一样，到处找阴暗面說，农村有“四死五不够”，“支部是脫离群众的宗派主义集团”。富裕农民罵“社会主义是有柴无米，火烧鍋底”，他贊揚說：“这才真正是代表了农民的要求”。

梁家的全部反党活动，証明他的政治綱領，組織綱領和郑、王完全一样，而且在时間上，手法上也几乎完全是一致的。梁家是郑、王反党集团的骨幹分子。

中共云南省委批示：开除右派分子梁家的党籍。

中共云南省委批准
开除右派分子全明的党籍

（一九五八年五月）

全明，反右派斗爭前任云南省玉溪地委副書記。根据玉溪地委对全明揭發的材料来看，証明全是郑敦、王鏡如反党集团中的骨幹分子之一，是个人主义野心家，他是为了謀求个人出路而入党的，入党后又时时为着自己的权位打算。在越南时，走私漏稅，武装販运大烟，无所不为。对广东、云南部队採取不同的对待方法。到省稅局以后，又拉攏一批反、坏分子，留用人員，以及利用一些未經改造的知識分子，有地方主义情緒的人，排斥打击老幹部。离开稅局后，又想当省委办公厅副主任、楚雄地委副書記。全明是带着郑敦的指示到玉溪去的，郑找全談話，說刘世杰同志即将調去学習，暗示地委第一書記将由全担任。之后，全与郑一直保持密切联系，凡郑来玉溪，全必相随，郑一九五五年在峨山試点三定，全主动要同去。玉溪一有什么事情，即传到郑、王那里，如說刘世杰同志，粮食問題右傾等，都先由郑王那里传来。全調省前，王鏡如与全談过一次話，以后即强迫刘世杰同志检討，王並說“党內有反对意见，並不是坏事”。全明調昆明后，郑、王仍找全几次談話。以上材料証明他們反党完全是有計划有目的。

（一）反对党

1.反对党的幹部路綫，仇視打击和陷害老幹部，培植其反动势力，全明一方面丑化老幹部，散布玉溪地委第一書記刘世杰同志

“粗暴”“专横”，“土皇上”“不民主”，誣蔑刘接待中央、省委負責同志是“思想意識坏，不正派”，甚至說是“舐屁股”等等。誣蔑尚雁三同志“引誘青年”，“庸俗，思想性不强”等。借审幹之机进行打击，說尚雁三是“托匪”。捏造昆阳县書記馮貴东不經地委同意私自将其爱人赵印，列为县委候选人。另一方面組織以全明、刘德俊为首，包括赵文林、楊树發、姚自强等主要成員，同时勾結右派分子唐茂昌、楊策等一批未經改造的青年知識分子，組成反党集团，企圖篡夺地委領导。早在省税局期間，全明就依靠了一批反、坏分子（如資产阶級代理人何汝昌、反革命分子叶琳等），留用人員（傅震云等），拉攏和利用一些未經改造的青年知識分子和有地方主义情緒的人（方良謀等），排斥和打击党的老幹部（如刘征、閻毅力同志等），其反党活动是一貫的。

2.反对党的民主集中制，独斷专行。全明总是把个人意見以地委名义在各种会議上出現，以騙取信任，实則他在任何会議中的报告，根本未經地委研究，也未与其他同志事先商量，擅自召开一些会議布置工作，地委决定的問題，全要另外搞一套。

全明上反地委，下反基層支部。他布置地委的三个重点乡要党社分工，党政分工，主张合作社管生产，支部管思想、管政策，乡政府管行政”。事后据支書反映，乡社幹部扯架，支書連挂党旗的地方也沒有，开会点灯連油都沒有，工作上支部与合作社互相推。

搞極端民主，在粮食三定中，全根本不講發动群众，批判資本主义思想，进行对敌斗争，而是强調領导必須检討，重点批判，处分党員，强調扩大民主，搜集材料，对县委区委开展批評。結果改組了支部，候补党員当了支書。党代会問題上，全通报了郑玟的“只有向县委斗爭才有民主”的經驗，並說晋宁党代会不民主，要昆阳不再重演。煽动别人說“过去集中多了，一些人整天見不到老婆”，恶毒的攻击說“幹部当了家，社員是奴隶，

没有民主”。

（二）反对社会主义

1.反对农业合作化。全明主张合作化运动要少、慢、小，理由是“合作化快了，多了，大了，会影响生产”。强調自願入社，並且說“为什么要速度这样快，是刘世杰搞个人突出”。实际工作中，他極力反对一乡一社，並且当合作化基本实現后，到处搜集材料，否定成績，大肆攻击“合作化不如单幹戶”“副业管理不如单幹时好”，同时他也进行反“冒进”的活动，痛罵搞合作化是“主观主义，是小資产阶級的劣根性，盲目性，疯狂性、片面性”。

2.反对先进生产指标和措施。全明抓住在推广已試驗成功的先进經驗中的个别缺点，即大肆攻击說“幹部强迫农民栽‘梅花蔸’这是把人家当作奴隶，自己当作老板”，最后甚至說这是“无产阶級专政的阴暗面”。並假借“馬繼孔同志說了，生产指标不要規定太死了”，反对地委扩大油菜籽种植面积的决議。

3.歪曲粮食政策。在粮食問題上，全主张少購多銷。一九五六年公开頂回省委分配的粮食任务，並在县書会議上布置說“要尽量少購，粮食还可以多銷一点”。还一概否定过去的粮食工作成績。

4.支持同情和贊揚右派言論、破坏反右派斗爭。全在外貿局主张把反党大字报轉到各单位去交流，看到攻击謝政委是“官僚主义”的大字报，就說“把它标出来”，另一方面，他極力贊賞極右分子黄中流“有能力，可以当科长”，当幹部匯报資产阶級的进攻情况时，全反問“資产阶級是否有点好事”，又說“人家业务熟悉”。划右派时，不同意将曹珍、叶琳划为右派，說“他們不是根本上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只是对党組領导不滿”。

此外，全明生活也是極端糜烂的，全为了作一件大衣，翻遍

了所有苏联画报，光选择式样就花了两个月时間。

中共云南省委批准：开除右派分子全明的党籍。

中共云南省委批准
开除右派分子黄平的党籍

（一九五八年五月）

黄平，反右派斗爭前任云南省衛生厅副厅长。是一个政治野心家，是反党集团的骨幹分子之一。早在一九三五年，黄平在橫县讀初中时，曾以托派观点發表过文章，托派校长商达才也曾指使黄以学生自治会主席的身份捧商为伪县长。一九四零年黄任广西省三靑团主办的战地服务团的分队长，同时又在广西省伪地方行政幹校任指导員，在反动統治时期黄就是反动派，一直到最近，黄在作形势报告时，还为敌人宣传說：“日內瓦会議不能成功，第三次世界大战一定会爆發”。一九三八年混入党后，又于一九三九年借口升学，自由脫党。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在云南陆良重新入党后，其反动的政治本質沒有得到改造，怀着十分狂妄的政治野心要筹划組織所謂“康艾边区”，和当时的区党委对抗，在解放軍入城以前，即搶夺了丽江，保山，大理三个专区，作为其反党的根据地，大理曾出现“黄平万岁”的标語，黄平也有“滇西王”之称。“跃馬蒼山十九峰”是他个人野心的总暴露。解放后，对担任保山专員不滿，任省农协秘书长时，一方面感到自己是“破帽遮顏过鬧市”十分委屈；另一方面，則在农协飞揚跋扈，省农协有第二个“省委”之称。調省衛生厅任副厅长时又說：“这是为官，也非正道”，在工作中繼續反对党的政治路綫和組織路綫。除了黄平的反党言行与郑、王反党头目同出一轍外，他們之

間也有着密切的联系，这联系是通过袁用之来进行的，袁受处分后，郑敦即指示袁說：“你要出去多走走，找黃平，蘆华澤、岳世华等談談”，以后袁經常去找黃平談話，互相散播对党的不滿，共同誣蔑中央和省委。

（一）反对中央、省委和地委。黃經常指責中央衛生部“这不行，那不行，这个会議，那个会議，开得一团糟”，誣蔑中央衛生部賀彪同志的报告沒有思想性，曾公开在会上說：“中央提出的公費医疗問題，联合診所問題，基層組織問題，並未能解決問題，且这些問題是我老早就提出来了的”。提倡对“中央、省委的东西要怀疑，要嗅一嗅”。

省委的負責同志都被他誣蔑过，說：謝富治同志是“工农幹部，沒有文化”，于一川同志是“教条主义”，对郭影秋同志主持对他的审查也極为不滿。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后，黃对馬繼孔同志所作的报告，公开写信誣蔑是“主观主义”，“大国主义”等等。黃認为省委宣传部不懂衛生业务，不能領导衛生厅，說：“要检查衛生厅，最好先熟悉业务再来”。黃藉口反对特殊，不經請示，即自行決定取消对高級幹部公費医疗优先照顧以及幹部子女公費医疗的規定。在群众中散布省委不应該成立医务室的空气，並且一再要撤銷它，提出撤銷防治血吸虫病五人小組办公室，以实現其个人野心。

在保山时，大軍入城不到三天，黃即誣蔑解放軍如何不好，后来又挑拨地委書記郑刚同志和蔡叶生同志的关系，以达其破坏党的团結，篡夺党的領导的目的。

对基層党委他也反对，不同意向文教党委匯报情况，並說：“管他什么党委不党委”。

（二）打击老幹部，包庇和重用地富反坏右分子。不願听副厅长张其榜同志的發言，当場說：“不要說那么多了”，經常拆张的台，凡张决定的事，黃都反对，並且經常以“老資格”来諷刺张其榜同志。对办公室主任，以不能批閱公文为理由，擱置不

理，不給分配工作。此外，如許光波、王光海等亦被打击排挤，誣蔑說：“老幹部文化低，能力弱，脑子不够用”。因此得出了不能依靠老幹部的結論說：“工厂依靠工人，我依靠誰呀”。

黄依靠的都是地富反坏右分子，並經常为他們撑腰，右派分子周之風，蘆华澤，高庆余，特嫌、特务分子戴旭东，郑玲才，李文奎，反动将官李育仁等均是他的心腹。黄准备将右派分子周之風調作衛生厅办公室主任，周划为右派后，黄还認为是好幹部，是思想問題，不是政治問題。一九五七年極力为昆华医院活动为模范单位。李文奎是特务，却安置在人事科，掌握人事科的建党建团工作。最近还准备将国民党中将提拔为防疫站的科长。黄依靠地富反坏右分子也不是偶然的，早在边縱时，七支队五个团的正副团长和政委均是特务和反动軍官，並吸收大批的地主恶霸，反动軍官，特务分子入党。在保山工作期間，也是如此。反右斗爭中，他只組織3—5人来“反右派”，宣揚右派分子蘆华澤“审幹后进步很大”，有意的破坏反右派斗爭。

（三）破坏民主集中制的原則。一九五四年，张其榜同志主张从科长中挑选五人参加党組，黄主张副科长（包括預备党員）以上党員参加，爭执不下，报省委时，黄只报了自己的意见。平日开会，黄对别人發言不是虚心傾听，而是一一“批駁”。

中共云南省委批准：开除右派分子黄平的党籍。

中共云南省委批准开除
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姜必德的党籍

（一九五八年五月）

姜必德，男，現年四十岁，云南弥勒县人，資产阶級家庭出身，本人教員成份。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入党，曾任边縱排长、指导員、教导員，解放后任副县长、地委組織部长、省委組織部办公室主任，地委委員、县委書記、市委常委委員，箇旧市长。

根据本人交代和几次座談会的揭發，和市人委党組整理的材料，証明姜是郑敦、王鏡如反党集团的骨幹分子。一九五一年姜在中央組織工作会議上坚决的反对中央以外来幹部为主和初步整党的方針，得到郑敦的賞識，因此整党后，郑明知姜有严重的問題不能担任党委工作，但为了在組織部培植其反动势力，仍将姜調任省委組織部办公室主任，作为他的忠实帮兇，有“二部长”之称。省委派姜到建水工作时，郑說“为了将来办更大的事”。以后郑又有意的删去了姜的历史問題，向中央作了隐瞒，使姜进一步窃取了个箇旧市长的要职。姜忠心的按照反党集团的企圖，串連了刘玉振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

（一）一貫反对党的領导

1. 反对党的民主集中制。在宜良地委时，拉攏同志打击地委第一書記，要求省委撤換書記。一九五四年，姜又借省委組織部写綜合报告为題，系統的全面的污蔑各級党委的集体領导，說：“省委，地（市）委的集体領导存在着很多缺点和錯誤”，“大

多数县委集体领导不健全，或者多数未建立起来”。

2.反对党的幹部路綫。姜反对“外来为主”的正确方針，污蔑不少老幹部安于现状，不求进步，主观狭隘，不接受新鮮事物，凭老資格吃飯，老幹部横行霸道，目无組織，“蜕化了”認为老幹部“过时了”，“可以取而代之了”。实际行动中，对王静、黄天明、徐珍、賈波、魏青山等老幹部就排斥打击和陷害。同时积極組織反党班子，以夺取党的領导。一九四九年派坏分子刘一民任弥勒副县长，把大恶霸姜然送革大学習。专署六个科的領导是反、坏分子，七个县公安局长中，六个是反革命分子，他們安排許多人搞了不少鬼。一九五三年起組織部办公室的要害全为姜的亲信反坏、右所掌握。在建水又勾結右派分子沈紹顔等反抗地委，在箇旧也将反动党团骨幹分子王文华，地主恶霸艾明等視为亲信，加以重用。

3.反对整党。捏造“党的政策貫徹不下去，主要是幹部思想作風問題”，“宣良党的組織不能說是被坏分子所掌握”等为理由，反对云南的初步整党。經过严厉批評后，表面上承認整党是必要的，但一方面又以拖延处理案件，另一方面要整老幹部的思想作風問題，破坏中央、省委对云南地下党的整頓。

（二）反对社会主义

1.反抗优先發展云錫国营企业的方針。並始終违抗省、市委不願将地方工业移交云錫的决定，說“地方工业是沒娘的孩子，云錫欺人太甚，是大魚吃小魚”。提出“与云錫斗爭到底的政策”，鼓吹地方工业的同志要在下面頂，不要軟呼呼的，要狠狠的燒，揚言“是斗爭的时候了，是决策的时候了”，与資产阶級分子李奐若等的“坚持与云錫斗爭到底，与国营經济斗爭到底”，如出一轍。

2.污蔑社会主义城乡关系为对立的資本主义的城乡关系，說“农村工作同志对支援工业城市是：有多余就支援，沒有多余的

就不支援，因而对支援城市就不够积極，有的甚至採取若干限制出口的办法来保証本地需要，实际上是形成了对城市的封鎖”。造成工农关系，城乡关系恶化。

3.反对农业合作化，和計划供应。姜把一切罪过均归罪于合作化，污蔑“稻草紧张的原因，主要是农民所有稻草大多折价入了社”，污蔑“蔬菜供应也因蒙自商販組織起来集中收購而一度紧张”。

（三）反对无产阶級专政

姜长期以来反对党的肃反政策，一方面散布“用群众运动搞肃反不应該”的謬論，另一方面包庇縱容反革命分子，安插反革命分子重要职务，反革命沒有受到应有的打击。如一九五七年省委决定打击地富的反攻倒算，姜抵触，开始消極应付，繼而拖延不管，說“忘記了”。对市人委机关肃反审幹从来不加問聞。拖延不写有关証明材料。此外破坏反右派斗爭，以圖保存其反革命实力。

（四）姜历史上就是反革命分子

姜一九三八年参加国民党，一九四〇年混入我党后，未經請示报告，又于一九四五年参加三青团，並任三青团筹备处宣传股长和書記，發展了三青团員五十多人，並要所有担任学校行政領导职务的共产党員均参加三青团。一九四七年下半年，姜又参加民社党为宣传股长，同年任伪弥勒县府社会科主办科員，曾从事“防范異党活动”。姜在解放后，仍一直縱容包庇反革命分子，一九五〇年初三青团主任楊树琪到宜良找姜，姜不仅不逮捕楊，反而把楊放走，並介紹到軍分区去找他哥哥。此外安插了青年党省委委員王以和为专署工商科副科长，土匪头子孔庆溢为公安处处长，为反革命分子张家漢說情等等。这些事实說明，姜是反动党团員骨幹分子，解放后並无悔改表現，一直与人民为敌，繼續进行其

反革命活动。

中共云南省委批准：开除右派分子娄必德的党籍。

中共云南省委
批准开除右派分子董学隆的党籍

（一九五八年五月）

董学隆，男，現年三十二岁，云南人，官僚資产阶級家庭出身，本人成份学生，共产党員，团中央候补委員，团云南省委常委、副书記，团校校长，极右分子。

一、主要的右派言行

（1）反对党的領导。誣蔑省委領导同志有特权，是保守主义，教条主义，压服青年，在全省团的幹部中煽动以“三颇”的精神（颇着不要党籍，颇着不要烏紗帽，颇着不怕蹲监牢）去反党，鼓励以“三打祝家庄”和“大破东平府”的精神去向省委頂板。

（2）篡改共青团的政治方向。在团員和青年中，反对阶級分析，散布資产阶級的自由民主，提倡个人主义，支持云大阶孟如（右派）师院舒世衡（右派）的反动言行，在学生中提倡“言志”。主张团的工作脱离党的中心工作，以文化活动为团的中心工作，企図把共青团改为資产阶級的文化俱乐部。

（3）組織反党小集团，密謀篡夺团省委的領导权。拉攏何永琼，楊一堂、刘培羽、何岳俊、沈潔等，組織反党小集团，到处煽風点火，率領小集团成員大举向党进攻。

二、反右派斗爭中表現

交代不徹底，大部分是在群众揭發后被迫承認，对自己錯誤認識不够，但表示願意低头認罪。

三、处理意見

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劳动教养。

中共貴州省邮电管理局党組关于右派分子白晶五的組織結論

（一九五八年九月九日）

白晶五，貴州省邮电管理局局長，党組書記，是一个隐藏在党内的徹头徹尾的資产阶級右派分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急先鋒。他的反党言行，早在整風之前（一九五七年二月一日），給省委的一封信（万言書）中就已經全面地、完整地暴露出来了。平时也有一系列的反党言行。直到整風运动开始后，还繼續放毒。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主要是：

（1）攻击党組織和領导幹部，抗拒党的領导，与党鬧分裂，把邮电部門当成自己的独立王国。

白晶五竭力攻击党不重視邮电工作，他不仅把中苏两国和資本主义国家相提並論，而且污蔑我国邮电工作不如資本主义国家，他說："苏联和許多資本主义国家都相当重視邮电，而中国特别是貴州党还不太理解这問題"，这实質上是在丑化社会主义制度，美化並宣揚資本主义制度。他反对党对邮电工作的統一領导，污

蔑省委是"大厅主义"，"中心工作唯一主义"。"只相信自己领导下的那一伙人，不認識邮电系統这一家人"，並声称自己是"党内的外路人"，公然与党分庭抗礼。他又攻击中央邮电部是个"庞大的、拥有人数众多的、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机构"，掌握不了邮电工作的"高度集中和高度分散"，不管贵州小省，指导思想是"大省主义"。完全否定了中央邮电部的領导作用。他宣揚外行不能領导內行，認为党"对科学、对新事物还表現得盲目无知"，不能領导这个"一年入不了門、三年不能熟悉"的邮电工作，只有他們那里長期"往一个眼上鑽"的各种"专家"，和連續搞"一代两代三代"的旧职員，才能搞好邮电工作。由此，他在工作中，經常表現出对党的領导抵触和不滿，对省委負責同志的指示，常採取阳奉阴違的态度，当面表示尊重，一出大門就詆毀領导。他用極其恶毒的言詞謾罵領导，直至中央負責同志。他不仅自己抗拒領导，而且还煽动邮电部門幹部和他一道进行反党。他利用某些幹部对工資和其他方面的不滿情緒，挑撥他們記恨省委，向省委进攻，自己則从中作好人。他公然在分片邮电会議上，發出反党动員号令，指示县局長，"对县委不能百依百順，如果县長批評你是本位主义，你就告訴他这是社会主义"。他对县、市委抽調邮电幹部去搞中心工作及調走邮电幹部，也極其不滿。总之，白晶五既抗拒"条条"的領导，又抗拒"塊塊"的領导，力圖使貴州邮电部門，成为独立王国。

（2）歪曲党的方針政策，特別是对幹部政策进行了系統的、全面的攻击。

白晶五汚蔑一九五六年，大胆大量提拔幹部是"拋开了德才兼备的幹部政策，避开老骨幹，抓新幹部"，"热火朝天象發疯一样狂"，完全否定了一九五六年提拔幹部的成績。特別是，无中生有地攻击省委在执行幹部政策上有宗派主义，硬說省委"拿有色眼鏡看人"。对邮电幹部"有偏見、有成見"，抓住一点缺点，"就盖棺論定終身"，或者"当小辮子来拉，以此来代替挖

制汽車的方向盘或唐三藏的紧箍咒”。对大厅局的幹部是“連升三級，全套升官”，而邮电部門則未提到一个，这是“大厅主义”和“中心工作唯一主义”，把邮电幹部“置于耳后了”。他对省委和接近省委領导的同志，尽情加以污蔑和丑化，說貴州省委“兴活动”，某些領导幹部在大胆大量提拔幹部中“趁机發展个人崇拜”。罵省委領导“褲当里藏着狐狸尾巴”。罵接近領导的同志有“太监作風”。他甚至更全面的攻击說：“共产党就是宗派集团，如果不整風，共产党就要变成国民党。”这充分說明他和党的关系，已完全处于对立状态，他在攻击省委有宗派主义的同时，还攻击省委鬧地方主义，說省委在中央部門調动幹部时，“鎮压条条調动人的权利，施塊塊的威風”。企圖挑拨省委和中央部門的关系。其用心是十分恶毒的。

白晶五攻击幹部政策的手法是巧妙的。他以“主持公道”的面目出現，表示維护本部門幹部的利益，尽力夸大吹嘘本部門幹部的才能，以籠絡人心，培植私人势力，作为反党資本。他借以說明省委有意不提拔邮电部門的“优秀”幹部，同时，对其他部門的幹部加以污蔑，並以此作为指責省委宗派主义的根据，他宣称，邮电部門幹部是“資格老，品質好不会鬧这鬧那，整日埋头本分事，两耳不聞外家声，是早已树立了正确人生观和事业心的，吹拍拉扯的人到不了这里来”，“論业务有各种公認的专家”。对别的部門的幹部則污蔑为“睡觉大王，怠工专家，按酬付劳分子。所提拔的幹部，凭什么也比不上邮电部門的幹部，邮电局的一个科长也要比省委副部长”。还狂妄无恥的自我吹嘘說：“凭政治，凭理論，凭业务知識，凭半生过来对党的足跡，凭某些認識水平，省委常委都不在他的眼下”。他疯狂地要和省委領导“換換班試一試，看誰行，誰不行”，他甚至威脅党說，不正确的幹部政策已給邮电局領导带来不团結了，如再不滿足他的个人慾望，就“不能团結积極因素繼續前进”，“就会起紛爭，就会乱，就会葬送了革命事业”。更恶劣的是，他竟把党

看作是封建王朝的統治阶級，声称自己是“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人”。白晶五完全丧失了党的立場。

白晶五对于党的其他方針政策，也有許多抵触和不满，並且阳奉阴违地拒不执行党的方針政策。整風中，他站在反冒进的立場来看待省委宣传会議上放出的意见和右派言論。認为“都是一九五六年跑得太快搞出来的”。他不贊成用大鳴大放、大字报的方式进行整風。他害怕轟轟烈烈的鳴放运动，主张組織武装到局站崗，而另一方面，他又数次用无原則的話动員群众鳴放，叫大家“不要怕說話，再放也放不出反革命”，实际上是起了煽动的作用。中央号召幹部参加体力劳动时，群众热烈討論，他却說“这样作不經济”，並說周省长参加体力劳动，“是形式主义”，否定領导幹部参加体力劳动的意义。在历次对敌斗争中，一貫以严重右傾的观点認为邮电部門沒有問題，但事实上，肅反中查出了二十二个反革命，整風中出現了二十九个右派分子。他对粮食統購統銷也有不滿情緒，一九五四年他从山东家乡回局后，把实行統購統銷后的农民生活，描写得很紧张，很苦。

（3）对国际問題發表修正主义的謬論。

白晶五否認波匈事件的原因是由于国內外反革命分子的暴乱，而認为是“由于波匈两国党的領导人有严重的錯誤，长期不改，人民生活苦，連煤都沒烧的，所以人民起来暴乱”。对于一九五三年的柏林事件，也同样散佈这种論点，認为“主要是由于民主德国只注意發展工业，使粮食成問題，所以群众暴动”。白晶五这种論点是和国际修正主义者，帝国主义走狗鉄托一腔一調的。

（4）完全丧失立場，多次包庇坏人坏事，竭力为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坏分子的罪行作辯护。

据群众揭發，他前后包庇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坏分子共有十余人之多，肅反中，他对罪恶深重的大汗奸馬德阴的处理主张重罪輕判。当肅反战斗小組斗爭坏分子刘体智时，他为刘帮

腔，並給以安慰，認为群众"斗爭过火"了。致使群众憤憤不滿。他从北京高級党校学習回来后，向党算了四笔帐，一是把一九五六年的跃进說成是冒进，否定一九五六年跃进的成績；二是批評局里其他領导同志"掌握肃反政策太不稳"，这也錯那也錯，为反革命分子算肃反帐，否定肃反成績；三是批評幹部提多了；四是批評知識分子提錯了，並把自己主张提的一个坏分子也算在党組的帐上。他又追溯过去历次运动，說"几次运动得罪了几批人"，对敌人深表怜憫。整風中，他明目张胆地包庇右派分子姚繼虞，不同意划为右派，甚至还把姚当积極分子使用。平时夸姚是"紅色专家"，私自批准以姚为首的一批人（大部分是政治上有問題的人，其中六人已成右派）成立"貴阳市邮电青年文学創作小組"，在內部刊物"貴州邮电"上出文艺副刊（登过一些毒草），实际上是帮助他們建立反党基地。他还提出把另一个右派分子作为中右标兵。他对局里的一个坏分子不仅明知不問，当群众揭發时，还为其出主意掩盖犯罪行为。他任意吸收有政治問題和对党有仇恨的人参加工作。並多次主张把一些政治历史有問題的人吸收入党。白晶五已完全和敌人站到一个立場上去了。

（5）一貫散布流言蜚語，誹謗、打击別人，抬高自己，制造个人崇拜，甚至拉拉扯扯，进行宗派活动。

白晶五多年来經常丑化、中伤其他領导同志，抬高自己，其攻击已达到有你无我的地步；並且不惜降低党的威信来树立个人威信，使群众崇拜自己。他对提意见尖銳的人，千方百計的进行打击报复，对一些会吹会拍的人，如聶共惠、姜志刚就进行拉攏互相勾結，排除異己，他們对匿名写大字报的人竭力追究，蓄意打击报复。一九五二年聶共惠（原运輸处副处长，右派）去麻江土改时，侵吞斗爭果实，並把赃品带回貴阳，白明知不問，包庇了事。白經常当众夸奖聶、姜，工作上一貫重用；聶、姜也对白崇拜到五体投地。白晶五封官許願，還对開提拔的张

金盘許諾局长职务，並准备調他到学校去学習，使张十分崇拜他。

白品五之所以成为資产阶級右派分子，是有其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的。

白品五是剝削阶級（富农）家庭出身的人，有浓厚的封建剝削阶級意識和强烈的名利观点，他曾説：“我假如不参加革命，也許成为阿訇”（他父亲就是一个回教阿訇）。这就充分反映了他的領袖慾，他完全把这种剝削阶級思想带到革命陣营和党內来了。他入党近二十年，但是他的反动的資产阶級思想不仅长期未得到根本改造，而且有了滋长和發展，一直把党的事业当作謀取个人名利的工具。因此，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紧要关头，他終于叛变了党。

白品五，一貫計較地位，待遇，狂妄自大。他不仅恬不知恥要当九級幹部、大省局长、設計院长、省委常委；而且象資产阶級分子一样爱錢如命，把交工会費会、房租水电費甚至党費都看作是損害了他的个人利益。他争論建設貴州的功劳与苦劳，要省委多給他几个錢，認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他“更积極更愉快的貢献終身”！他甚至指使其他上北京开会的幹部，順带作买卖賺錢，可见其損人利己思想之严重。当他卑鄙的个人慾望得不到滿足时，就对党、对領导記取仇恨。远在一九四一年，因违犯俘虏政策而受到撤消县长职务和留党察看处分时，就对当时处理这一問題的周桓同志长期記仇。貴阳解放不久，省邮电局违反軍管会禁令运鋼板出省，被登报批評，他也認为是傅家选同志（当时的建設接管部长）故意給他难看，也記取仇恨，一九五六年大批提拔幹部时沒有輪到他，就更加和党对立了。一九五七年向省委写的“万言书”，便是他历年仇恨党仇恨領导的思想总暴露。同时，他长期以来把党和人民所賦予他的信任当作个人的驕傲資本，狂妄自大，目空一切，比这比那，总認为别人不如自己，而在地位、待遇上則認为自己是吃亏了。他宣称，不管那方面，“我

对某某常委或某某执委並不佩服”，实际上，他早已抛开了党的事业，成了混世主义者了。他上下班經常迟到早退，批閱文件时連內容也不看，不深入群众。学習上也很虛夸，按照他自己的說法是“凭兴趣而学習”，“学一点当資本”。他愈来愈喜欢别人对他的頌揚和吹拍，不願听逆耳之言，甚至对下級幹部採取順者昌，逆者亡的手段。总之，白晶五长期以資产阶級个人主义和党的組織原則相对抗，把个人駕于組織之上，其实質是披着馬列主义的外衣在党內制造混乱。企圖削弱和取消党的領导作用，以实現其个人野心。

党对白晶五的挽救是仁至义尽的，曾一再等待、啓發他自覚向党交代，而他却始終坚持反动立場，执迷不悟，抱着蒙混过关的态度。去年十一月省委四級幹部会議上，他先是怕把他划成右派，后見批評其他同志，則幸災乐禍的說：大厅局的“天之驕子，党之驕子”也犯錯誤。从去年十二月起，开始在党內对他进行批判，党仍希望他回头，而他却認为对他的批判是“小題大作”，故意和他“过不去”，在今年二月份省委五次扩大会上，党又一次給他悔过机会，而他却繼續玩弄两面手法，大会检查，小会推翻，死抱着腐朽的資产阶級个人主义不放，並繼續放毒說：“我对党有很多疙瘩，有过去的，有現在的，怎么过也不是，日子过不出来”。又說：“一封信戳的禍，要不一辈子也弄不着我”。声称要上北京去“問毛主席党內問題能不能提意見，党內有沒有民主”。他甚至重复“万言書”中仇恨党的烂調，繼續向党进攻，还鬼鬼祟祟地偸听小組会議情况。六月中旬指令他停职反省后，在群众中进行了公开的批判，后在省委主持召开的厅局长会議上和全省第十一次邮电会議上进行了严肃和徹底的批判，經过多次批判，才不得不低头認罪。

根据以上情况說明，白晶五是长期隐藏在党內的一个老右派分子，經我局党組及整風領导小組研究，給予撤消党組書記及局长职务。开除党籍，行政上降三級（由十一級降为十四級）的处

分。

（已經中央批准）

山东省人委整風領导小組关于以王卓如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的报告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三日）

編者按： 山东省人委从一九五八年四月下旬到八月下旬，在整風补課中揭發出一个以王卓如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三日山东省委对这个反党集团提出了处理意見。确定王卓如（省委常委、省人委常务副省长）、张耀曾（省委候补委員、財貿部副部长）、郭士毅（省人委計委副主任）为極右分子，开除党籍；袁子揚（省委委員、省人委副省长）、續中一（省人委財政厅厅长）、曹戎（省人委計委副主任）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中央同意山东省委对王卓如右派反党集团的处理意見。

山东省人委整風領导小組根据山东省委指示，自一九五八年四月下旬以来，連續召开了各厅、局党組書記参加的整風会議，各厅、局同时召开了党員幹部参加的整風会議，以大揭盖的方式对領导幹部实行整風重点补課。通过大鳴大放，大字报，大辯論的方法，从揭發批判王卓如包庇極右分子郭士毅問題开始，进而揭發了以王卓如（省委常委、省人委常务副省长）为首的右派反

党集团。这个反党集团除王卓如以外，还有袁子揚（省委委員、副省长）张耀曾（省委候补委員、財貿部副部长）郭士毅（省計委副主任）續中一（財政厅厅长）曹戎（省計委副主任、物資供应局局长）等五人为骨幹分子。他們分布在財、粮、貿、計委部門，培植了一批坏分子，排挤了一批不順从他們的幹部，並以此作为反党基地，搞独立王国。这个右派反党集团几年来一直进行着反对党、反对省委、反对社会主义的活动；他們有两本賬，一本是假的，用来頂抗省委的，一本是真的，是对省委保守秘密的；他們有两套編制，两个計划，省委的决議指示他們不执行，自己另外搞一套。他們利用財、粮、貿、計划方面的权力，反对社会主义建設，阻挠、破坏工农业生产。他們的罪恶活动，已經給党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事业造成不可估計的損失，带来严重的恶果。現将主要事实报告如下：

（一）反党、反省委領导，揷資产阶級白旗

这个右派反党集团的为首分子王卓如，他的反党活动由来已久。远在向明領导时期，王卓如是反党反中央鬧独立王国的一員勇将，王卓如自己也承認他是"向明錯誤的积極支持者和执行者"，"特别在財經方面曾供給了向明不少反党反中央的炮弹"，因而取得了向明的信任和重用。王卓如自己說：在向明时期"可称工作順利，心情舒暢"，自清算向明錯誤之后"是背了包袱参加省委"的。虽然新省委对王卓如在向明时期所犯錯誤抱着不咎既往，等待自觉的寬大态度，仍然予以信任重用，但王卓如对省委則在"思想上存在一定的距离"，"不是同心协力"，而是"离心离德"，由猜忌怀疑以至發展到公开頂抗。对新省委为貫徹执行中央方針路綫的一切措施，总是抱着消極怠工和反对的态度。

王卓如是省委常委，省人委常务副省长，除掌握省人委全盘日常工作外，还分工負責計划、財、粮、貿各部門的領导。几年

来他是利用这一分工領导的职权，依靠反党集团的亲信部下，和省委分庭抗礼，根本不听省委的話，公开反对省委領导，抗拒省委的决議和指示。省委通过的工农业生产計划，他們不研究执行，却是背着省委去另搞一套計划，另提一种指标数字。他們認为省委提出的数字是“号召数”、“政治数”，可以不执行的，而王副省长提出的才是“实际数”。他們只听王卓如的話，不听省委的話。袁子揚說：“党委領导是一句空話，而財貿工作是实打实的。”省委負責人传达的任务数字，只要王副省长“不知道”，王副省长不点头的可以不听。省委通过的整編方案，要求財貿系統以革命精神实行全面整編，精簡人員，充实生产。王卓如却說“革命只能向前，不能向后”，拒不执行省委意見，另搞一套編制。郭士毅还想和省委平行下达編制方案。省委要求財政方面增加工农业基建投資，該办而可办者，应积極办，不要造成財政节余。王卓如等反党分子听了以后大为不滿，諷刺省委这是想吃“超支飯”，“冒险飯”。为了反对省委的意見，他們竟敢制造假赤字，謊报財政开支已“三空一赤”。实际上財政却年年有节余，一九五六年节余一千七百多万元，他們却謊报說超支四百八十多万元。据統計第一个五年計划历年財政节余的总和等于第一个五年計划工业投資总数的二倍半。他們甚至私立金庫，焚毁賬册，向党要权术，搞阴謀。他們对党保守秘密，講斗爭策略，把党委当外部，当外人，拒之于千里之外。他們所領导的財政厅实質上已不是共产党的財政厅，而是国民党的財政厅了。在粮食問題上，省委一再指示要統筹兼顧，全面安排，适当多給农民留一点口粮、飼料，以鼓励农民生产积極性。但王卓如等却主张“多購少銷”，攻击省委是“片面群众观点”，他們並把农民的飼料地、种苜蓿种瓜菜的地都折粮定产計購，人为地增加了山东地区粮食紧张情况。由于飼料缺乏，生猪长期發展不起来，並一度下降。粮食厅还制造粮食假賬，騙哄省委，在粮食紧张时将粮食扣在手里不發，加重粮食紧张。一九五六年省委召开农业

积極分子大会，第一書記亲自主持，号召开展两千万亩的高額丰产田。王卓如却在紧接着召开的財、粮、貿、計划方面的幹部会議上，大談其平衡論、生产發展速度必須服从財政能力論，和省委唱对台戏，並公开誣称省委召开的会是“牛皮大会”，与会的各地幹部則称王卓如主持召开的会議是消極分子会。

王卓如負責政府全盘日常工作，几年来从未在政府系統幹部中認眞传达学習中央指示和省委决議，不进行党所号召的政治运动，不引导政府幹部围繞党委中心任务开展工作，發揮党的专政工具——政府工作的特殊功能。相反，他們認为中心工作是党委的事，与他們无关。他們引导政府幹部和党比关系，比权力，爭領导，煽动政府幹部对党委的不滿情緒，挑拨政府与党委的关系。对于政府如何执行党委指示，党委如何成为政府的領导核心等重要問題根本不提。相反，他們提出什么党委抓什么，人委抓什么，党委与人委如何分工等奇怪的問題，要求与党委分权。在这种指导思想影响下，使不少下級政府与党委的关系不够正常，部分政府工作人員对党委的領导存在糊塗观念，使政府工作迷失方向，缺乏政治掛帅。

王卓如利用其常务副省长的高位和財、粮、貿、計划的大权，在各种場合公开攻击省委的領导。刮“台風”时他們就利用“台風”，反冒进时就利用反冒进，幹部有地方主义情緒时就利用地方主义，工作上出現缺点时就抓住缺点，总之利用一切时机，积極反对省委。他們这个反党集団的骨幹分子，随之唱合，暗箭明槍兼施，散布流言蜚語，对省委的主要領导人舒同、譚啓龙等同志評头論足，实行人身攻击，說什么“南方人会耍手腕”。他們蔑視中央的領导，和中央各部門商討問題时，不是心靠心，据实反映情况解决問題，而是宣揚什么“一是要得多，二是吵得兇，三要会外活动”的做法，以显示其頂抗之能事。他們这种坏作風，坏意識，确实是带坏了不少幹部，伤害了不少同志，在政府部門中造成了一种極不正常的風气。

总之，他們心目中沒有党，沒有省委，所有的只有他們的反党集团，只有他們的王卓如。他們千方百計攻击省委的領导，把省委貶低得不值一錢；而把王卓如抬得高高的，吹捧王卓如一貫“正确”，“有威望”，“有天才”，“有修养”，“有鍛炼”，是“財經专家”。总而言之，在他們心目中，只有王卓如才能領导政府工作，要在省人委插上这面白旗，反掉省委的領导。这个右派反党集团的骨幹分子张耀曾就公开的說，“省委就在省人委”。可見其反党反省委明目张胆狂妄跋扈，已达極点。

（二）反对社会主义，阻挠破坏工农业生产建設

以王卓如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从他們地主資产阶級的立場出發，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当然毫无兴趣，而是处心积虑找寻一切机会加以反对、阻挠和破坏。他們反对社会主义，阻挠，破坏工农业生产建設，主要是抓住財政、計划、財易这三道关卡实行拖、压、叫、頂、杀价、不給錢、造假賬甚至直接破坏的办法。当一九五五年——五六年全省农业合作化如火如茶地發展势不可当的时候，王卓如等右派集团抓住貧农合作貸款这一关来阻挠合作化，他們制定了繁琐的借貸手續和貸款条件，想尽千方百計不把貸款發到貧农手里。当时合作社已全面地組織起来了，就是沒有資金，貧农領不到貸款，富裕中农譏笑他們。这对当时农业合作化是起了一定的挫伤作用的。当一九五六年秋合作社出現一些缺点，农村中出現反合作化台風时，这个反党集团就成为刮台風的窩子，王卓如、袁子揚、张耀曾、郭士毅等公开叫嚣“合作化速度快了，社办大了”，“生产关系跑到生产力的前面去了”，“合作化后农民穷了，連买油盐的錢都沒有了”，“农民吃不上粮食，穿不上衣服，混身露上露下”，並恶毒地污蔑“一切恶果都是合作化带来的灾难”。总之他們主张开倒車，分小社，維持单幹戶。同样，他們也反对对資本主义工商业的改

造，省委两次决定要王卓如負責对資改造工作，王卓如竟是“忘記了”，长期拖延对資改造工作的領导。相反，王卓如、袁子揚等对于資本家的生活、利潤却倍加关心，一再叫喊說是“資本家大量垮台、蝕本、吃光”，“我們和資本家的关系太紧张了”，“对資改造太快了”，“违背了逐步改造的規律”，王卓如在資本家面前說“現在的資本家貢献大于剝削”。他們在税收工作上、市場管理上都为資本家大开方便之門。几次撤消对自由市場的管理机构，放棄对自由市場的管理領导。他們歌頌自由竞爭，自由貿易，贊揚資本主义的經营管理，卑視、仇視国营商业。同时他們極力贊揚資产阶級的民主，公开主张要向美国的民主学習。

这个反党集团把持了財貿、計划大权，凡是省委及生产业务部門所提出的有关工农业生产建設項目，只要是不合他們心意的，到了他們那里就成为难过的关卡，王卓如不点头的，就休想列上計划；即使列入計划，財政厅也不給錢，所謂“承認項目不給錢”，“当面不頂背后挟住”，这是张耀曾自鳴为反省委的斗爭“策略”，斗爭“艺术”。而袁子揚則更为直接了当，公开頂抗，袁子揚說：“他們（指省委）都不懂，一頂就頂回去了。”他們反对省委参与計划財政安排，王卓如說：“書記們都出題目，我的計划怎么安排？我这个家怎么个当法？”“不当家不知柴米貴，沒有發言权”，“誰出題目誰拿錢”。张耀曾就曾公开揚言，財政問題要“一人当家一人作主”，反对省委領导。許多有关扶助工农业生产發展的重要措施，省委决定了的，他們拒不执行。省委决定要預購小牛，賒銷化肥、水車、蒙古馬，补貼手工业社制造简易提水工具所受亏損，山区农民口粮适当增加，粮食包購，超产归社等重要政策，在当时对推动鼓励工农业生产、保护生产积極性、緩和党群关系都是有重大作用的，但他們都以各种理由拒不执行。更严重的是他們竟擅自决定砸毀水車当廢铁，直接破坏工农业生产，打击工人生产积極性，政治影响極

坏。他們宁肯把水車砸毁了也不賒銷給农业社，以阻挠、破坏省委的水利建設規划。粮食厅代購地蛋种子时，則謊报运輸成本，抬高售价，使农业社买不起，最后把地蛋种子当菜蔬在市場出售，以此来破坏省委播种地蛋的計划。此后粮食厅假托蝕本为由（实际上賺了錢）根本不肯經营种子。

在商业方面，他們不是从鼓励和服务于工农业生产出發。工商之間长期存在矛盾，省委一再召开会議，进行調查，責成財貿部門負責解决，他們总是拖延不去积極解决。他們利用收購价格的决定权，故意压低地瓜干收購价格，省委几次指示适当提高，他們都不听。由于地瓜干价格过低，农民不願晒地瓜干，晒了的也收購不起来，以致造成地瓜大批霉烂，伤害了农民的利益。更其恶毒的是他們又把这种地瓜腐烂的責任完全归咎省委，作为攻击省委的一支毒箭，說省委"地瓜种多了"，"成了地瓜省，地瓜县"，"粮食厅成了地瓜厅了"，"烂得一塌糊塗"，"烂地瓜泛滥成災了"，一口咬定是省委多种地瓜的要求錯了，而要省委服从他們少种地瓜的錯誤主张。他們还压低了蚕茧收購价格，大麻收購价格，农民养了蚕、种了麻却大蝕其本，气得砍柞树，杀蚕种，使蚕絲生产至今恢复不起来。

这个反党集团在財貿理論上散布了一系列的資产阶級的腐朽观点，用以抵制党对財貿工作的正确指导思想。他們說什么"財政工作是一碗水"，"財貿工作的任务就是管好錢做好买卖"，"有貨卖錢，有錢买貨"，完全违背了党的發展生产保証供应的財貿工作方針。他們完全丢开了党的群众观点与生产观点，只有单純的任务观点、利潤观点，他們把党的群众观点生产观点与財政利潤国家任务完全对立起来，他們不是以財貿工作支持生产鼓励生产，为生产服务，从全党全民族的长远利益出發，开展工作，相反却是頑固地执行資产阶級的純利观点，破坏社会主义經济建設。

（三）以王卓如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的形成及其对检查的态度

以王卓如为首的这一右派反党集团的形成，已有长久的历史。以王卓如自己的話来說，除了他們都存在着共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观点以外，还有他們共同的阶級基础。王卓如称之为“自在的阶級感情”，“物以类聚”。他們碰在一起均是“很快关系就搞的很密切”。王卓如說他在“思想上就喜欢这样的人”，就自然地形成反党宗派集团。事实也确是这样：这个反党集团的为首分子王卓如，出身于地主家庭，历史上曾叛党自首，写过反共宣言，土改中犯富农路綫錯誤，向明領导山东工作时期积極参与向明反党反中央的活动。这証明，他是資产阶級在党內的代理人。

这个反党集团的主要骨幹张耀曾，也是出身于大地主恶霸家庭，他的哥哥是国民党特务，弟弟是国民党区分部書記，本人是国民党政府职員，是混入党內的阶級異己分子。在冀鲁边区时，和大叛徒邢仁甫一起进行罪恶活动。他还破坏过土改，包庇了大批反革命、坏分子。张耀曾自一九四二年起即在王卓如領导下工作，对王卓如極尽吹捧逢迎之能事。王卓如对张耀曾的政治历史情況是完全清楚的，但是，一直对张加以包庇，使张逃避了党对他的屡次的政治审查，一九四四年中央曾电示王卓如对张的政治历史問題进行审查，王欺骗中央說沒有問題。一九五五年省委要审查，王卓如为张写保票說“张耀曾忠实于党，政治上可以信賴”，以致使张能够长期隐瞞他的反动身份而扶搖直上。

郭士毅，也是出身于地主兼資本家家庭。他一貫揮霍浪费，三反前曾貪污受贿，和私商勾結，出买經济行情，使国家蒙受巨大損失，罪該判刑。也是个阶級異己分子。王卓如对这样的分子自然是支持包庇重用，三反中保护郭过关，三反受处分后連提四职、四級，一跃而为計委副主任，成为王卓如在計委实行反党掌

握大权的代理人，最后成为計委內部右派集团的头子。

袁子揚也是出身于沒落的悪霸地主家庭，是怎样入党的，至今尙未査清。他是个一貫驕傲自大目无組織狂妄到頂的人，王卓如称他为“敢說、敢作、魄力大”的反党猛将，王卓如賞識他，共同結为反党集团这也是必然的。

績中一，也是一貫工作消極、对党不滿的分子，曾放縱包庇反革命、坏分子多人。他是张耀曾选择而又为王卓如器重的幹部，是张耀曾調离財政厅以后，把持財政厅搞反党活动的接班人。

曹戎，是一个屡犯錯誤、品質悪劣的坏分子。土改中包庇地主，三反中因严重違法乱紀受撤职处分，一貫欺上压下打击报复。也是为王卓如所看中一手包庇下来並加以提拔重用的人物。

总之，他們都是一丘之貉，是一窝子阶級異己分子、坏分子和地主資产阶級在党內的代理人，因此相互之間，都是一見鍾情，有共同的異己阶級的思想感情，猩猩惜猩猩，心心相印，互相吹捧，互相包庇。他們以王卓如为反党集团的領袖，称王卓如是“英杰”，是“有經驗有威望的領导者”。王卓如也以他們为心腹，为謀士。他們从地主資产阶級反动立場出發，抱着个人野心家的慾望，共同結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集团，他們在反党反社会主义方面，互相献策，各显其能，共同謀划，上下呼应。

伟大的整風运动开展以后，群众觉悟提高了，他們的反动本質被揭露了，但他們却不肯洗心革面向党認罪，而是实行頑抗。当郭士毅的右派面目被揭开之后，王卓如亲自出馬为其辯护，声称“不希望郭士毅有問題”，並且顚倒黑白，誣称計委对郭士毅的斗爭是“个人打击”，王卓如数次抗拒省委決議，拖延对郭士毅問題的揭發檢查，歧压制群众，封鎖消息，企圖一手遮天，蒙混过关。当省人委在省委堅決領导之下，揭开郭士毅右派面目並进而展开对王卓如錯誤斗爭之后，这批反党集团分子更为悪毒地

誣称这是“譚啓龙对王卓如的报复”，互訂攻守同盟，企圖控制內部，頑抗到底。他們一再告誡为他們所掌握利用的人“說話小心”，要“一不搶先，二不落后，三不要叫大家看出包庇王卓如”，並对做具体工作的幹部进行威胁利誘，要他們为这个反党集团保守机密，……可見这个右派反党集团态度極端狡猾、恶劣，这个反党集团中的郭士毅、张耀曾等至今不肯交代任何东西。

（四）对以王卓如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骨幹分子的处理意見

王卓如是这个右派反党集团的为首分子，是組織者与指揮者，这个反党集团的一切反党活动，都是在他直接指揮和影响下进行的。他是一个在党內的資产阶級代理人。郭士毅是計委右派分子的头子、指揮者，是王卓如在計委掌握大权进行反党活动的忠实助手。张耀曾是王卓如篡夺財政大权，进行反党活动的心腹，历史上有严重罪恶。这三个人是党內的極右分子。

續中一，执行王卓如的反党意圖十分坚决，並且积極策划破坏对这个右派反党集团的检查和斗爭。袁子揚，他的反动言行十分突出，是这个右派反党集团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急先鋒，是王卓如进行反党活动的第一把助手。曹戌和王卓如一起积極地支持包庇極右分子郭士毅，也是王卓如进行反党活动的可靠亲信。这三个人是党內的右派分子。因此，有关部門的党組和支部已分別作出决議，开除王卓如、张耀曾、郭士毅、續中一、袁子揚、曹戌的党籍，撤消他們党內外一切职务。

中共山东省委决定
开除右派分子王月村的党籍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王月村，女，四十六岁，山东省临淄县人。一九三八年八月入党，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参加工作。家庭出身富裕中农，本人成份教員。历任县妇联主任，鲁南区妇联主席，代理县委書記，山东省妇联副主席、主席，省委委員。

王月村一貫反对党的領导，她对党的各級組織，上至中央、省委，下至党的基層組織，都进行恶毒的污蔑和攻击。她在一九五七年六月全国妇联召开的省、市妇联主任会議上，对党中央大肆污蔑和攻击，造謠說："若干年来党中央对妇女工作領导的太少。我在山东这一段，党委从来不研究討論妇女工作，妇女工作长期沒方向，幹良心事，沒有領导。"对省委的領导，她則利用各种机会，散布流言蜚語，造謠中伤。辱駡省委"已發展到障碍發揮部門作用的严重地步"。經常污蔑"省委不民主，不虛心"，她說："我这省委委員是擺佈"。在省妇联机关十七級以上的幹部中煽动对省委不滿。一九五七年一月她在大众日报上發表"上天言好事"署名"恨天"的反动文章，公开辱駡各級党委。漫駡省委是"玉皇大帝"，"偏听偏信"，"不主持正义"。把地委、县委說成是"灶王爷"，基層幹部是"坏分子"。她署名"恨天"，是恨社会主义，恨共产党的天不变。王月村就是怀着这样一顆極端仇恨党的心，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

王月村一貫的反对党对妇女工作的領导，反对以生产为中心

的方針。她說分管妇女工作的書記是外行，不懂妇女工作。她一貫主张“妇女工作不能跟党委的中心跑”。“党委管的我們不要管，党委不管的我們管一管”。向党鬧独立、鬧分散，想搞独立王国。她对中央和省委的重要指示和重要会議不传达，說：“无新問題，与咱工作无关”，省妇联召开重大会議的重要文件不送省委审查，很少向省委写总結报告和口头彙报工作。由于王月村个人独断专行，不接受党的領导，不听省委的話，致使省妇联工作长期政治方向不明确，使妇女工作受到了很大的損失。

王月村一貫地敌視与破坏党的各項政治运动和党的根本政策，她对于土地改革、“三反”“五反”、肃反、合作化、粮食統購統銷、改造落后乡、以及整風反右派等党的根本政策都是反对的，她極力抹煞这些运动的成績，站在敌对的立場上来攻击党的正确領导。在土地改革中，她認为斗爭地主过火了。对伟大的三反五反运动也不滿，說中央主观主义，那有这么多的老虎。她攻击党的肃反成績，支持同情反革命分子，認为对反革命分子斗爭过火了，违反了宪法。在粮食統購統銷中，她听信家庭的叫囂，替上中农叫喊粮食不够吃，否認在粮食問題上的两条道路的斗爭。在合作化运动中，她認为合作化快了、冒了，合作化“給妇女带来了更多更大的痛苦”。她否認改造落后乡的成績，說：“落后乡的改造是得不偿失，沒見成績在那里，錯划成份，被錯斗爭的人可不少。”她支持堂兄王公行（富农）去控告乡村幹部，使坏分子气焰嚣张。在反右派斗爭中，她与右派共鳴，支持和慫恿右派分子苏白、李克进向党进攻，百般地替右派分子辯护，竟把右派分子向党进攻說成是“帮助党整風”。她攻击党的审幹政策，仇恨党审查她的丈夫孙学之的叛变問題。王月村就这样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都站在敌对的立場上，反对党的領导。正象在斗爭中她自己所說的“凡是你們大家高兴的事，我都不高兴”。这是多么坚定明确的反动立場！

王月村的宗派主义、地方主义已發展到極为严重的地步。她

把山东历次的严肃的党内斗争，都看成是这一伙斗那一伙，个人的私斗，而不是中央路綫与錯誤路綫的斗爭。因此她完全否定历次党内斗爭的正确性与必要性。說这些斗爭是錯斗了好人，冤枉了好同志。她把山东党内斗爭說成是“領导斗爭的是打手，积極参加斗爭的是盲从，被斗的是倒霉”。她就这样恶毒地丑化与汚蔑山东党内的历次斗爭和山东的各級幹部。她在妇联內部所貫徹执行的幹部政策，也是完全违背党的組織原則的，採取封官許願，拉拉扯扯，以达唯我独尊、树立个人威信的目的。

王月村的資产阶級个人主义已經發展到極点。她驕傲自滿，狂妄自大，无止境地追求个人名利、地位、荣誉和享受。她对省委的許多負責幹部都是採取不服气的态度。在幹部評級中，她也是斤斤較量。她为了佔居副省长的职位，竟攻击省委对几个副省长的提拔。她对名誉、地位津津有味，而对重大的政治問題，日常工作却不感兴趣，无所用心。她到省妇联工作三年之久，仅到基層工作过十余天，还带去了炊事員和火爐子。在机关里也是飽食終日无所用心，很少作实际工作。机关許多幹部認为她是“名誉主席”。但在生活上却安逸自得，追求資产阶級生活方式。这一切，都証明了王月村已为資产阶級思想所腐蝕。

王月村对待錯誤的态度，也是極其恶劣的，極不老实，对一些重大問題，对抗、隐瞞、推脱、抵賴。在揭發的大量事实中，沒有一条是王月村自己交代的。直到在大量的事实面前无法抵賴的时候，她才不得不低头認罪。

从王月村一系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事实来看，她已經堕落成为党內的右派分子。山东省委决定、經中央批准，将王月村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

中共山东省委机关委員会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赵篤生党籍的决定

赵篤生，男，六十岁，家庭出身地主，一九三八年入伍，同年入党。历任：泰安专署专員、魯中专署专員，山东救济分会副主任，昌濰专署专員，山东省委統战部副部长兼省政协副主席，民委主任，政治学校校长。

主要反动言行

1、攻击省委，污蔑丑化領导。在青島党代大会上他抓住所謂"非正常死亡"和"打井"的問題进行煽風点火，說"山东是出英雄好汉的地方，为什么这样輕生好死呢？"又說"省委为什么不接受看井挂犁的教訓呢？譚政委把浙江的一套搬到山东来"。並向党伸手要部长和党代表，說省委对山东老幹部不温暖。又攻击省委对肃反問題处理不严肃，污蔑我政法部門都是鬼鬼祟祟的。他参加一九五七年省四級幹部会时，在小組会上煽动說："要找找省委消極退却和右傾保守的具体事实"。与王月村（原省妇联主任）一唱一合的攻击党的幹部政策，王說："赵篤生消極是省委沒有照顧老幹部"，赵說："省人委那么多的副省长沒有一个女的"。在省政协經常散布舒、譚政委不重視政协工作，"說"譚政委'九千岁'不去省民委参加会，我'八千岁'还不去嗎？"依靠赵健民地方主义旗帜，拉攏党內外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在省政协搞独立王国，部委决定的人物安排他拒不协商，在一九五六年省政协会議上同情党外人士反对合作化，他抗拒省委指示，不組織批判。

2、攻击党对統战工作的方針政策，否定工作成績。反对

"放"的方針，說："民主党派的組織發展和人士安排不管，是指导思想上的錯誤"，以"左"的面目攻击陈梅川同志。公开提出由于党採取和平改造政策，資产阶級才翘了尾巴。經常散布說："省委安苗海南为副省长和在反右派斗爭中保护苗的問題，是錯誤的"。污蔑說"安张金鐸为省政协常委是张金鐸遞个条子給譚政委換来的"。在民族方面，他强調少数民族特殊，支持民委单搞一套。

3、在鳴放中阴謀策划党内外右派分子有組織地向党进攻。一九五七年在省民委党内外鳴放会上煽風点火，說："目前主要問題是党的政策和大汉族主义的矛盾"，並說："統战部不重視民族工作，在传达中央指示时把民族工作不传达就翻过去了"。花經熬（省民委副主任）在赵的策划下，在省政协会上向党攻击說："合作化后回民唯恐病餓交加而毙，小孩逡人要飯吃，都把人餓死了"。会后，在赵的主持下，把这篇反动稿件刊登了"回民通訊"。花經熬在民族工作上单搞一套，曾受到济南市委的批評，花进行恶毒反攻，赵鼓动花說"你不講我也要講的"。共同策划攻击省委，在省委常委会上，花攻击省委后，赵支持花攻击省委說："他們是回民幹部，我可是汉族幹部……"，企圖証实在回民中發生的問題。一九五七年省四級幹部会上花經熬攻击省委發指示"不提民族工作，山东不能建立一个民族乡，山东少数民族中对党团員的發展不如抗战时期"，赵又鼓励花說："意見还是提出来好"，花連夜搜集材料，第二天繼續向党进攻。花的右派面目暴露后，赵又对抗省委指示，百般的进行包庇，拒不检查花的問題，上报花的材料时，赵又删去主要錯誤情节，打击积極分子，污蔑他們是"地主"有"政治問題"。並威胁說省民委的是非不明，整風时一个也跑不了。赵对右派分子洪占五（济南市民委副主任）也是积極包庇的，群众对洪开展辯論，赵就極力阻止，把会議日程改为传达报告。当确定洪的右派时，赵又以所謂只有地方民族主义情緒为理由，反对划右派。右派分子王景石（省工商联

党員秘書长）攻击省委統战部妨碍省工商联組織独立，赵則煽动說“不能老鼠掉在風箱里两头挨挤，这是原則問題”，並暗示王查査苗海南交股票是否陈梅川同志要苗搞的。王祝晨（党外省政协副主席）一貫反党，赵極力庇护。王在交心中趁机向党放毒进攻，但赵向市委及省委彙报說王很积極，揭發王的大字报赵压住不貼，从香港美国特务机关捎給王的信和反动宣传品，赵匿而不报；去年王参加全国人大会議时，赵写信叫李澄之轉告王說話要留神。在部里确定徐浩（副处长）、孙肇基（办公室副主任）等五人为右派时，赵則散布說“他們年輕无知，算得什么右派”。並煽动徐浩进攻說“你有話要在会議上講”。

4、包庇反革命分子。赵宏海（赵的亲侄）系国民党的校官，国民党員，在英国受过砲兵訓練，上海解放后逃回原籍。赵篤生伪造說他在上海与我地下党有关系和起义人員打入我軍队，鎮反被逮捕刑滿释放后，赵又利用关系安置作中学教員，划右派后赵又指点他翻案，直到最近才法办。並以韓多峰是坏蛋为借口，鎮压韓检举他包庇历史反革命分子吳培申（赵的亲属）的問題，在反韓右派时，硬要韓签字划押說赵篤生、李澄之包庇吳培申是誣告。近来又查出反革命分子赵子鵬（赵的孙子）解放后逃往香港，經常与赵通信，但赵沒有把赵子鵬的真象向我公安机关报告。

5、支持地主倒算，維持封建势力。赵的胞兄赵子普是泰安城东关的一霸，被判处管制二个月，赵支持其上訴，反对划为地主。赵不只一次地要当地政府救济其地主和反革命亲屬李嘉干，並要党外人士吳长森吸收李参加县政协学習，以便早日給李摘掉地主帽子。更严重的是与洪占五勾結一起在珍珠泉召开泰安专員、县长、民委主任等会議为地主滿子謙倒算房子，赵在会上动員說：“公家不在乎那几間房子”並批評韓华亭同志对滿的小老婆态度不好，說“你这样熊人不能作民族工作”等。

6、隐瞞历史，赵在解放前在省立九中、十中、育英中学教

学时，曾任过訓育員和訓育主任（应是国民党員）一直未交代，並伪造自己是紅色教員。

以上事实充分証明：赵篤生一貫对抗党的領导，拒不执行省委的指示，否定党的統一战綫工作成績，包庇反革命分子。当资产阶級右派向党猖狂进攻时，赵就配合右派分子向党进攻，以达到反党的目的，完全堕落成为党内的右派分子。在斗爭中态度極其恶劣，一直狡猾、抵賴，不肯低头認罪。为了严肃党的紀律，純潔党的組織，經省委批准，开除右派分子赵篤生的党籍，撤銷原有职务，工资降五級。

山东省交通厅整風領导小組关于右派分子王翰西的結案处理意見的报告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王翰西，男，五十四岁，山东省临淄县人，中农出身，行伍成份，讀書十二年，一九三八年参加我軍，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营长、团长、渤海軍区副参謀长、德州軍分区司令員。現任交通厅副厅长、厅党組代理書記、厅整風領导小組組长，十級。

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三三年在反革命軍队中任职十二年。幹过班长、特务长、少尉排长等职。后住閒二年，經商二年。参加我軍后伪造过历史。一九四〇年曾受托匪影响並一度要求退党；一九四二年整風时，因被审查历史而仇恨党，对历次政治运动和政治工作机关有抵触情緒；一九五二年三反运动因非法婚姻关系和严重官僚主义，受到党内当众警告和行政降級处分（行政处分于一九五四年取消）；一九五五年評軍衔时，因要求准軍級未达目的，

严重不满，曾拒絕出席受衔、受勛大会；一九五六年轉业也認为是山东軍区有宗派，因而再度怀恨党。轉业至交通厅后，工作消極，对省委、省人委指示不坚决貫徹执行，有时在传达后还加上“不一定正确”的批語。他所积極的是籠絡亲信，施展个人野心，从事反党活动。

一、主要反动言行

1、平时縱容支持张信懋、宋汝一、程松林等右派分子进行反党活动，鳴放时又煽風点火。提出“不要实事求是”“不要和風細雨”，“諷刺挖苦都行”，“駡也不要紧”，鼓励他們大举向党进攻。在王的支持煽动下，右派們即肆无忌憚对党进行了恶毒的攻击。王翰西見其煽風已生成效，而得意忘形，对右派言論大加贊揚說：“可以說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意見是正确的”。他还跑到航运局慫恿右派分子馬子芳张貼反动言論大字报，表揚馬是“老幹部，敢于坚持斗爭”。为使这把火愈燒愈旺，曾極力打击敢于坚持党的原則的人。史茂源同志对反动言行提出批駁时，話未講完王翰西厉言制止，說：“我对你的發言有意見，不要解释”。繼而向下屬部署“只准鳴放揭發，不准解释、反批評”。

2、反右斗爭前夕，王翰西見風向不对，即鳴鑼收兵。特意将中央关于反右斗爭的絕密指示向科长以上党員幹部交底。說再鳴放是为“引右派”；示意张信懋“不要再鳴放”；授命程松林“注意約束你爱人（徐志誠——右派）的言行”。使一些将要暴露的党內資产阶級右派縮回头去。

反右过程又極力包庇已經暴露的右派，打击敢于揭發批判右派的积極分子。刘勛远同志写大字报批駁右派分子馬子芳的反动大字报。王反复追查，駡刘“不是右派也是坏分子”，勒令揭下大字报；不少群众用大字报揭發交通厅民革招兵买馬，揭發右派分子孙鳳英的反动言行，王忿恨的斥責支部書記馬云超“不掌握原則、政策”，“这样做，打击面太广”，“孙鳳英在工程师中

比較好，在社会上有地位，群众有意見你可以解释、动員”，“把(揭發)孙鳳英的大字报揭下来”。省委交通部通知厅党組整風处长幹部鳴放言行，王拒不执行，斥責执行人“偏激”，罵省委交通部督促执行的林輝同志“烏龟王八蛋”。並在省四級幹部会上欺騙省委說：“厅里有个党組，在鳴放中提了很多意見，是很好的”。老早就在厅幹部大会上宣布反右斗爭已获全胜，借赶整編草草收兵。

在整風第三阶段整改中，王曾極力主张按照右派分子的主张改变党的幹部、工資政策。說什么“沒有宗派主义也有宗派情緒”“蘆英华（前党組副書記）回来检討检討吧”迫使党向右派們認罪。

总之，他对右派的包庇是有始有終，直到在动員辯論张信懋、宋汝一等人的反动言論时，还在大会上說：“这是大是大非問題，但肯定說不是右派，是內部問題”再度模糊群众的視綫。

另外他还図謀在反右中冤枉好人，宋奎同志（人事处副处长——曾是右派分子众矢之的）根本沒有反动言行，他却借生活作風問題一再堅持划宋奎为右派。

3、在省四級幹部会上，王翰西又亲自出馬向党大举进攻。攻击社会主义，攻击省委和省委負責同志，否定全省工作成績。他說“省委領导很吃力，工作水平不高，作風是八年前的，跟不上形势的發展”“省委負責同志开会演講說的很好听，但实际不然，喜欢大呼隆，喜欢搞突击，喜欢搞行政命令”，“省委有些地方很別扭，不採納意見，总認为自己那一套行，工作搞一个丢一个，好象野猪扭棒子”，“过去省委对交通厅的工作从未过問，省委負責同志吃了飯幹什么？”“省委个别負責同志臭架子十足，很不虚心，很不負責，背一貫正确的包袱，使人見了感到很不是味道”，“譚啓龙同志沒有自我批評的精神”，“舒同同志也有毛病，而且还很突出！”“省委領导同志思想方法很頑固，我又喜又恨”，“省委、省人委对过渡时期的工作抓的不

突出，有的負責同志对此領导不热情”，“省委不如交通工作部，省人委不如交通厅，下边比省还好，一級不如一級”，“省級机关互相爭吵，你不服我，我不服你；党內是非不清，赏罰不明，沒有原則”，“建議省委今后不要再搞大呼隆了，真正把群众路綫、民主作風貫徹到实际工作中去，否則就是手段……”。

王翰西攻击社会主义，远在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高潮来临的时候，即在思想上有所抵触，正象他自己检討說：“我在医院躺着，听到敲鑼打鼓，即感到合作化搞快了，将来当不了反冒进”。他在平时也有攻击省委的活动，說省委交通工作部是“麻煩部”，辱罵省委領导。他对舒同和譚啓龙同志的点名攻击是有野心、有阴謀的、是对右派分子王卓如等的声援，正象他自己检討說：“赶走舒、譚省委工作必由赵、李主持，省人委必由王卓如主持。这样我可以当……”。

4、王翰西在四級幹部会上打輸以后，力圖挽回敗局。他个人否定党的决議，企圖留下已决定下放的右派和反党分子，占領厅內党政領导要害。他亲自向省委交通部負責同志求情，說什么“程松林思想有包袱、有怀疑”，“算了吧”，“留下吧”。他支持右派和反党分子散布流言蜚語，說什么“下去就回不来了，住不上几年就死了”，“我下去先到各地、沿海逛一个月再上班”，“留下的（处长）沒有一个象办企业的，馬沂泉是个啷啷鬼子，杜旭东是个咀子，周云辯連飯也不会吃”。他支持程松林給仲侃伯副厅长加上打击报复的罪名，企圖混淆是非，模糊問題性質。

二、斗爭中的态度

王翰西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質大暴露之后，伪装鎮靜，数月不作检討交待，並借口养病，逃避斗爭。从医院調回整風补課后，經过几次小会大会的斗爭，态度还算老实，基本上交待了反党的阴謀和野心，並表示低头認罪，决心悔改。

三、結論和处理意見

王翰西自来交通厅后即高举白旗，縱容支持右派和反党分子进行反党活动。鳴放时煽風点火制造混乱，反右时極力包庇右派，在省四級幹部会議上亲自出馬，攻击社会主义，攻击党的領导，攻击省委負責同志，应确定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撤銷原有职务，由十級降为十五級，另行分配工作。

（已經山东省委批准）

中共山东省教育厅党組
关于右派分子刘健飞的定案报告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一、簡历

刘健飞，男，五十二岁，安徽省巢县人，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伪职員。一九二六年十月入軍閥张宗昌部，幹过学兵团的学員、軍参謀处的录事和譯电員，一九二八年六月参加国民党，任县党部文書助理幹事，一九二九年六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十二月党組織被破坏后，投入蔣伪四四师，一九三〇年六月至三一年五月任小学教师，一九三一年夏脫离党的組織（是自由脫离还是自首叛党尚未結論）。一九三五年一月鑽入蔣伪中央宣传部国际处任編譯幹事，此时刘对反动事业極为卖力，除編譯外文外，积極搜集我进步刊物，很被特务头子方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重用，並經方治的介紹，以“特”字号党証重新参加国民党，

一九三七年十月，刘离开伪中央宣传部，隐瞒了反动历史，混入我革命队伍（一九四四年整風时曾坦白系有計划打入，后又推翻）。一九三九年四月又混入我党，后經組織上查出停止其党籍，一九四二年又重新入党。

刘的历史很复杂，由于其一貫不老实交代，虽經审查至今尚未全完弄清，他入伍后任过新四軍五支队敌工科长、行署教育处副处长、山东大学講师、济南市教育局长等职，現任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行政十級。

二、平日表現

刘长期对党两条心，平时拒絕党的教育和批評，对其反动历史不忠誠交代，一直隐瞒抵賴；他極端虚伪，資产阶級个人主义名利权威思想非常突出，时常打击别人吹捧自己；在工作中坚持資产阶級的教育路綫，經常宣揚脫离政治的业务观点，如他視察临沂、济宁扫盲工作后，写的报告长达万言，政治教育一字未提，他常說政治思想工作“是党委的事，我們不必提，提也是形式主义”，企圖取消教育工作中的政治思想領导；对党委領导是阳奉阴违，反对党委抽調教育幹部作中心工作，並曾極端恶劣的假借省委扫盲检查团的名义压制地委县委領导，把扫盲工作摆在中心工作之上；在幹部政策上强調才，取消德，在教师問題上强調团結，忽視改造，他违背党的阶級路綫，信任重用反革命分子、历史不清的分子、右派分子（如张墨仙、张达于、宋世平等），排斥打击对党忠誠的幹部。

为了实現其資产阶級个人主义野心，对幹部进行宗派拉攏，一貫打击污蔑組党組書記王哲同志，並进而污蔑孤立主持正义的党組副書記袁駝同志，从多方面分裂破坏党的团結，他企圖取消党組領导，对党的重要方針政策不在党組研究，如毛主席提的新教育方針、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勤俭办学、体制下放等；特别严重的是竟狂妄的把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方針目的：

“学習理論，联系实际，提高認識，改造思想”篡改为“提高覚悟，明辯是非，站稳立場，改造思想”，以示与中央对抗，打起反中央的白旗。

三、整風和反右派斗爭中主要反动言行

（一）煽动包庇右派分子：

一、煽动、支持、包庇反革命分子兼右派分子张墨仙向党猖狂进攻。六月初，刘健飞到中教处听取鳴放，当听到张墨仙大肆攻击党組有宗派主义，党組水平極低和污蔑党組負責同志时，刘当即起立插話問：“有这个事嗎？”並将张的言論記在本子上，会后又約张个別談話，张問刘：党組对我的历史問題审查你知道嗎？刘說：“你有历史問題我知道，但具体情节不很清楚，对怎样审查我未参加研究，……我是党組副書記。”（其实对张的审查是党組决定的。党組委托三个委員对张审查，审查結果都向刘作回报），张听后認为审查他不是党組决定的，只是几个党組委員个人的事，当即大駡：“媽个×，我要和他們拼了。”事后气势凶凶地去質問审查他的蔣奇同志。六月底在处长以上幹部鳴放会上，刘三次鼓励张鳴放，說：“墨仙，不要顧虑！”张在他授意下又对党組主要負責同志作了恶意的攻击。他对张大駡党組委員的事实，並未向党組回报，当被追談出后，整風办公室三次着刘写张与他談話的材料，他以記不清，推托不写。党組第一次研究张的問題时，刘說：“张的問題是历史問題，是攻击个別人，不是反党。”党組第二次研究张的問題时，其他党組委員一致主张划张为右派，刘却态度曖昧，沒有明确表示意見。党組决定划张为右派后，刘还对馬副厅长說：“张墨仙的問題还得再考虑考虑。”直到省委領导小組批准对张进行斗爭后，刘又向馬副厅长說：“对张的問題不能和其他右派一样看待。”

二、六月十二日刘召集厅内四个旧軍官开座談会，会上严复明污蔑肃反运动說：建議中央發明个“照脑机”。刘已了解上級

要通过鳴放暴露右派分子的意圖，却当場要严把此意見收回去。右派分子宋世平，污蔑山东教育工作是"老和尚念經，不解决問題，历次政治运动給幹部背包袱，不是給幹部放包袱……"等等。当党組研究宋的問題时，有的同志提出这是否定党的工作成績，应定为右派，刘說："这不能算否定成績。"不同意定为右派。

三、当曲阜师院的右派分子，煽动学生搞大民主，要挾政府迁校时，刘健飞了解省委不准迁校的意圖，他却和右派分子张达干（原高教处副处长）商議由张起草写报告給教育部，反对省委意圖，报告中污蔑領导进行教育是"保守"、"压服"，"忸忸怩怩不敢放手發动鳴放"，攻击中央和省委把学校建在曲阜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如不能迁校，不仅領导上应"坦率"的承認錯誤，还要滿足右派提出的七項荒謬要求，如将曲阜建成文化名城等，这一报告，刘既不交党組討論，又不請示省委，擅自签字發出。

（二）污蔑党組有宗派主义，分裂党的团結，丑化領导同志

一、一九五七年五月，党組研究制定整風計划时，刘竭力主张将宗派主义列为重点，六月四日在全厅幹部整風动員会上，刘說："在教育厅宗派主义不能低估。六月二十一日党組討論繼續鳴放問題，刘說："关鍵在党組，只有将盖子揭开，才能解决問題。"同时在这次会議上，党組研究张墨仙攻击党組有宗派主义的反动言論时，刘認为党組有宗派主义，当場要崔碩星同志表示态度說："老崔，你發表个人意見。"企圖分裂党組团結。六月二十四日党組开会討論如何开好处长以上幹部鳴放会議时，刘說："党組委員要以个人意見發表意見，我認为厅里宗派主义問題要交換意見。"六月二十七日，在处长以上幹部鳴放会上，刘說："王哲同志对我的态度是疏远的，对有些同志的关系还是亲密的"，"有些事事前我不知道，党組开会常是袁（党組副書記）通知我，我以党組委員身份出席会議，是省委認为我作副書記不

适宜，还沒有免掉，我不敢这样想"。右派分子张达于污蔑党組有沟有墙，有宗派主义，刘立即煽动說："张处长鳴放了，很好，大家有意見都可以鳴放。"休息时，张問刘："我这样提法是否合适？"刘說："可以提，我在学習八大文件时曾提出宗派主义值得检查，当时認識不一致。"

二、刘写的与省委文教部王部长的談話要点中，污蔑王哲同志說："从肃清向明影响后，一直怀恨在心，提議当（肃反）重点成立专案小組。"他說"肃反中不如党外幹部"。刘在鳴放会上丑化王哲同志"对省委尊重有些地方不当，庸俗化，如有一次省教育会議，省委秘書长任質彬同志作报告，領导与会人員再三鼓掌致謝，去年优秀教师会議也是如此（指对舒同同志、譚啓龙同志）。"誣蔑王哲同志"沒有找我談过話，就認为我历史問題严重，是否由于条件反射造成的主观印象"，他並在处长会上煽动大家提議要王哲同志回厅整風，企圖进一步攻击王哲同志。

（三）拒不执行中央、省委指示，阻挠破坏反右派斗爭

一、中央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六日电示各地，爭取时机大鳴大放，揭露三害，同时暴露右派（省委机要处五月十七日将电报發給教育厅党組，刘閱后又收回），省人委整風領导小組又于六月七日召开各厅、局領导小組长会議，要求各单位进一步發动鳴放，徹底暴露右派，刘早已了解中央意圖，但不認眞貫徹执行，在厅內只进行了一般鳴放，沒有貫徹"引"和"挑"的指示，影响了右派的充分暴露。

二、二月十一日省人委整風領导小組，布置由党組書記和党員厅长，研究对全厅人員进行政治排队，刘回厅后压下了，根本沒有进行。

三、七月底同支書江先贵同志向刘提出方夫満（右派分子）的言論和其他右派差不多，希望領导上考虑一下，刘說："咱动員叫人家鳴放，叫人家帮助党整風……就不能……認为不对就反人家，是吧"。

四、对于仇复划为右派問題，楊副省长早有指示要对仇复开展斗爭，刘却借口需查对材料，把問題擱置很久，經同志們一再提意見，才将仇复定为右派。馬培卿同志对此在支部大会上曾检討"这是慎重有余，积極不足"的右傾思想，刘指責馬培卿同志不应这样講。

（四）攻击污蔑肃反运动，反对党的审幹政策

一、在处长鳴放会上，刘健飞攻击肃反运动說："运动中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很厉害，老三反中主观主义严重……肃反中未接受这一教訓"，"确定宁（汉戈）为肃反对象（經省委确定）是錯誤的，即使当时有材料，有根据，而不加以分析，我認为也不对。"

二、一次党組研究肃反对象王同的結論时，他强調不了解情况（其实王同的問題他是了解的），带头不作决定，会后並向馬培卿同志說："誰搞的，誰負責，咱不管"。

三、他对郑銘石（进修学院院长）說："我的意見，政治上无問題，历史問題未作結論也可以提拔"。企圖挑动郑对审幹不滿。

（五）攻击人事制度和支部工作，打击陷害人事处长

他在处长鳴放会上带头攻击和歪曲事实說："人事工作支部工作我很难过問"，"厅里幹部任免制度有問題，科长級以上幹部党組、厅务会議研究，科长級以下幹部人事处来任免"（事实是党組确定，凡科員以下幹部由人事处討論提出意見后报分管厅长决定）。他向省委文教部王部长誣告人事处有宗派主义，打击排斥两个人事处长，起初他叫馬副厅长去文教部要求調走两个人事处长，因馬副厅长不同意其意見，他便亲自出馬找王部长，夸大两个处长缺点。並捏造事实誣告陷害胡方同志被提拔为正处长是"自报自"。

四、斗爭批判时态度表現

开始时公开对抗，污蔑大家对他的揭發批判是落井下石，对反党罪行拒不交代；繼則伪装老实避重就輕，企圖蒙混过关；当揭穿其阴謀后态度蛮横进行詭辯，在大家的批判及大量事实面前虽承認已墮落到資产阶級右派立場（最后書面交代又去掉），破坏了党的团結，实际上对右派分子起了包庇保护的作用。但仍以否定重要情节把反党罪行歪曲为認識問題等手法繼續进行狡賴。至今不承認是右派，自始至終坚持反党立場，不肯低头認罪。

五、結論

刘健飞历史上曾叛变革命，是党的叛徒，抗日初期隐瞞反动历史混入革命队伍，他因有丑恶的历史和卑鄙的政治野心，長期对党两条心，阴謀篡夺党的領导权；平时歪曲对抗党的方針政策，一貫分裂党的团結；鳴放中煽風点火，支持带領右派分子里应外合的攻击党組丑化領导，攻击肃反运动和人事制度；在反右斗爭中千方百計的包庇右派分子，阻挠破坏反右派斗爭；揭發批判后百般狡賴坚持反党立場，实屬情节严重态度特别恶劣的右派骨幹分子，根据中央划分極右分子的标准第（1）条規定，应定为極右分子。

六、处理意見

刘系極右分子，态度又特别恶劣，确定按中央标准第（三）条处理，开除其党籍，撤銷原有职务，留用察看。

（已經山东省委批准）

山东省文化局、文联整風領导小組关于右派分子馮毅之的处理报告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馮毅之，原名馮登瀛，曾用名馮毅、馮仙舟，山东省益都县长秋庄人。家庭出身富农，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三零年曾入党，一九三二年脫党，一九三七年又重新入党。曾任县委宣传委員、县长、八路軍四支队营长，青州市长兼警备司令，四县办事处主任，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文艺科长、处长。現任山东省文化局副局长，党組書記，兼省文联副主席、党組委員。

（一）平日表現

严重的个人主义，对个人閉門創作很积極，一貫脫离政治，对抗領导，对党的各項工作均採取了草从事或一拖再拖，不了了之的度态。如批閱文件，不加审閱就提笔签發，他常說："原則我負責，文字你們負責。"实际是从原則到具体，他都不負責。

（二）隐瞞历史，包庇地主及反革命分子

据馮毅之交代，一九二八年春他在青州十中加入国民党为預备党員（？）一九二九年春就脫离了国民党，除了在叛徒杜华梓逮捕共产党員时曾随同搜查过吳祝存的家以外，别无其他活动。經調查証实，馮毅之曾介紹陈叔俊、张貞甫、楊蓮芳三人参加了国民党，当时在益都国民党县党部出出进进，極其活跃，並作过监視共产党活动的工作，后曾随赵貫一在博山县党部任宣传幹事，青島胶济鉄路党部任幹事。一九三零年在济南高中上学时，还

經常参加該校国民党区分部的会議，当时很活跃，还担任学生会副主席职务。

一九四六年馮在青州任市长时，曾包庇青州城里地主"韓姑娘"，不讓群众对其进行減租減息，替地主叫苦。济南解放后，曾介紹托匪扈文章，及叛徒、反动党团骨幹刘玉軒参加我政府工作，更与反革命分子白傑臣、张貞甫往来密切。

（三）对整風反右的态度

当开始整風时，不下楼参加領导，强調个人閉門創作，群众意見很大，直至大众日报上批評后才勉强下来参加，仍是消極应付說："用着我幹什么就幹什么，用着我作报告就作报告。"站在整風領导之圈外。当我党向右派分子反击开始时，馮即公开投靠右派分子的行列，和其他右派分子一起向党进攻，煽动群众对省委不滿，具体事实如下：

省委夏書記主持研究批判右派分子任迁乔，王希堅（右派分子、省文联代理副主席）跳起来說："省委如果不願检討（指"吻肩章"的检討）可以收回来嗎！"馮馬上也跳起来說："省委有缺点是不是还讓人家批判？"企圖威胁省委放过任迁乔。大鳴大放开始后，省政协召开鳴放会議，任迁乔原来未准备参加，馮即鼓动任迁乔到大会上去談漫画問題，借以攻击省委領导。对任迁乔斗爭之后，馮即又到任迁乔屋里去安慰說："你沉住气嗎！将来总会水落石出的，只要相信党是光明的，問題是会弄清楚的，人家还有坐二十年冤狱的嗎。"

中央召开宣传会議时，馮毅之和右派分子王希堅都曾去参加会議，到北京后第一天馮就鼓动王說："要談談漫画問題。"在小組会上馮先談了漫画問題，开大会时，在王希堅攻击省委負責同志的發言后，馮即起立补充說："王希堅講的省委某負責同志，我可以具体談談，这个負責同志就是我們的省委第一書記舒同同志。"馮又說："我認为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主要障碍是在領

导方面，也就是省委不敢放的問題。”王希坚在省二次文代大会上号召青年們向馮毅之学習，回去后向党作斗爭，（实际是进攻党）任迁乔常說：“山东我最佩服的是王希坚和馮老头（馮毅之）。”一九五七年省文联斗爭右派分子王希坚时，馮毅之（当时是文联党組委員、副主席）在約有三千多字的發言中叫了王希坚二十二个同志，全篇講話的精神是說明王希坚不是右派，是思想上的錯誤，並說：“王希坚同志过去有成績，並不是一切都是錯誤的，我希望王希坚同志不要覚得寃枉，我們承認有錯誤，也需要检查，我們以后还要整風嘛，在我們整風的时候，王希坚还有發言权，可以多給我們提意見。”一九五七年全国群众音乐舞蹈会演时，馮毅之对山东代表团的一次講話，实际是煽風点火，向省委进攻，他說：东北某地区犯了錯誤，山东也出了一件大事——漫画“吻肩章”問題，有人（指省委）說是毒草，我看值得研究。又說：我們执行党的政策，也应該有独立思考才行，山东的地瓜烂了，就是因为机械执行沒有独立思考造成的。他在日記上說：“欢迎和鼓励唱反調，在当前非常重要，因为敢于唱反调的人太少了。”

省人委对王卓如反党集团的斗爭开始后，在文化局貫徹的无力，每次座談討論，只是由馮唸唸文件了事，不敢正面涉及到文化局的問題，更不敢引火烧身談自己的問題，因而文化局的整風长期进展不大。

（四）对党的各項政治运动均採取对抗态度

馮毅之不仅对反右斗爭是对抗，而且对各种政治运动都是採取对抗的态度。因为他历史上有問題，不叫他領导肃反，他便大为不滿，說：“叫我做党組書記，又不叫我做肃反工作，叫我怎么办？”对被审查的王非（历史問題，未作結論）同志說：“你不会是反革命，这一点我們早就預料到的，他們（指省委宣传部）虽有主观片面，但自己应該抱清算过去积極将来的态度，历次运

动都有这样情况，老三反还有人带手銬脚鐐进大獄，如王力現在也已撤消刑事处分……。”对反胡風認为是“不分敌友我，一网打尽滿河魚。”对机关整編、幹部政策和作家下乡、降低稿費等都不滿，在群众中公开發牢騷，誣蔑我們党内沒有民主，說：“党内最主要的是不民主的問題。”把各种运动說成是：“每一次运动，似乎免不了这样一个规律（开始刮北風，結尾就刮南風）北風刮得越兇，后来的南風也就越大，把人吹到不应去的地方，还能不再吹回来嗎？”他說：“过去資本主义国家說我們有鉄幕，苏联还真有过鉄幕。”

（五）对抗組織，对抗領导

对上級領导，态度極不正常，甚至对抗和誣蔑領导說：“省委不重視文艺，沒有作品就不能領导文艺工作。”說：“夏書記的文艺观点落后了”。“王部长（指省委宣传部）就是不懂文艺嘛。”“从丁局长調走后，文化局长期处于无領导状态（？）省委一直拖延不管，現在才宣布局的領导（指馮自己），这些問題怎么会沒有呢？”当右派分子向党进攻，質問为什么不成立歌舞团时，馮就說：“我有什么办法，省委書記光会說話，說話誰还不会說。”“向省委狠狠的提，这是省委的問題。”叫把大字报貼到省人委去。当主席来山东时，他誣蔑說：“舒同头脑也發热了，看起来眞不能个人崇拜。”他对党的負責同志經常抬槓散布流言蜚語，發牢騷。

（六）腐朽的資产阶級文艺思想，反动的修正主义的文艺观点

馮毅之披着馬列主义外衣，打着革命的招牌，利用他的职权地位，在山东文艺界大量散布他的資产阶級文艺思想和修正主义观点。馮毅之看不起也不願做行政工作，他說：眞正有本事的人（指創作）沒有幹行政工作的，我当局长並不願意，可是不幹又不

行，沒办法……”在他的日記里写着：“无休止的会时刻在号召你等着你，不会叫你閒着的。每一职务有三分之一的时間要开会，我現在有三个工作，就需要有三分之三的时間开会，連看書的时間都沒有，那能写作呢？自己想做的事情不能做，天天不能以最强的理智来驅使自己完成各种任务，苦杀人也。”其实是严重的資产阶級个人主义名利思想，一本書主义时刻在驅使着他，他到处逢人就講，家中已盖好三間屋，要求退职回家，专門搞創作。他强調写悲剧、写阴暗面、写諷刺剧，他說：“我們的剧本諷刺的还不够，还不悲，尤其对老幹部有了缺点就狠狠的揭。”“中国需要果戈里，要写諷刺作品。”“社会主义也有悲剧和阴暗面”，“可以写黑暗面”，“写官僚主义不必写轉变，一直發展下去，把他写死，用群众的压力把他压下去，可以写悲剧，历史剧，要用血的教訓来教育人民。”他并且宣揚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也要有資产阶級的文学，他說：“作品可多种多样，因为讀者对象不同，为解决作家与讀者之間的矛盾，不一定都写主流——現实主义作品。”他强調文艺性而不要政治，把前艺校的政治課取消，换上洋琴課，他說：“……別看有些人整天嘴里喊政治政治，到时候还是不务正业，演不出好戏来。一个演員，只要演好了戏，就是好演員好幹部，如果是党員就是好党員……。”有的教員不願参加整風，馮說：“你們不了解，这些文艺人就不願参加政治活动，如赵树理是全国有名作家，几年从不参加政治学習，生活散漫，中央也管不了他。”

（七）斗爭中的表現

对馮毅之的斗爭，自六月初至八月上旬，前后經过十余次大会揭發批判和小会查对材料，馮也作过三次大会检查和在小会上承認某些問題。但总的看来，馮在斗爭中的表現是不老实的，缺乏低头認罪，眞誠悔改之心。他所检查的都是群众已揭發的問題，自己沒有主动交代新問題。而对已被揭發的問題的检查也是

避重就輕很不深刻的，採取包下来的态度。

(八) 結論及处理意見

根据上述事实，馮毅之在右派分子向党大举进攻时，就积極支持和策动王希堅、任迁乔等右派分子以漫画問題为借口恶意地攻击省委和党的負責同志，並到处点火放風，煽惑群众对党不滿，扩大攻势。在領导反右斗爭时消極应付，並暗中安慰右派分子，給他們打气加油。其次对党的各項政治运动和政策，採取对抗态度；对党的負責同志背后流言蜚語进行誣蔑，实际是对党組織的攻击和破坏，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員的起碼条件。馮毅之的問題，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是大非問題，他的反党思想是根深蒂固的；他是山东文艺界右派反党集团的組織者、指揮者。他参加国民党后，曾發展国民党員三人及两次任县（区）党部幹事的职务，长期隐瞞，不作交代。包庇地主和反革命分子，並曾介紹土匪和反动党团骨幹参加我政府工作，其錯誤是严重的。

經研究决定，将馮毅之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其党籍，撤消一切职务，由行政十級降至十四級。

（已經山东省委批准）

山东省統計局整風領导小組关于将王梦玉定为右派分子的报告

（一九五九年一月十六日）

一、簡历

王梦玉，男，四十二岁，山西省隰县人，貧农出身，店員成份，一九三八年二月入伍，同年同月入党。历任分区委書記、营政指、团教幹、旅政治部股长、滨海区党委秘書、滨北地委秘書主任、工商局监委、青島貿易分公司副监委、省財委副处长等职，現任統計局局长、党組副書記、省計委党組委員。十一級。

二、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表現

王梦玉腐化堕落，蛻化变質。入城后积極追求資产阶級生活方式，吃喝玩乐，嫖妓女；並与史甄、王少洛、郭士毅等人气味相投，經常鬼混在一起。特別是与郭士毅的关系尤为密切，在青島时"郭、王不离"，到济南后也是"前郭后王"，形影不离。三反运动中，王、郭均被斗，因而怀恨在心，密謀污蔑領导斗爭的"馬巨涛是打击报复"；攻击中央，說刘青山、张子善"被槍毙有点过火"；糾合犯罪分子史甄和郭士毅密談，並予資助；竭力規劝成文夫同志代郭士毅承担安插特务分子武明甫的錯誤，进行其反党活动。

三反运动后，在王卓如的支持下，王梦玉跃升为統計局长，其在統計局工作期間，培植了一批亲信，拉攏了一批坏分子，互相吹捧，相互包庇，进行反党活动。当肃反运动开始，王梦玉的

亲信被斗，王即感到“斗争这些人，就象斗自己一样”，因而私通肃反对象，破坏肃反运动；至肃反后期，領导肃反运动的于清波同志离职学習，王則公开誣蔑“統計局的肃反搞左了，而寬了”，打击积極分子，挫伤群众情緒，並多方为肃反对象开脫罪責，修改結論，減輕罪情，甚至通过张耀曾放过了这批坏人（这次整風运动中有的逮捕法办，有的劳动改造，有的成为右派）；最后在总結肃反工作时，突出了运动中的缺点，否定了肃反运动的成績是基本的。

由于王梦玉长期与党处于敌对地位，和党离心离德，因而反党的本質也就处处表露。当統計局給职工換棕床时，坏分子肖連欢（已逮捕）說：“这可能与匈牙利問題有关”，王明知不对，而蓄意歪曲匈牙利事件的眞象，同意了肖的恶毒言論；又借統計局提拔一批科长級幹部和科改处未成等問題，他又別有用心的把責任推卸在計委身上，在幹部中制造不滿。

三、整風鳴放前后与反右斗爭中的右派言行

（一）攻击党的領导，敌視社会主义建設：

1.同情右派言論，贊揚右派分子对党的攻击。当右派分子攻击我党是宗派主义的时候，郭士毅極力主张提拔张薌林（極右分子）为基建处副处长，並說：“不是人家（指右派）說我們是宗派嗎？提起来可以堵住他們的嘴”，王則帮腔說：“是呀！张薌林提拔起来有代表性”；当統計局右派分子楊文远誣蔑党員是“暗探”，“党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宗派主义”时，王則公开贊揚說：“楊平时不大說話，你看这次給我們批評的很尖銳，以后是要注意呀！”

2.与極右分子郭士毅一唱一合攻击党的工資政策，污蔑合作化后的农民生活苦。郭說：“財政部眞有办法，現在房租水电都要出，将来書报費也要自理，增加的不多，支出不少”。王贊同的說“沒有办法还叫財政部嗎？”当合作化高潮时郭說：

"这次出發对我們的教育很大，平素在机关不了解群众的痛苦，不知道老百姓用一个錢都沒有，小孩子买一塊石板都要去借錢。有个农民对我說：'你們是楼上楼下，我們也是漏上漏下'"。王則支持同意。

3.与郭士毅一唱一合的反冒进。当社会上刮台風反冒进时，他們是同声呼应。郭說："打井計划大了，加上有些地方强迫命令，出現了一些废井"，王說："要讓各地統計一下废井数字"。郭說："水車生产多了，卖不出去，积压很多"，王亦贊同的說："卖出去的不是也有一些成了睡車嗎？反正都是睡車，在那里睡都是一样"。

4.反对社会主义統計制度的建立，抵制国家統計局的領导。省統計局根据国家統計局的指示精神，在全省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由于清波同志主持研究貫徹了新的农业定期报表制度，而王梦玉則抓住执行中的某些缺点，攻击国家統計局說："脫离实际，主观主义"，並因农业科执行了这一新制度而批評农业科达二年之久。此外，在国家統計局按排一九五七年劳动工資調查任务后，他亦不滿地說："国家統計局就是主观主义，不根据实际情况乱安排工作"。对国家統計局召开的有关重要調查会議，竟拒絕派人参加。

（二）整風、反右期間的罪恶活动：

1.策动肃反对象，攻击肃反运动：

王梦玉乘党整風之机，一方面公开散布流言蜚語，宣揚統計局的肃反面寬了，搞左了；另一方面則煽風点火，策动肃反对象向党进攻。当一九五七年六月上旬正是大鳴大放时期，最高人民法院轉回肖連欢攻击肃反的控訴信时，王梦玉就一方面指示张宗信同志向肖写检討，並告訴刘鏡心归还其写有血書的反动日記；另一方面即約肖进行密談，策动其进攻肃反运动。並囑肖要陈行箴、王震国（均系肃反对象，王曾亲約过王震国）等也来談談。在王的策动下，肖連欢就在統計学校恶毒地攻击了肃反运动，同

时，还向其他肃反对象进行了一系列的煽風点火，鼓励肃反对象陈行箴上書周总理，攻击肃反运动。

2.指揮右派退却，破坏反右斗爭：

統計学校反右开始，肖即被斗，当群众进一步追問其反党目的計划时，肖找王求救，王即支持他抵賴，說“我知道你沒有目的計划，象馬勛功、王洪德（均已定为右派）他們不要說反党，就是反貿易科也不可能……”，否定了馬、王是右派，从而例証了肖不是右派，因而肖回校后即气焰囂张，态度極其蛮横，后在群众的說理斗爭下，以及其他右派分子对他进行揭發之后，肖連欢再次向王求救时，王唯恐暴露自己，即要肖虛心检討，暗示他把問題包下来，蒙混过关。当着肖連欢按照王的办法施之有效时，則对王感恩非凡，認作父亲一般。

王梦玉在指揮肖連欢退却的同时，还在統計局阻挠、破坏反右斗爭。右派分子祁开敏，經党組多次研究才勉强定下来；在研究程永和等人的反党言論材料时，王竟庇护說：“算了吧！不要搞左了，一般作思想問題处理好了”；又当农业科对有严重右派言論的梁毅民开展斗爭时，王非但不支持，而責令停止斗爭，並趁下放幹部机会，把梁、程下放了。他不仅对前述人物进行百般包庇，繼續使用，且对右派分子祁开敏口口声声称“同志”，当同志們提出意見时，他仍强詞夺理說：“叫同志也是右派，不叫同志也是右派”。又当群众揭發統計局反右不徹底时，王又无中生有的說：“右派分子的比数不是5％嗎？”企圖据以反扑。

3.为極右分子郭士毅出謀划策，坚决与党对抗到底：

反右后期，極右分子郭士毅的問題日趋明显，計委整風領导小組关于郭士毅的問題向省人委領导小組写出报告时，王的态度曖昧，不以为然，並为郭士毅出謀划策，积極活动，当郭士毅說：“要开党組会議撰开”时，王即說：“得叫王卓如来主持”。

計委党組扩大会議期間王梦玉以腰痛为借口不参加会議，逃避斗爭，而在会外却积極活动，公开的歪曲事实，混淆視听，把大是大非的問題說成是“徐郭关系”。党組扩大会議結束后，王梦玉即主动找郭探听消息，並指点郭士毅反扑，当郭士毅問他对問題如何看法时，他說：“缺点錯誤是有的，主要是对张蘊林（右派分子）認識不足吧！别有什么？还不是平时不滿意他（指徐明同志）抓住这一点整你！”郭士毅在王梦玉的提示下，立即态度嚣张，随声应合，並說：“我不怕，我和徐明是原則上的分歧……他是有意的搞我。”王为进一步的激發郭士毅又說：“不过你現在就很难那样說了，因为你有錯誤……。”郭很坚定的說：“那不要紧，把問題摆开来，讓大家說嘛！”王說：“会議上有那些意見？”郭說：“有的人当然是說問題严重而且是右派；有的人說：錯誤是有的，但不是右派（指曹戎、李珂、孙怡然、成文夫）”。王梦玉了解了会議上的斗爭情况之后，並于当日写了一篇日記，說：“××同志（指郭）的問題，看样子日趋严重，究竟如何？要看具体事实証明，主观主义很难作为判断事实的根据，”以表达其为郭而憂，为郭而憤的心情。俟后王梦玉还在鼓励郭的亲信孙怡然說：“将来党組还要开会辯論。”

王梦玉和郭士毅的这些活动之后，郭士毅就把王卓如依为靠山，並积極謀划政治陷害，打击左派（王卓如积極宣传“徐郭关系”也积極寻找徐郭关系的根据），因而王梦玉再次向郭探詢情况时說“你的問題完了嗎？”郭說：“沒有”，王又很焦急的說：“你不是說清波同志对这些問題知道嗎？不知他什么时候才回来？如果他回来这些問題就好解决了”，郭說：“是啊！……王副省长說要他（于）写个材料”，王又說：“当时的那些情况你是否和王副省长談了！”郭說：“談过了”，王說：“那他（王卓如）怎么談的？”郭說：“……他要查对一下材料，以后再說，可能也要找你談”。王、郭的这次談話实际上是在繼續謀划进攻，同时也摸清了王卓如的意圖，並在王卓如的阴謀活动之

下，把郭士毅的問題长期拖了下来。王、郭認为有了"靠山"又复公开活动起来。

王卓如有意拖延郭士毅問題的解决，是为了爭取时間准备反扑，实現其政治阴謀。但与此同时計委領导小組又查清了郭士毅的若干問題，群众的揭發材料更进一步的深入。因而王、郭也察觉到問題未完拖下去也有問題，所以他們又进一步謀划新的斗爭策略，当王梦玉找郭密談时郭說："老王！我的問題也不知怎样了？""我想向組織上写个报告，希望能早解决了，……"，王說："最好能找領导上談談，早些解决了，不然拖下去不好"。並問郭："王副省长回来了嗎？"郭說："沒有吧！"王又說："赵省长不是回来了嗎？你最好能找他談談，不过你可不要再提和徐明的关系，因为你有錯誤，他又領导整風，你以后应該注意对他的态度，免得他給你火上加油。"郭說："問題解决了之后再說"，以后王又以約郭吃飯为名，再次的催促郭士毅說："材料写好了沒有？"郭說："写好了……給你看看吧！"王說："不看啦！你赶快交上！"，接着說："你还是趁赵省长在家和他談談好，不然他走了又要拖很长时間"。及至去年四月下旬省人委整風領导小組宣布郭为右派並对王卓如进行重点补課以后，王梦玉的心情十分紧张，虽然徐明、于清波同志一再动員他站起来揭發郭士毅，但王始終掩掩盖盖，既不据实交待問題又不揭發新的問題，坚决向党对抗到底。

四、追求資产阶級生活方式，利用职权污辱女幹部

王梦玉道德败坏，利用职权，調戏猥亵女幹部达4人之多，特别和王葆珍的关系尤为密切，不惜出卖党的利益，包庇其丈夫肖建欢，並在生活上对她关怀体貼，长期鬼混在一起。当他們的不正当关系被揭發时，王又几次的与其訂立攻守同盟，並說："不管他們怎么逼你，你也不要說出这一段，你可千万不要出卖我呀！"

五、对王梦玉的結論和处理意見

王梦玉蜕化变質，道德敗坏，品質極端恶劣。在整風鳴放期間，与右派合唱，攻击党的領导，敌視社会主义建設，並策动肃反对象向党进攻；在反右斗爭中，又积極指揮右派退却，破坏反右斗爭。特别是与郭士毅扭在一起，不听党的忠告，坚决向党对抗，情节实屬严重。当省人委整風領导小組确定給他补課后，又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揚言自己的問題簡单，說："一个禮拜就完了。"並在交代中抵賴狡辯，会上承認，会后否定，态度亦属恶劣。因此，根据中央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应将王梦玉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其党籍，撤消原有职务，由十一級降为十四級。

（已經山东省委批准）

山东省劳动局整風領导小組关于右派分子和坏分子侯林翼处理意見的报告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三日）

（一）簡　历

侯林翼，男，四十七岁，山东萊西县人，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份学生，文化程度高中。一九三八年六月入党，同年二月参加工作。历任交际幹事、科长、軍法处长、南海区专員、牙前实驗县长、胶东行署秘書处长、省府办公厅主任等职，一九五五年二月来劳动局任办公室副主任，現任副局长，十二級。

（二）历史关节与平日表現

侯林翼自参加工作以来，一貫敌我不分，經常与反革命分子、坏分子来往。土改时，包庇其地主家庭，破坏土改政策，一九四八年三査三整时被斗。鎮反时，包庇汉奸反革命分子陈复生。“三反”时因安插地主、国民党員、坏分子崔岳西、代敬义，貪污受賄，喂肥私商，受撤职处分。受处分后更加对党心怀不滿，特别对“三反”存有刻骨仇恨，經常散布流言蜚語，誣蔑“三反”运动。辱駡杨毅等同志蓄意整他，对他打击报复，把他个人的貪污受賄、丧失立場的严重錯誤說成是人事关系，捏造陷害。侯林翼仇恨三反运动，痛恨省人委，他来劳动局工作后，省人委召开的有关会議他都不参加，叫别人去代替，他說：“我一看到省府大門就生气，神經就馬上起反射作用”。

对肃反問題，侯和叛徒孙学之也一唱一合，否定成績。正当人民代表要检查肃反时，侯在处理肃反善后工作会議上，說：“莫先瀛只有領导的証明，沒有被他領导的材料这是不合法律手續的”。又說：“把肃反問題都拿出来审查审查，看看有沒有問題！卜克明、李功勋的問題，还有莫先瀛的問題都拿出来大家討論討論”。企圖推翻肃反結論。

丑化領导，自我吹嘘，两面三刀，挑拨离間，进行宗派活动，制造党內混乱。隐瞞地主成份，伪造学历，伪造級别、职别，招搖撞騙。

去年三月間，毛主席在珍珠泉做报告后，侯說：“毛主席来了，舒主任在大会上作了很长时間的自我检討，看到上級来了，光說缺点，表示虛心。舒主任說話真囉嗦！下边都煩了”。又說：“舒主任来了以后山东工作也沒搞出个什么来，比人家别的省落后”。他借代其华的問題，丑化谭启龙同志說：“代找譚，譚几次不見。新省委不如向明时代，向明时代还可以进省委的大門，还能找到人，現在不能进門了！”他挖苦晁哲甫同志，說：

"晁老是个木头、老胡塗"。經常誹謗省委和省人委秘書长沒有一个会办事的，你看修琪也当副秘書长了。把曲上升、楊毅、周光春、謝輝等同志說的一錢不值。来劳动局以后，就經常丑化管、亓副局长，造謠誹謗，諷刺挖苦，糟塌的一无是处，进行人身攻击。

侯林翼三反前沒有評級，因三反貪污犯錯誤定为十六級，他却吹原为十級，並造謠說：省委工业部要給他恢复十級，亓副局长不同意。侯本是办公室副主任，却硬要人家給他塡表为主任。到处吹噓說：中央要他到监察部幹司长，到衛生部幹司长，到西北工学院当院长，到外交部做外交方面工作，說省人委批他当副秘書长。一九五七年去中央劳动部参加劳动局长会議回来說："他們看我是办公室副主任，都对我表示不尊重，及至我在会上發表了意見后，他們都很惊訝，視綫都集中到我身上，特别是我的学生（××省局长）介紹了我的历史以后，开会时有些問題都来和我商量"。又說："我回来时，有两位大校为我送行，我上了車，他們行了一个軍礼，同車的还有几个少校以为我是将軍呢！路上他們雅雀无声"。吹噓自己在哲学上有新的見解，一夜写了六千字，諸如此类，在此不多列举，他甚至說："毛主席的夏季形势，他早就看到了，只是身分不同，說了沒有用"。因此，群众称侯为山东的李万銘。总之，他是逢人就吹，有机会就吹，不惜洩露党的秘密，甚至捏造胡說八道；他議論这个，議論那个，人前一面，人后一面，見什么人說什么話，两面三刀，拨弄是非，这是他一貫的手法。其目的是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在党內制造混乱，制造矛盾，企圖借此达到他个人目的。

（三）鳴放中主要反动言行

一、整風开始，大鳴大放，右派分子猖狂地向党进攻的时候，侯林翼也猖狂起来，他竭力为右派分子的反党謬論喝采。說："章乃器眞是个大人物，我們不过是草木之人"；說："林

希翎这个小女孩子敢在万人大会上講話，一講几小时，不簡单，真有两下子，多少教授都駁不倒人家"，並把林希翎美化的像一个自由女神；說："全国的大鳴大放上海搞的最好，人家的报紙（指文匯报）配合的也好"。同时，他自己也大放其右派謬論，說："定息不是剝削"，說："資产阶級的生产資料已經交出来，其性質就变了"，並說："对一切問題，不要打上阶級的烙印"。並和社会上右派分子一唱一合說："党支部是做特务工作的"。

进入反右派斗爭时，侯林翼对右派分子則竭力包庇和支持。我局右派分子陈正平一貫胡作非为，散布反党謬論，对抗領导，因此受过几次处分，整風开始就乘机煽風点火，辱罵支部，丑化管、亓副局长，办"流动快报"乱放毒箭，而侯林翼对陈正平却大加贊揚，說："他有独到見解，斗爭性强，敢說敢为"。当群众揭發了陈正平的右派反党言行后，侯即極力为陈辯护，說："陈正平有缺点，但他反党反社会主义值得研究，对陈正平的問題要慎重"。並对陈暗送秋波，說："我們几乎为你栽了跟头"。陈已被打成右派很久了，侯还和群众說："陈正平要轉变的好，他是个老党員，老同志，沒有功劳也有苦劳，不一定給他戴右派分子的帽子"。我局右派分子祝杰其右派言行早就表現的很明显，在反右派斗爭时管戈同志曾提出了祝杰的問題，但祝是叛徒孙学之的亲信，是他們这个右派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員，孙和侯更是百般掩护，孙与祝說："管戈向省人委反映，要搞你的右派，蓝名述（当时具体負責工业口的整風）要我警惕你"，並說："有我不要紧，你不要害怕"，而且大罵不絕，侯和辛銳說："有人想搞祝杰的右派，那还了得！"辛銳就表示对蓝名述同志領导整風不信任。三个人共謀把祝杰保护过去。孙下放之后，祝作賊心虛，找侯說他有些害怕，侯仍說："你不要害怕，实在不行，你可以打个报告养养病"。侯和祝很熟，又了解祝的历史情况，而他却一直想把祝包庇过去。去年反右派时，省人委办公厅对右派分子李兰斋开展斗爭，曾通过侯了解李的情况，侯

已知道李是右派分子，春节时侯还去給李拜年，並向李說：“你的問題我早知道了，前些日子有人到我那里了解你的情况，你沒有什么，你說話直爽，我当时給你下了保証”。从此以后，李的态度更坏了。侯林翼还和叛徒孙学之、祝杰掩护聖母軍骨幹分子王澤敏。

二、侯林翼对党的历次政治运动心怀不满，特別对三反存有刻骨仇恨，經常散布流言蜚語，进行誣蔑。在大鳴大放期間更为猖狂，百般辱罵楊毅、周光春、曲上升等同志；並說：“有些人就是踏着別人的血跡爬上去的”。並鼓动三反被斗的貪污分子辛銳、祝杰等人为他到处“喊寃”，混淆是非；在小組鳴放会上侯更別有用心的說：“三反时要我交代材料，一次一次的通不过，最后我就編造材料，扣大帽子，把自己臭罵了一頓，結果材料通过了，但是我的思想問題至今沒解决”。借此煽动群众对党不滿，企圖翻案。

侯林翼与叛徒孙学之勾結一起，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相呼应，否定肃反成績，誣蔑肃反运动，並企圖在劳动局平反。在小組鳴放会上，肃反对象卜克明的爱人仇瑞云攻击肃反运动时，侯当即加以表揚，說：“小仇發言很好，講了真心話，大家应向她学習”。会后並煽动肃反对象姚耀曾，說：“一切事物都有其对立面，运动也是这样，肃反也不是只有正面的，你要大胆提意見，不論对誰，也不論是原則問題还是具体問題都可提”。同时还極力主张为反革命分子吕宗仁摘掉“帽子”，从而博得吕对他的称贊，說：“侯局长的原則性最高”。

侯林翼对省委心怀不滿，和叛徒孙学之一唱一合，攻击省委的幹部政策。去年省四級幹部会議期間，叛徒孙学之和王月村密写大字报攻击省委，侯也参与研究。

三、侯林翼極端的資产阶級个人主义思想，是永远不能滿足的。为了达到他个人慾望，到劳动局后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阴謀活动，一来就公开向党伸手要职要級。侯三反撤职，一九五五年

組織上擬調其来劳动局任秘書，侯嫌职小，拒不到职，后經叛徒孙学之講好任办公室主任才来劳动局，来后由十六級提为十三級，他还不满，要十二級。到一九五六年提为十二級，仍不满足，恬不知恥地說：“我要求不高，起碼得由上升的級一样”。关于他的职别，孙給他講的是办公室主任，但省委批的是副主任，他也大为不满，鬧情緒，不工作，还罵亓副局长和人事科长张大武搗鬼，並怀恨在心，找岔子报复；后又向孙提出，說中央监察部要他去当司长，为了互相利用，孙又把他从副主任提为副局长。提为副局长后还不满足，得隴望蜀野心更大了，于是就更进一步地阴謀策划搞走管、亓副局长（党組副書記）。侯自来局以后就顚倒黑白，混淆是非，大肆宣揚三个局长不团結，並强调管、亓副局长鬧分散，而且提出解决的办法只有調整組織，把管、亓調走。他一面在局里幹部中散布这个論調，同时和叛徒孙学之利用收买拉攏，挑撥离間等卑鄙无恥的手段，在幹部中进行宗派活动；並把和他們臭味相投的祝杰、李鋭（均系貪污分子）都提为处长，同他們結成反党宗派集团，作为反党活动的核心。除此，还积極的攻击和改組人事部門和支部，侯与其亲信說：“人事和支部这两个部門是机关的两个最管用的部門，不能由亓副局长照管，要办公室領导”。

除了这些思想准备和組織准备外，侯林翼所用的攻击手段也是極其阴險恶毒的。第一是利用我局技工学校工作上的缺点，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侯造謠說：“技校郑校长和亓有干系，郑校长是管、亓配备的（是經党組会議决定的），技校問題管、亓应負責”。並策划要“通过技工学校問題来解决局的問題”。侯和孙用提两級的办法拉攏王震同志，派到技校任副校长，不久又調連世倫去当科长，要王与連和徐維两（技校秘書，祝杰的爱人）在技校結成一个核心，攻击校长郑立夫同志，並对王、徐說：“要放长綫釣大魚，好好的搜集材料”。技校开支有浪费，管戈同志一次曾指示王震，学校大的开支要經局的批准，王回校未作

传达，侯即贊揚王"有水平，有質量，老練可靠"，和祝杰說："王比十三級处长並无逊色，讓它（指技校）糟，越糟越好"。但王以后不太积極，因病休养，侯又瞒怨王，說："你一病就搞的不好啦，失去了时机"，这一攻击未得逞。

整風大鳴大放，乘右派分子向党进攻之机，又策划第二个攻击。集中力量搞亓仲文副局长，一面誣蔑肃反，煽动肃反对象攻击亓領导肃反有錯誤，另方面攻击党的幹部政策，造謠誣蔑亓对幹部打击报复，品質恶劣。右派分子祝杰揭發：他和辛銳在鳴放中攻击管、亓的材料，絕大部分是侯捏造的。同时利用右派分子陈正平大肆活动，非搞掉管、亓不行。党提出了反击右派，他們这一攻击又未得逞。进入反右派阶段，侯的野心不死，进一步地下最后毒手，抛开了党組与孙密謀策划以"混战"为名，利用右派分子陈正平乱咬，对左希温、王宝輝、楊斯来、张大武、苏安桂、刘欽华等同志發动斗爭，要把这些人打成右派，进行恶毒的政治陷害。这些同志都是肃反审幹的积極分子，在局里主持正义的，但却被孙、侯所忌恨，視为眼中釘。同时大肆造謠說，这些人都是亓的人，这些人的問題都联系到亓，企圖把这些人打成右派，然后搞到亓身上。侯向祝杰、王震說："盖子快揭开了，很多問題联系到亓，这一下差不多了，看亓怎么交代"。对此，管戈同志提出反对，同孙、侯进行斗爭，侯、孙更恶毒的說：管阻碍反右派斗爭，侯並和辛說："管也象个右派"。同时侯授意祝杰、辛銳在群众中大肆宣传："解决局里問題的时机到了，盖子揭开啦，要大搞一場"。並給祝、辛打气，在这紧要关头，可不能退却。但阴謀战胜不了真理，經省人委整風領导小組制止，这一恶毒陷害又未得逞。侯林翼为了达到个人野心，是不择任何手段的。这也是他进行反党阴謀活动，一貫採取的手段。

侯林翼一貫两面三刀，挑拨离間，制造混乱。侯来劳动局后，就造謠生事，在处长中說："劳动局环境复杂，不好处"，对刘子陵同志說："不要太天真"！对王震同志說："这个年头

不知誰犧牲誰，誰害了誰，要注意”。又說：“这次整風中央决心很大，要砍掉党員的零头，領导幹部要大調換大調整”。說：“省委也很紧张，从上到下都有些賬，各賬各还”。並散布他处世的哲学，說：“这个年头就得順乎天，应乎人”。对祝杰挑拨說：“亓副局长厉害呀，你要注意，你的性格我了解，不善于处这种环境，提拔你做副处长可不容易呀！”对辛銳說：“为提拔你当处长，孙局长都和管、亓吵起来”。对祝杰說：“在提拔你为副处长时，辛銳反对！不知你怎么得罪了他，你要注意”。在辛銳面前又說：“老辛，祝杰說你翘尾巴，你要注意”。对辛銳和辛的爱人庞玉兰說：“邹成莒（工資处副处长）很坏，想把庞从工資处挤出来，要小心”。对管、亓副局长則到处丑化，进行人身攻击。总之，他是逢甲說乙，逢乙說甲，制造矛盾，極尽挑拨之能事。过去群众就称他“侯小鬼”，品質極端恶劣。

（四）斗爭中的态度

侯林翼在这次整風补課中，态度很坏，一开始即与其反党集团成員辛銳訂立攻守同盟。党組与其談話，要他交代問題时，其态度非常蛮横，向党組进行恶意的攻击与誣蔑。在揭發他的問題过程中，在大量反党罪恶鉄的事实面前，他仍百般狡賴，反复无常，耍流氓手段，不老实交代。至今毫无悔改表現，拒絕参加劳动。他在土改复查、三查三整和“三反”等历次政治运动中也一貫採取这种手法，那时群众就称他“琉璃球”。

（五）結論和处理意見

根据以上事实充分証明，侯林翼是一个混进党內的阶級異己分子，其反动地主阶級本質根本未变。一貫敌我不分，丧失立場，誣蔑党的历次政治运动，攻击省委；散布反党謬論，包庇右派；与叛徒孙学之共謀組成右派反党集团，进行反党阴謀活动。一貫两面三刀，挑拨离間，吹嘘伪造，政治訛詐，品質極端恶

劣。在整風补課中态度極不老实，毫无悔改之意。侯林翼是一个党內的極右分子，也是一个坏分子。

我們意見：撤銷侯林翼一切行政职务，开除其党籍，开除公职，劳动教养。　　（已經山东省委批准）

山东省民族事务委員会整風領导小組关于右派分子花經熬的錯誤事实定案报告

（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日）

花經熬，男，三十八岁，安徽省定远县人，貧农出身，学生成份，初中文化程度，小时幹过小商販，在本县国民党县府当过勤杂人員，一九四一年三月参加工作，一九四三年七月入党，曾任会計、商政科长、副处长，現任民委副主任。

花經熬来民委首先計較职务和級別，曾数次叫秘書問省人事局，也亲自問統战部幹部处，来民委工作是什么职务、属那一級？統战部向他說是厅局級才安下心来。三年来的表現：

（1）狂妄自大，独断专行，目无組織。如說李主任写东西不象样子，重要东西写不进去。並夸耀自己說从他手里出去的东西，沒有錯的。又如：擅自决定出国朝覲的人員；隨便动支大批公款；整風前很多向上的报告和会議上的發言，很少召集党組会或办公会集体研究，仅是与几个对口味的人商量一下即办。

（2）处处显示自己，扩大个人影响。如一九五六年到太安参加阿訇会，会后又以民委名义单独召开一天会，搞会餐、吃水菓，会后坐着专署小汽車到回民乡买弄威風。一九五六年到德县检查工作，出發前亲自掛长途电話通知該县說明自己是民委副主任要去检查工作。

（3）拉攏宗派，排斥異己。对机关幹部不是平等看待。对情投意合的无話不說，如对楊小儒、陈兴起、馬文宝三人認为他們是"頂起来"的好幹部。在各方面，都給予方便和支持。如党內文件的閱讀，出省参观，他們在工作生活上提出的要求也多得到滿足。还长在一起散佈流言蜚語，对幹部評头論足，互相吹嘘捧場。对重大方針政策問題及对省人委、統战部看法基本是異口同音。而对不趁心的幹部討厭，不但工作上不給予支持，反而处处排挤、找別扭。如对办公室主任，花想尽一切办法將他調出民委。花的作風也很坏，身为民委副主任，竟不顧影响，在自行車上带着品質很坏的女幹部穆惠敏到山东剧院去。穆要求救济十元，群众和福利組評議五元，花却批成十五元。

花經熬的主要罪恶事实是：一貫假借代表民族利益，站在民族主义立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篡改和不执行中央的政策指示，攻击党与政府，污蔑党政領导人員，否定社会主义优越性，反对社会主义改造，挑撥民族关系，分裂民族团結，煽动少数民族反对党和政府。

一、地方民族主义，表現在：

（1）强調幹部民族化，反对幹部共产主义化。花是从"只有少数民族幹部才能为少数民族謀利益"的錯誤观点出發，企圖从省人委、省委統战部直到有关基層政权和有关部門都配备少数民族的主要領导幹部，在各級党政領导机关內建立少数民族的領导系統，分裂党的統一。如在四級幹部会議期間，就打算要求省人委要有回民副省长。四級幹部会上鳴放：要求省委統战部提拔回民副部长。攻击省委說"全省沒有一个回民县委書記和正县长。少数民族当七、八年副县长当不上个正县长"。还污蔑說"全国人民代表沒安排省民委的人。民委也不能参加民族委員会"。一九五六年六月在第一次民族工作会議上的总結和有关县市建立民委机构的文件上提出"五千人口以上的县、市要配备回民副县、市长。少数民族較多的乡配备少数民族副乡长"。一九

五六—五七两年民族工作规划上提出："省教育厅要建立民族教育处，五千人以上县市配备少数民族教育专职幹部。……要在三年内将有条件的'阿訇'轉为国家幹部"。还提出："在合营企业中将回民职工資方安排到領导崗位上"，以便从上到下，从党到政，从机关到企业建立回民領导系統。

（2）制造民族分裂：在社会主义的社会公共事业中单独建立回民的一套，借以使回民突出，使回民孤立，制造民族間的洪沟，阻碍民族关系的密切和民族間的自然融洽。如在一九五六—五七两年规划上提出："建立回民医院、托兒所、养老院、俱乐部、回民中学，民族乡建回民診所、保建站"。花在一九五七年力爭实現他的計划，已在济南回中建立了高中班，在七个县市設立了回民班，要給济南市民委拨三万元建立俱乐部未行通，而大为不滿。給济南市街道回民托兒所补助了四百多元，还指示德县要教育回民幹部坚持"民族感情"。

（3）不顧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扩大少数民族的困难，强調国家对回民的經济扶持，並歧視排斥汉民，夸大民族間的矛盾。如一九五六年花以个别县的几个回民村与汉民村牲畜农具佔有情况对比，推算出全省回民比汉民少的牲畜农具价值二百七十万元，以此数字向省委要求三年补齐。一九五七年国家拨發少数民族生产补助款五十万元，花主张只补助回民，对汉民仅是补助个别戶。一九五七年春，我省去青海的回民和当地汉民打了群架，回民有伤亡，馬文宝同志調查处理回来，花坚持主张要馬文宝同志对汉民打了回民写专題报告，替回民向中央喊"寃"告状。完全站在回民方面，說"金岭鎮事件全省回民均已知道，邻省回民也来信支持，甚至来人支援。說回民吃了亏"。

（4）扩大民族差異，强調少数民族特殊。我省回民与汉民在政治經济文化以及風俗習慣本来是沒有多大区别，民族关系特别在解放后基本是正常的（地、富、反、坏、右挑弄是非除外）。但花經然始終認为我省回汉民經济文化有很大距离，民族

关系、民族差異很复杂。如一九五七年冬花在省人委整改座談会上鸣放說："山东少数民族經济水平較汉民是低的，未赶上汉民水平……，少数民族成立的合作社或少数民族多的社悬殊很大"。还說："省人委是否認为少数民族主要是回族，与边疆少数民族不同，不过是不吃猪肉，其他与汉民无異。其实不只猪肉問題。問題很复杂。"

花在五年民族工作规划中还提出"要百分之八十的高小畢业生升初中，百分之九十的初中畢业生升高中。七年要国家撥發教育补助費一百至一百五十万元"。

二、假借代表少数民族利益，篡改和不执行中央政策指示，反对省委、省人委的領导。污蔑省委、省人委和負责同志"是大汉族主义"，"不重視"民族工作，"不尊重"回民的風俗習惯；"歧視"少数民族等，並煽动回民反对党和政府，威胁政府幹部。表現在：

（1）攻击省委是"大汉族主义"，"不尊重"少数民族的風俗習惯，在区划問題上将少数民族"分而治之"。污蔑省委"排斥歧視"少数民族、"不在"少数民族中培养提拔幹部，發展党团員。如一九五七年冬全省四級幹部会議上花鸣放說："省委發出的指示或全省性的工作规划，提不到民族工作的問題，好像山东"沒有"少数民族。如农业积極分子会議上提出每人养猪一头，会內有十几个回民就向民委提出問題来，說"沒法"响应号召。中央提这一口号时，說少数民族除外，而我省就把这一条删去了"。又說："区划、建乡工作，对民族工作未注意（主要是省委組織部），有的把一个回民乡划到两个县里去"。还无中生有地說："有些幹部上边說什么，他就說什么。曾有一个乡长到一个村里号召群众养猪，結果这是个回民村"。还扩大事实无中生有地說："在少数民族中的党团發展和幹部培养問題……，不如抗日时期，太安城关几千户回民才有一个妇女党員。济南市……發展一个半党員。章邱四千多回民沒有一个幹部。德县四十

二名民族幹部是解放前的，解放后沒吸收一个；去年提拔了三百六十多个幹部一个民族幹部也沒有……”。

（2）花同样恶毒的攻击污蔑省人委。如一九五七年冬在省直整改座談会上說：“省人委对民族工作有一般化領导的情况。还沒有对少数民族特点和需要，在方針政策領导上加以特别注意。回汉杂居地区猪乱跑，引起回汉糾紛”。还說：“省人委对民族工作認識上有問題：（一）省人委是否感到少数民族数目不多，不会出大問題？領导一般化是否与此有关？人数当然少，但人少容易出乱子，鬧起来往往不小，影响很坏。（二）略。（三）是否認为合作化后問題已經不大了……。（四）有的負責同志总象認为少数民族好鬧事……”。

（3）丑化、攻击省委書記譚啓龙同志“官僚架子”、“听枕边言”。丑化楊宣武同志“經不起批評”。一九五七年夏花参加济南市委召开的研究回中鬧事問題的会，受到市委的批評（批評单搞一套）花也頂了王路宾。开会回来与楊小儒商量：“严副市长是譚啓龙同志的爱人（当时处理回中問題並参加会的），别叫譚政委听了严的話（济南对回中看法）。我們爭取主动向省委彙报……”，不几天花勾結赵篤生向省委常委当面攻击。楊宣武同志提出国家过多的从經济上扶持少数民族值得考虑。花不滿即在省人委整改座談会上一再攻击楊宣武同志說：“在經济上扶持少数民族問題，可能由于楊副省长对情况不了解，实际上每人（按回民連地、富在內）补助两塊多錢是超不过汉民的”。回来在机关散佈“整風眞了不起，我提了意見，楊副省长脸通紅”。

（4）花經常对中央政策、指示、决議狂妄地进行篡改和拒絕貫徹执行。（一）一九五六年春中央指示各省市普遍进行一次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检查，花却曲解中央指示，說中央指的边疆，山东与边疆不同；而在一九五六年六月第一次民族工作会議上佈置重点检查。（二）关于清眞寺的修理，中央的指示（花亲自参加的会議）是：政府不干涉，不帮助，不影响生产群众自籌

自办。但一九五七年花却主张由国家开支五万元資助修理清眞寺七十多处（其中应該資助的只有两处）。（三）对阿訇生活补助，中央指示是不能劳动，生活确有困难的进行救济。一九五七年花主张拨出二万元，补助阿訇生活（每人平均四十元），助长了阿訇不劳而获的剝削思想，大大助长了阿訇威風。竟有的阿訇說"政府离了我們不行"。（四）国务院指示建立民族乡的原则是：参照历史情况，民族关系显著，有利民族团結，有利發展生产。花却篡改成：二千人口以上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划入不超过回民人口的汉民建立民族乡。

（5）煽动回民反对政府，反对政府幹部。如一九五七年六月花經煞煽風点火的反动文章，在回协"通訊"上登出后，德县五間房（回民村）回民看到文章登着"德县边临鎮区供銷社主任說五間房沒个好人"，五間房回民集合起来要去打区供銷社主任（被平息），又如济宁市大乡老王茂臣（右派）看到文章上說：不少地方不尊重回民風俗習慣，菜里常吃出猪肉来。也有的汉民用猪肉和回民开玩笑。王对花說（花正在济宁市处理回民關事）："从你写的文章看叫回回吃猪肉到处都有，不解决眞不行"，加上花当时对伊斯兰教上層迁就縱容多，批評教育少。因此發生几十个回族伊斯兰教上層人士向市府請願。

三、反对少数民族走社会主义道路。扶持鼓励私有制，否定合作化的优越性，發展回族人民合作化道路上的障碍。表現在：

（一）反对农村回族人民尽快的走合作化道路，並支持阿訇破坏合作化，企圖长期保持回族人民中的資本主义自發势力。如花在一九五七年冬省人委整改座談会上說："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中，回族占（全省）少数民族百分之九十七多，多是搞小商販（按：多兼营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几乎全部轉到农业上去。但困难很大，"沒有"技术，"沒有"生产資料。有些人就感到社会主义改造"改坏了""。一九五六年阿訇会上花提出处理清眞寺土地入社的七条办法，强調社里出租金納报酬和自种，会后

有几个地方的阿訇，从社里抽出比原来土地多的大量土地，仍由社出劳动力义务耕种，大量余粮到黑市高价出卖。

（2）丑化合作化，否定合作化的优越性。如一九五七年四月在省政协会議上發言，和在回协“通訊”上的文章扩大捏造事实說：“德县祟兴白家集两个社，去冬死了八十头牲口。……生活上沒吃沒烧，住破房，沒被子，生病无力治疗，在部分地区也很严重……，白家集、祟兴、管飯堂三个回民村（五百四十九戶）缺粮十九万斤。突出的是……将近半数是无錢賺粮的，急需国家救济。……仅祟兴一村調查有二十三戶一百零八人每戶只有一床破被，好几戶七口之家三代伙盖一床烂被。有十二戶住的房屋山墙倒塌，上盖漏雨，下雨刮風需要搬家……，二十三戶二十七人病情种类很多，如果生活稍好加上一般治疗，許多人是可以很快治好的，但是由于生活困难……春节前后已死去四人。……由于上述情况祟兴回民已有三戶小孩送人。要飯卖旧衣旧被、拆房子，卖家具的情形已經發生”。

（三）利用国家資金扶持鼓励私有制。如一九五七年国家拨出五十万元补助少数民族生产，花在他宗派小集团的維护下积極主张将专款补助了少数民族作为私有。直至一九五八年三月民族工作会議上花仍指示楊小儒召开各专署幹部会，仍按补助私人的原則佈置一九五八年的二十五万元生产补助款（被制止）。

花經熬在攻击省委、省人委和执行政策中的严重錯誤，省委統战部指出数次，花却不理不睬拒絕交代。当机关开展双反斗爭时，花不是引火烧身，而是把問題向上推給李敬渔主任，向下推給科长們，自己是清水衙門，赵芳洲部长和曲处长亲来民委帮助检查时，花思想上極为抵触，要无賴不检查。錯誤的認为統战部“画好了匡子讓他套”，不得已时勉强在民委党組会上进行第一次检查，这次实际上不是检查，而是陈述情况和指出下边同志們的缺点說明他自己是正确的，他曾通过赵篤生打击威胁向他积極斗爭的同志，妄圖破坏运动混过关去。在全体同志們的揭發批判

下，后段表现还好，經过七八次检查交代，承認了錯誤。並积極揭發了赵篤生、楊小儒（右派）等人的許多重大問題。自調鉄厂劳动很好，願意悔改。

根据上述錯誤事实，花已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党内右派分子，为严肃党的紀律，純潔党的队伍，决定开除其党籍，撤銷民委付主任职务，由十三級降为十四級，另行分配工作。

（已經山东省委批准）

中共大众日报社机关委員会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方正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九日）

方正，原名許保干，男，三十五岁，山东滋阳县人，家庭出身城市自由职业者，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三九年入伍，同年十一月入党。入伍后历任县委文書、宣传队長、宣传幹事，县参議会秘書、县动委会宣传部副部長，太山时报記者、編輯，魯中报記者、副主編，魯中南报採通副主編、主編，山东分局政研室研究員，資料組組長、分局办公厅秘書、秘書室副主任等职。一九五四年春来大众日报任副总編。

（一）历史上的主要問題

一九四〇年因犯自由主义，搞宗派小集团的錯誤，曾被怀疑为托派，留党察看两个月，后問題查清，撤銷处分。一九五三年，因欺骗組織，盜用公章介紹政治面目不清的人混入国家机关，受党内当众劝告处分。

（二）主要的錯誤事实

一、几年来一貫攻击和誣蔑党的領导。誣蔑一九五六年召开的省党代大会沒有發揚民主，党內沒有自由，說“报社对省委不敢大胆講話，县委書記对省委也不敢大胆講話，省委对中央不敢大胆提意見。”誣蔑省委負責同志給予报社的正确批評和指示是“主观主义”、“无中生有，用大帽子压人”。鳴放期間，更狂妄地攻击省委，說“夏征农同志批評报紙忽視党性，报紙上讀者反映少了；舒同同志批評漫画后，漫画就少了。”提出要省委交权，以要求省委对报紙只管大政方針为借口（事实上省委就是管的大政方針），企圖摆脫省委的領导。誣蔑省委不关心群众疾苦，狂妄提出要省委書記和群众一起排队买菜、买肉。

二、近二年来，利用职务方便，写了“烏龟的格言”、“暮气沉沉的人”、“金大吹”等許多杂文，从各个方面丑化、謾駡党的老幹部。将党的老幹部說成是些唯唯諾諾、卑躬屈膝、計較名利、貪圖享受、飽食終日、不学无术的人。鳴放期間，更借“左叶事件”向党进攻，誣蔑党的領导幹部不許批評，“只准歌功頌德，焚香称頌，高呼天下太平，風調雨順，伏維我皇万岁万万岁。”

三、以資产阶級的办报綱領反对党报的政治方向。反对报紙作为党指导工作的工具，他說大众日报由于指导工作办得枯燥无味、像“寡妇脸”，主张对报紙进行“革命”，提出“报紙必須从讀者爱好、兴趣出發，不發、少發指示文件”，要报紙“自下而上指导工作”。在右派分子王中面前講：“誰要在报紙上登文告，就要收广告费”。在其主持报紙工作中，經常对領导机关指定登报的指示进行刁难或拖延。另一方面則带头鼓励在副刊上發表毒草，热衷于首先篡改副刊的政治方向。

四、是刘建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員之一。与刘建共謀反对省委对报紙的領导，共同策划要篡改党报的政治方向。如：刘建蓄意

在各报总編輯会議上胁迫省委接受其反动的办报綱領，方正就根据刘建的意見在会上充当了攻击省委的先鋒；刘建提出根本改革报紙，方正就連續拟出对报紙进行“革命”的具体方案。

（三）錯誤的根源

方正墮落成为党內的右派分子，是有其深远的阶級根源和思想根源的。他出身于剝削阶級家庭，在帝国主义者办的教会学校中受过教育，反动的家庭与学校培植了他的資产阶級的精神面貌。入伍后，他的資产阶級的立場、思想沒有徹底改造。相反，堅持“以本来面目見人”（方正的話），和党的思想、立場处于一种对立状态，所以，他入党后不久，就曾一系列的犯錯誤，並付一度被怀疑为托派。释放后，他沒有从正面接受教訓，認眞改造思想，而是自認为有“骨气”，他对了，党錯了，党对不起他；並散布不滿情緒，仇視領导幹部，仇視党的公安部門和組織部門。解放战爭胜利后和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的資产阶級思想、立場，就更进一步表现出来。如：与資本家拉拉扯扯，連續介紹政治面目不清的人混入国家机关。由于他頑固地站在資产阶級个人主义立場上，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發展，他与党的距离就越远，以至于誣蔑党、攻击党。从一九五六年七月省党代大会到去年大鳴大放期間，他更乘国际国內修正主义台風，利用鳴放的时机，与叛徒刘建結成了反党联盟，猖狂地进行反党活动，徹底暴露了右派面目。

（四）本人对錯誤的态度

斗爭中，态度較老实，对自己錯誤的检討比較深刻。斗爭后，有悔改表現。

根据方正的上述錯誤事实，說明他完全墮落为右派分子，为純潔党的組織，严肅党的紀律，經过省委批准开除其党籍，撤消原有职务，由十二級降为十九級，另行分配工作。

中共济南市委关于右派分子王路宾主要錯誤事实的报告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

編著按：王路宾原任山东省委常委、济南市委第一書記。山东省第一届党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議决定，中央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五日批准，将王路宾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撤消一切职务，工資待遇降低四級。

根据省委指示，市委在今年六年間召开扩大会議进行整風补課，对反党分子、前市委第一書記王路宾的严重錯誤进行了揭發和批判。王路宾的主要錯誤事实是：

（一）积極支持和維护向明进行反党活动。在向明时期，王路宾积極維护向明的領导，忠实的执行向明的指示。如在一九五四年向明主持的山东統購統銷工作中死了一些人，公安厅据实向中央公安部写报告，並經当时分管政法工作的分局委員、副省长李士英同志审閱签發，而王路宾却認为"报告与向明指示不符"硬压住不發。王路宾积極参加向明所發动的錯誤的反分散斗爭，排斥打击党的好同志。在平时，王路宾經常为向明吹嘘，說："向明执行中央的政策路綫是忠实的，以向明为首的領导核心是正常的。""向明能力强，領导高明。""是党內的后起之秀"。称向明主持的一九五三年五月分局扩大会議"在山东史上有历史意义，是繼大鲁南会議（少奇同志主持）后的又一次胜利，証明山东党已經成熟"等等。对这些問題在清算向明錯誤中，王路宾非但未能認真检討自己，相反的却对清算向明錯誤不滿，說："向

明有錯誤，其他人也有錯誤”。对于中央和省委关于清算向明錯誤影响的指示有抵触，在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公然为向明辯护，攻击省委“好象成績是反向明得来的，”“不要拿向明当挡箭牌”等。在传达省党代大会决議精神时又說：“党內生活不正常”，“肃清向明錯誤斗爭原則界限不清。”在一九五七年十二月省委召开的四級幹部会議上右派分子苗丰羽攻击省委，“向明时期运动就死人，有片面性，現在社会主义大辯論又死了好多人，同样存在片面性。”王路宾却喜形于色表示同意。

（二）大搞地方主义，反对中央和省委的正确領导。

1、从右傾机会主义观点出發，王路宾在一系列的問題上，反对党的方針路綫政策。早在一九五五年和一九五六年他就是山东反“冒进”逆流的代言人，他曾同右派分子王卓如等在农业增产和合作化問題上攻击过省委“急躁冒进”。对济南郊区实現高級农业合作化他不同意，在郊区区委一次幹部会議上强調“初級社也能增产”。在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王路宾同情和支持当时反“冒进”的台風，認为“精神还是好的”，要省委接受下来“本着这个精神再修改工作报告”，甚至还狂妄地說：“根据市的經驗，听听就清醒了”。在传达省党代表大会的决議时，王路宾又强調提出了省委“在农业生产上主要存在着急躁冒进，盲目增定增产計划給工作造成了不少损失。”“工业生产追求数量以及改造中的缺点，都与省委的指导思想有直接关系”等。从反“冒进”的指导思想出發，王路宾擅自否定了济南市根据全国农业發展綱要四十条的精神所制定的、並經市党代大会和人代大会討論通过的全市各項建設事业长远规划，說：“过去是头脑發热了。”

一九五七年二月搶先于省委召开市委扩大会議传达主席在省市委书記会議上的指示，还說：“省委的会議提前了，我們不得不提前。”在会上对反对社会主义的两股台風說成是：“一般思想認識問題”，强調“全面分析，正面教育”，“不能用整風的

办法对待”。“存有极端民主也不要过分强調。”这次会議精神在原則上与中央和省委指示完全对立，还自詡为“主題明确”“發揚民主比历次会議都充分。”

当省委在三月份召开县書会議传达中央和主席关于反击两股台風和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指示时，王路宾又强調“思想問題在市委二月会議上摆过了”：“經过市委扩大会議这方面的認識已有了基础”，而引导济南出席会議的幹部着重討論增产节約問題。在布置如何传达省委三月县書会議精神时，仍强調“結合三月会議传达二月会議”根本未提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对执行資产阶級和資产阶級知識分子的改造政策上，王路宾片面强調团結，不要思想改造，在討論提拔幹部的会議上說：“党外幹部也不比党內差”，在政协会議上又說：“党对知識分子也是看他的缺点多，忽視了他們整个的长处。”

王路宾还反对党的群众路綫，一九五七年中央和省委指示开展增产节約运动，組織劳动竞賽及在政法工作方面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他力主不搞群众运动，說：“在企业不能搞群众运动”。“不要用运动解决問題，运动容易带来付作用”。“搞运动經常就沒有了，一突击就过火”等等。

2、对抗和拒不执行中央、省委的指示，自己标新立異另搞一套，王路宾很强調“在工作中要全面分析，不要刮台風，不管是上边来的，还是下边来的，要有主見，不要随風倒，要經得起冲击，应該坚持的一定要坚持。”一九五六年中央和省委指示要在企业中清除一长制，貫徹企业党委集体領导下的厂长負責制，王路宾認为“一长制在济南未正式形成”，布置“不要进行思想批判，以免影响行政幹部的积極性。”对济南搬运工人鬧事問題的处理，省委指示按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原则处理，王路宾则表現了强烈的压服情緒，並布置在全市职工中“派代表团、写抗議書”，“要在全市人民中成为一种气氛，卑視这

种行为。”1957年整風开始，中央指示要大鳴大放大字报，而王路宾布置对大鳴大放大字报“不提倡也不制止”，並規定“屬于集体决定的問題，以及肃反等方面的問題不鳴放。”整風开始在步驟上，中央和省委指示先搞大型企业，在中等学校先試点，王路宾則布置在大中小企业和中等学校一齐鋪开，發动中学生进行鳴放。对中央“整風生产两不悮”的指示，王路宾公然在幹部大会上說：“整風生产两不悮是对立的东西，提它有付作用。”在列席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时。譚震林同志指出：“山东有人搞地方主义，企圖赶走舒、譚”，舒同同志並要王路宾回山东作传达，王不但当时說：“山东沒有地方主义”，並且回省委也未認眞作传达。

王路宾对上級业务部門的許多指示，如粮食定量供应、划区医疗等均拒不执行。还說：“对这些問題要有抗的精神。”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之后說：“今后主要应服从塊塊，对上級业务部門的意見可以不执行。”

王路宾还在一些重大的組織原則問題上自作主张，与中央、省委相对抗。他在評定工資等級时規定要将济南市領导下的区級划为地、专一級（省委規定为县級）。市委会的选举名額未經請示省委自行主张扩大了十余名。王路宾对市委書記处集体办公很不感兴趣，而要書記处書記、市长及各区区委書記多与他个人单边联系，其目的是为了大权独攬，大搞地方主义，搞独立王国。

3、对正确执行中央方針路綫的省委極力进行攻击、誣蔑，企圖搞垮省委赶走省委領导同志。早在清算向明錯誤新省委刚一成立，王路宾就極为反感，說：“新省委对我不了解，平原和华北局的負責人对我了解。”並对秘書說：“我的工作环境很不好”，“我还要斗。”从这种極端的“不滿”出發，王路宾一方面到处散布流言蜚語，对省委进行攻击，誣蔑省委“老是在稳字上作文章”；“省委劲头不足，工作布置太晚”，“書記处和常委的关系有問題”；另一方面王路宾又公然与省委分庭抗禮、比脔

低，唱对台戏。他在各种場合下極力宣揚自己，宣传济南如何先进，在省委开会后，回市委他很少系統的传达省委指示，而是把省委的指示当成自己的意見来蒙蔽組織，如省委指示要市委認真进行整風补課，王路宾則对市委传达說："省委对济南的工作是滿意的，沒有什么重大問題，主要是些思想作風問題。"他还常常夸耀自己在省委常委会議上如何敢說，有独立見解等等来抬高自己。对許多重要工作，王路宾都是搶在省委头里向下传达布置，如对省委关于企业領导制度和开展增产节約运动指示，强調"市的布置和省的布置精神是一致的"，"省的布置沒有什么新的內容，不必再专作传达部署了。"一九五七年五月王路宾参加了一次中央召集关于整風反右的重要会議，回来后他先在市委作了传达，而后才向省委作传达回报。

省委对王路宾的錯誤指出批評后，王路宾更加"不滿"，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对省委进行攻击。一九五六年省委对济南郊区合作化中的問題提出了正确的批評通报，王路宾念念不忘，在省委开会，多次提出这个問題，說省委的批評是"潑冷水"，是"促退"，"有点三堂会审的样子"。他在省委扩大会議上批評和攻击省委的集体領导"書記处駕于常委之上"，並揚言向省委"放了一炮"。在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他又攻击省委"缺乏自我批評，会議發揚民主不够充分"，說省委"看成績多了一些"。一九五七年三月在省委召开的县委書記会議上，济南小組發言对抗中央和省委指示，省委提出批評后，王路宾却認为是"小題大作"，"方式太紧张"等等，事后又蒙蔽常委举行常委扩大会議进行假检討，还說："省委对我有誤会"，"不知为什么省委老是拿我当反对派"。

王路宾还与右派分子、原副省长王卓如、袁子揚等人一起散布对省委的不滿，制造謠言蜚語，对省委进行破坏活动。他們經常在一起議論省委負責同志，挑拨省委負責同志之間的关系。为了不致暴露他們的問題，袁子揚曾几次写信給王路宾說："有人

反映你維护向明"，並要王路宾"注意"，王路宾还曾与赵健民同志在一起密談、議論过所謂省委負責同志"不团結"的問題。並極力的迎合与支持赵健民同志的地方主义情緒，在1956年第九次省委扩大会議上强調"省人委要与省委分开"，說："赵健民同志是省长，不住到省府不能单独进行工作是不行的"。王路宾还在省四級幹部会議上，袒护和支持反党分子前惠民地委代理第一書記李峰，說李峰反党反中央的言論"还是值得考虑的"，要大家对李峰批判"不要太尖銳了"，並与王卓如一起背着省委动員出席会議的幹部选举李峰、王月村参加大会主席团，違背省委对大会的領导意圖。

（三）散布修正主义观点，並与右派分子里应外合向党进攻。

王路宾借"思想解放"和"独立思考"的幌子，到处散布修正主义，为其反党活动开辟思想陣地。首先是从各方面極力設法歪曲党的原則，削弱乃至取消党的領导，他强調"要树立政府的領导"，"工、青、妇也可以說在政府領导下，作政府的助手"。甚至对民主人士說"党政是配合关系"，"中共不要以領导自居，中共支部和民主党派基層組織也是配合关系"，"先党内后党外今后要改变"，並在政协会上說党的"政治报告是形式主义"等等。王路宾对南斯拉夫的工人委員会很为贊揚，在討論中央关于調查工人阶級問題指示的試点工作中，他主张民主选举厂长。同时王路宾还極力散布"阶級斗爭熄灭論"，在市政协会上說"大規模的阶級斗爭已經过去""阶級斗爭已經基本結束、阶級矛盾已經基本消灭"，並在传达二中全会精神时說"当前最根本的問題是民主化的問題。"在市委直屬机关党員大会上說："反右斗爭也是人民内部矛盾"，要大家对右派分子在批判上"不能对人，而只是对其右派言行"，"有右派言論的人，不要消極，也要辯論"並說："可以循环不已的斗爭"，"进行反批評，反反批評"，"剝夺了政治权利的人也有言論自由"等等。此外，

王路宾还在政协会議上借动員整風鳴放，对党进行攻击。甚至歪曲說“过去粗風暴雨不仅在党外，党内也很厉害，一九四三年在延安整風我也被审查过”。他把公私共事和知識分子改造中的問題，說成是“党的領导要負主要責任”，“是由于我們严重脱离群众、清規戒律所致”，“政法部門与群众有沟有墙”，因此他一再号召“各民主党派、各界人士”大家一起来拆墙填沟，眞正做到“亲密无間”，而对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的言論，說成是“对我們帮助很大，使我們吃了一付清凉剂”，認为这是“监督”的必要性。甚至当历史特务、資产阶級右派分子吳介夫罵我們“素餐尸位”、並要共产党“清党”时，王路宾也不气憤，反說“批評的很尖銳，要虛心接受批評意見”。

王路宾还在一系列的問題上敌我不分，与極右分子李士劍、竹山、姜子修等人来往密切。李士劍原为省人委参事，在大鳴大放中恶毒向党进攻，把共产党員分为“三八式”与“胜利号”，污蔑积極分子和进步人士是“制造沟和墙的能手”，攻击“肃反运动是杀人不見血”等等。这篇“發言稿”是經过王路宾看过的，王既沒有批判李的錯誤，相反的还为李出主意說“發言可以，但要注意分寸”，直到李士劍被划为右派分子进行斗爭后，王路宾还三次接見与他談話。極右分子竹山在大鳴大放期間找王談話，王不但不拒絕，反而热情相待，在談話中，王从自己在延安整風时受审查的历史，暗示竹山要繼續堅持反动立場。对竹山在三反中的处理問題，則要市人委付市长向竹山道歉。並交待“如果解决不了再来找我”。当竹山把以他为首的反党集团所写的反动文章“爭鳴一个无人爭鳴的問題——随着社会主义的發展，阶級斗爭日益尖銳化的錯誤理論在我国的影响”大意告訴了王路宾时，王对这篇恶毒攻击伟大鎮反、三反运动的反动文章沒有回击，反說“可以研究，可以鳴”。極右分子姜子修与王路宾也很密切，在姜被斗爭以后，王路宾还三次接見、安慰他，並对姜許願說“以后沒大事作也有小事作”。对历史反革命分子沙延

祥，王路宾曾五次写信給公安局为沙提前恢复公民权和安排职业。

（四）拉攏宗派，培植私人势力，进行非組織活动。除上述在省級机关所进行的宗派反党活动外，王路宾在市里还与右派分子、前市委书記处书記张敎等人勾結在一起，培植私人势力，进行非組織活动。在一九五六年第一次省党代表大会上，王路宾即与张敎共謀修改了市委原准备的發言材料，全面的向省委进行了攻击，一九五七年省四級幹部会議上，王路宾又組織张敎"等省委負責同志到会后再發言"，結果张敎發言，並带領济南出席会議的整个小組百般挑剔舒同同志的传达报告，刮起了台風，反对省委貫徹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反击两股台風的指示。为了制造反党"資本"，王路宾还与右派分子张敎等人到处制造流言蜚語，互相吹捧。王路宾說张敎"年輕有为，有独立见解"，张敎对王路宾更感恩戴德極力吹捧說"王路宾水平高，对問題看的远，我們不行"，"王路宾来济南注意抓先进，工作有生气了""王路宾口快心直，开門見山，很好接近，和王路宾一起工作心情舒暢，不怕跟着他犯錯誤"等等。

根据以上事实，足以証明王路宾的錯誤不是一般性的錯誤，而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他繼承了向明大搞地方主义独立王国，阴謀实現个人主义野心的反党本質，以其右傾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对抗党的方針路綫和指示，任意歪曲和修正党的原则，以攻其一点尽量扩大和背后活动的手法，肆意攻击和污蔑省委直至中央，他不仅在党內拉攏宗派，而且發展到同党外右派分子里应外合向党进行攻击，进行反党活动。因此，王路宾是一个徹头徹尾的反党分子，是一个卑鄙的資产阶級个人主义野心家。他的反党錯誤是十分严重的，对党的事业所造成的危害也是很大的，同时，在检討过程中态度極不老实，在大量事实面前进行抵賴，因此市委意見将王路宾划为右派分子

中共济南市监察委員会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张毅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张毅（曾用名张同生），男，三十八岁，山东寿光县人，中农出身，学生成份，高中文化程度。一九三八年参加工作，同年入党。历任：宣传幹事、科长、部长、县委書記、分局組織部幹部处副处长、济南国棉一厂、机床二厂党委書記、市委工业部副部长、秘書长、書記处書記等职。

（一）张毅在市委工作期間，与王路宾一起搞地方主义，宗派主义，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極力攻击並企圖搞垮省委，实现其政治野心。

1.张毅早在济南机床二厂工作期間即对抗党的粮食政策，对抗市委領导，說："市委不懂工业生产"等，發展着地方主义傾向。自調来市委后，很快与王路宾合謀攻击省委。一九五六年六月省党代大会召开之前，张毅即多方搜集"材料"，並亲自主持过文教座談会，准备向省委攻击。党代会上，与王路宾擅自修改了市委准备的發言材料，有意減少市委的自我批評，夸大省委的缺点，全面地向省委进行了攻击。如对粮食工作，王路宾在原發言材料上加了"省委机械地执行了上級規定的定量标准"，张毅则接着加上了"不听取幹部和群众的呼声"等等。同时，张毅还假說"其他市、地委已提了很多意見"借以煽动济南出席会議的同志批評省委。並指示高子岩同志"把發言稿中的自我检討部分去掉，光提意見就行"。大会發言前，省委統战部陈梅川同志曾就自己的發言稿，向张毅征求意見，事后张毅說："陈的發言趁早

不要講，不受欢迎；現在受欢迎的只有两种發言：一是对省委提意見；一是省級各部門的检討”。回济南传达这次会議精神时，张毅又与王路宾同样歪曲夸大了省委的缺点、錯誤，在幹部中散布对省委的不满。

2.一九五七年二月，张毅对王路宾主持召开的否認两条道路的斗爭，与省委“比高低”的市委二月会議大加支持、贊揚；接着，在省委三月召开的县書会議上，与王路宾預謀公然抗拒省委貫徹中央和毛主席关于反击两股台風的指示，一再强調“台風要与一般思想問題分开”“要正确教育”，“不要唯成分論”。並从农业合作化等方面系統地攻击了舒同同志的报告，極力散布“省委三月会議不如市委二月会議开得好”的观点，誹謗“舒同同志不民主，主观主义。”

3.张毅搞地方主义的綱領与王路宾如出一轍。他經常說：“工作要大胆創造，独立思考，要全面分析，要稳妥，要敢頂，不管是誰，不管是那一級，有意見即提”，並以抗上为榮。一九五五年肃反开始，中央提出反右傾，张毅則說：“誰反右傾都反右傾就沒有一个敢出来頂一頂”。

4.在日常工作中，独搞一套，公然对抗省委和中央。如中等学校学生不参加鳴放的問題，中央和省委一再指示，而张毅却在中等学校会議上提出：“要独立思考，大胆創造一下”，並作了部署，以致造成一度混乱；而张毅反自詡为“这是貫徹中央鳴放精神的新發展”。再如中央和省委关于整頓文艺思想，文艺界进行整風的指示，张毅不叫向下传达，並部署下面不要学習陆定一和周揚同志关于整頓文艺思想的报告，也不要搞文艺思想問題；相反的却撥款叫吕剧团停演休整，准备外地演出，以扩大他搞地方主义的影响。

5.张毅搞地方主义、独立王国的思想也貫徹到基層单位，他去工人医院及中等学校检查工作时，公然要下边对上級业务部門的指示給“頂回去”。这与王路宾的热中权威，强調塊塊也是一

致的。

（二）在一系列的方針、政策、原則問題上，任意修正、歪曲、对抗中央和省委。

1.一九五五年肃反开始反右傾时，张毅就很不滿，在他主持的工业口肃反中一再强調："要稳一些，不要搞的象三反那样，把人家弄出神經病来"。对肃反、审幹及犯錯誤的幹部处理上，张毅也持有"无罪推定論"的观点，无原則的从輕，甚至不了了之。

2.反右斗爭开始后，张毅一再强調"要和風細雨"，"要保护右派过关"，"要接受肃反教訓，防止左的情緒，不要打击面太寬"，並交待下边反右斗爭的单位"不要搞得太紧张了"。中等学校反右斗爭刚开始，群众刚刚發动起来，张毅却馬上提出"停止反右，集中轉向整改"，並且以后一直再未部署反右，以致造成文教方面反右斗爭搞得極不徹底。对学生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論，张毅也强調"这是認識問題，不是政治問題，不要强調阶級立場和阶級分析"。

3.極力散布阶級斗爭熄灭論。张毅常說"合营后資产阶級与无产阶級的矛盾已經解决了"，"今后斗爭不是阶級斗爭了，而是人与自然的斗爭"，"資产阶級知識分子也是工人阶級的一部分"，"富裕中农已成了基本群众"，"地主、富农也开始入社了，沒有什么問題了"等等，極力模糊幹部的斗爭視綫。

4.宣揚資产阶級民主，反对党的民主集中制。张毅說："反对領导不一定是落后分子"，"党組織不要把党員控制过死。"对南斯拉夫的工人委員会等张毅也很感兴趣，並为之传播。在学校作报告时，张毅还曾說："資本主义可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我們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甚至还說："中央关于高、饒反党联盟問題，揭露的材料不具体"，实际上是在散布对中央处理高、饒問題不滿。

5.任意改变共青团的性質和任务。布置"团只搞学校，不要

搞工厂”，“团只搞文体活动，不要搞政治运动”。这实际上是补充了王路宾的“工、青、妇在政府的領导下，是政府的助手”的反动論点。

6.削弱和取消党的領导。在一次鳴放会議上，新生京剧团右派分子說：“文化局不管我們，党員不会領导剧团，我們要求自己管”，张毅竟拍案喝彩，說：“对！你們自己管。”对加强党的領导問題，张毅还在一次戏曲座談会上說：“你們就是領导，党派幹部不是办法，主要加强你們的領导作用”，並把党的領导說成是“加强对你們这些人的联系”。

7.对党的各项政策对抗不滿。如对农业合作化，說：“我对合作社有点不滿意。合作化以后就是減了产，牲畜也死了一些”；对資产阶級的贖买政策，說：“越錢多了越佔便宜！”他对粮食統購統銷、肃反等都曾散布过不滿的言論。

（三）同右派分子里应外合向党进攻，与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亲如一家。

1.省委三月会議上，张毅与王路宾共謀，全面地攻击省委反击两股“台風”，說舒同同志报告“主观”，反对阶級分析，反对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認为“只扣帽子不能解决問題”，“是执行方針政策上的問題，一概說成“台風”就容易压住不同的意見”等等。

2.省委五月会議上，右派分子猖狂地向党进攻，舒同同志一再动員张毅發言，反击右派捍衛党，张毅一言不發；相反的却积极鼓励和支持济南到会的区委宣传部长恶毒地向党进攻。

3.大鳴大放开始时，张毅到处煽風点火。在文教系統幹部大会上，动員大家“有苦訴苦”！甚至还骨恶毒地說：“对主席也可提意見！”

张毅还在几次文教系統座談会上說：“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党八股、扣帽子都存在，問題关鍵在于党委”；“我們党的員和群众之間既有墙又有沟，要拆墙填沟”，“党員高人一等，

为什么事都得我們說了算，这一点要改变”。

4.张毅为了鼓舞和支持右派向党进攻，把几个鳴放座談会上的右派言論說成是“批評的誠恳，动机良好”；对学校的右派分子攻击合作化和党的領导的大字报，到处說“批評得尖銳，一針見血，艺术性高”；为了替右派分子开脫，张毅还說：“駡共产党的不一定是右派”，“就是完全同意儲安平的言論，也不打你的右派”。

5.据会議揭發並已查明，张毅不仅包庇右派分子黄富元（原天桥区委工业部长）、晓晽（原党校教研室主任）、王秋岩（机器制造学校校长）及叛党自首分子王仲敏（原二厂秘書科长），而且与反革命分子周重光（张的老师）、右派分子曹繼昌（小学教师）等人的关系也是極为密切的，称兄道弟，餽贈祁物，視如亲人。张毅早在抗日战爭时期，他在淮北工作时，即与地主往来吃喝受贈，关系密切。反革命分子赵温畏罪自杀后张毅說“看今天的情况是死不了的”。右派分子刘建自杀后他也問别人“刘建有沒有怨言”。

（四）与王路宾共謀进行地方主义反党活动，培植个人势力，企圖实現自己的政治野心。

首先张毅参与王路宾的反党活动是完全自覚並有个人野心的。早在张毅被提拔为書記处書記时，对王路宾即感恩戴德，他从卑鄙的資产阶級个人主义野心出發，不仅积極参加了王路宾在济南組織的反党活动，並且充当了王路宾攻击省委的主将。一九五六年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王、张即共謀向党进攻；在省委三月会議上，又共謀“等省委負責同志到会再發言”，对舒同同志报告进行了全面的攻击。当市委批評后，又共謀假检討作戏給省委看。直到上次常委检查时还互相包庇，圖謀把检查重点轉移到其他常委身上去。未得逞时，又共謀說“检查的差不多了，可以推下去”，企圖蒙混过关。

张毅为了逢迎和效忠王路宾的反党活动，到处散布：“王路

宾大胆、敢干、工作有朝气，民主作風好"，"我和王路宾一起工作心情舒暢，不怕跟王路宾犯錯誤"，而王路宾則吹噓张毅"年輕有为，有独立見解"，有意多予分管組織、宣传及区委全面工作，並且計划要张毅作市长。张毅更肆无忌憚地对各部門宣布："市委書記处除王路宾和我外，其他同志身体都不好，作为第一書記不宜分工太多，我可以多分一些"，企圖破坏市委的集体領导，攫取更大的权力。

张毅还利用前在二厂工作的关系，积極为王路宾推荐了苗丰羽（前市委委員、柴油机厂党委書記）和张鑑修（前二厂厂长）結成以王路宾为首的反党联盟。苗丰羽是混入党內的右派分子，据已查明，苗在省委、市委召开的几次重要会議上攻击党的言論，都是王路宾授意的。当苗丰羽的反党本質在市三級幹部会議上进一步暴露后，王路宾还說是"認識上有片面性"。张毅更背着市委与张鑑修、苗丰羽等密开小会，並盗用市委名义宣布"苗沒有什么了不起的問題"，多方为苗开脫。张毅調化肥厂后，又曾与苗丰羽、张鑑修等一起策划幹部。在这次检查他們的問題之前，又互相訂立攻守同盟，說"一人錯誤一人当""不牵联别人"。张鑑修也是一个一貫攻击党、污蔑党的領袖、包庇坏分子的党內右派分子，但张毅对他却極为器重，曾推荐安排他作市計委主任，甚至作副市长。张鑑修、苗丰羽則吹噓张毅"英明果断，領导有方"百般向张献媚。

綜上所述，我們認为张毅的資产阶級个人主义思想和右傾机会主义观点是極其严重的，他从自己卑鄙的資产阶級个人主义野心出發，已發展到抗拒党的領导，与資产阶級右派分子里应外合向党进攻，在政治上已堕落为資产阶級右派；在組織上，张毅积極参与王路宾的地方主义反党活动，充当主将，攻击省委，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成为党的叛徒。

經市委决定，省委常委会批准撤銷张毅的一切职务，开除其党籍，工資由11級降到16級，分配到历城唐庐煤矿任副矿长。

中共济南市委监察委員会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丛林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日）

丛林（曾用名苏省三、李志誠、周爱华），男，四十三岁，江苏省沛县人。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学生。高中文化程度。一九三〇年入党，一九三八年参加工作。历任支部書記、区委書記、政治交通員、总务科长、枣庄矿委組織部长、書記、济南市委幹部科长、山东分局幹部处长、济南柴油机厂总支書記、市委紀律检查委員会副書記、市委書記处書記兼监委書記、济南国棉一厂党委書記。

主要錯誤事实

一、长期对党不滿，拉攏宗派，攻击中央和省委，进行反党活动。丛林从資产阶級的个人名利地位出發，对中央和省委在幹部配置上極力进行攻击，誣蔑党的幹部政策"宗派主义"，到处散布对省委某些部委負責同志的任职不滿。並拉攏过去曾在一起工作的右派分子张宗印，对党进行誣蔑、誹謗，說"山东党内斗爭太复杂，誰上台誰正确，捞着就要命"等等，在张宗印被揭露批判后，丛林又要他"不要害怕，要沉住气"，並出主意为这个右派分子設法躲避斗爭。丛林还对其他反党分子表示同情和支持。从这种反党立場出發，丛林借参加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机会，对省委和中央負責同志进行了一系列的攻击。他同情支持当时会議上所刮起的反"冒进"的台風。並夸大省委的缺点錯誤，抓住非正常死亡問題誹謗省委"自我批評不够"，並誣蔑中央負責

同志的正确指示是"挡省委的責任""为省委开脫"。他極力攻击省委"不民主"，为向明反党集团賊寃招魂。对在支持向明反党活动中犯有严重錯誤的人在党代大会上落选不滿，拒不参加討論候选人的会議，並与反党分子张毅串連要"向上反映"，破坏省党代表大会的选举。对这次会議的成就，丛林極力否定，他反对代表大会所作的这次会議"是成功的大会、团結的大会"的正确結論，並在传达大会的精神时歪曲省委的工作报告，进一步向省委进行攻击。

二、在大鳴大放中与右派分子共鳴，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論，在若干重大方針政策問題上否定党的成績，攻击党的領导。丛林極力貶低合作化的优越性，說"組織起来的合作社沒有什么好处，很好的树砍了，地荒了"，"合作社增产报紙上登的是标本就是了"。甚至在动員家屬还乡中恶毒地說："农村沒有粮食吃，回家吃麦苗"。丛林还誣蔑和破坏生产大跃进，說"黑天当白天，月亮当太阳"等跃进口号"不是群众中来的，是基層幹部搞的"。他还散布說"山东农村發生了强迫命令，正月初一、二就叫群众去打井，出了废品，沒有水，不能用"。这都充分証明丛林站在資产阶級立場上，百般抗拒和破坏党在农村中的社会主义改造政策。对党內民主生活及政治运动，丛林同样歪曲誣蔑，說現在"什么思想见面，連两口子都不能說真心話"，並誣蔑党的幹部"越老越老奸巨滑"。特别是对三反，丛林極力否定运动的偉大成績，誣蔑山东三反运动是"残酷的"，說"工业厅有百分之九十的案件有問題"等等，表現了对党的政治运动的極端仇視。

三、对抗上級指示，工作中犯有一系列的严重右傾机会主义的錯誤。丛林分管党的监察工作，他从右傾机会主义观点出發，片面强調所謂"进行教育""要多听取反面意见"。在处理案件中他无原則的从寬，甚至对許多应处理的案件不作处理。反之，对許多申訴案件，則不經調查研究，首先肯定其申訴理由，百般

之辯护，並为犯罪者开脱罪責，以致縱容不少犯罪分子，废弛了党的紀律。

四、政治上消極頹废，思想蛻化变質。丛林背着老資格包袱，向党鬧地位鬧待遇，得不到滿足时，长期对党不滿，工作消極，不动脑子，不負責任。並对自己的錯誤拒不改正，忌恨和仇視党对他的正确批評，完全丧失了革命意志。

通过以上事实，可以明显的看出，丛林的錯誤不是一般性的錯誤，而是大是大非問題，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他已經完全墮落成为党內的右派分子，对党和人民是有罪的；但是他对自己的問題所採取的态度是十分錯誤的恶劣的，党和同志們尽了極大的努力来教育、等待他的覚悟，而他却一直拒絕党对他的批評教育，不作徹底的检查交待，向党和人民低头認罪，繼續堅持錯誤，沒有悔改的誠意。为了維护党的紀律，純潔党的队伍，市委决定經省委常委会議批准撤銷丛林的一切职务，开除其党籍，按中央关于处理右派分子第四条規定处理，降五級，分配到市中医院任副院长。

中共济南市委监察委員会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张成傑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九年八月四日）

张成傑，男，现年三十五岁，山东省平原县人，家庭出身中农，个人成份学生，一九四〇年八月参加工作，一九四一年入党。历任区財政助理、区委書記、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县委副書記、書記、济南机床二厂党委書記。现任市委工业部长、市委委員。

主要錯誤事实

（一）积極参加王路宾、张毅为首的反党活动。

1、张成傑早在机床二厂工作时即与张毅、张鑑修等發展着地方主义傾向，以抗上为荣，当时有“二厂大門难进”的反映，他自一九五五年来市委工业部工作后即与王路宾、张毅的反党地方主义驪溷在一起，一唱一合，向党进攻。一九五六年中央和省委指示在工厂中废除一长制，实行党委領导下的厂长負責制。王路宾强調济南地区一长制未形成，张成傑則說“推行了但推的比較浅，从現在情况来看，一般是集体領导下的厂长負責制”，因而这一指示在济南未貫徹执行。在一九五七年省委召开的三月会議上，王路宾、张毅抗拒中央和省委关于反击两股台風的指示，而张成傑对为工資問題刮台風的苗丰羽、张鑑修採取縱容支持的态度。

2、背着組織进行非法活动。

（1）在市第一次党代会期間，张成傑到张毅宿舍共謀提苗丰羽、张鑑修为市委委員（当时张毅是市委秘書长，未分管大会的組織工作）。

（2）王路宾、张毅私議要张鑑修任計委主任，张成傑就告訴了张鑑修。张成傑調市委工业部未公布之前，张毅即告訴了张成傑。张毅要任市委秘書长、書記处書記，张成傑也事先告訴了张鑑修。张成傑在部内經常吹嘘“王路宾来济南三年，济南工作进步很大，王路宾有魄力、有辦[illegible]，[illegible]工业部工作很滿意，别的部不行”。“[illegible]精神强[illegible]，[illegible]作用，[illegible]会工作又会休息”，王路宾說：“张成傑[illegible]，[illegible]很好。”一九五六年春节时张毅曾举办宴会，邀請张成傑、[illegible]、张鑑修等人拜年、談心。

3、张成傑在市委工业部传达省第一次党代会精神时对省委作了攻击，他說：“这次省党代会体現了党的团結，但也有不团

結的因素。关于农业合作化問題，主席提出来我們接受不快，后来进入高級社又缺乏領导。兴修水利投資过大，要求过高。会議准备不好，有些發揚民主不够……”等等。

（二）对抗省委，欺騙組織，企圖达到个人野心。

1、张成傑在工作中一貫与省委工业部相对抗。如：关于領导制度的貫徹，省委工业部要在汽車制造厂搞試点，而张成傑則在机車修理厂搞点；一九五六年张成傑在济南柴油机厂搞点，省委徐雷健同志任組长，张成傑經常与徐雷健同志唱对台戏；一九五七年十二月济南第一机床厂处理二百三十名学員回乡生产，省委工业部指示“这样处理不合适，应立即停下来”，市委也两次指示要停下来，但张成傑不加理睬，直至将学員处理完了，反而欺上瞞下說：“听到指示后立即停下来了”。

2、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张成傑在二厂任党委副書記时，省委派賴可可同志任二厂党委書記，賴可可同志到厂前的三天，张召开幹部会議說：“賴可可原来是分局書記，是犯了錯誤来厂的，他对的要学習，不对的不应向他学習。”在工作中张成傑对賴可可同志是不尊重的，工作不放手，經常刁难。当省委要賴可可同志在厂的表现时，张成傑与张鑑修等共同签名写了一份假材料，把賴可可同志的缺点大加宣染，說“賴可可对反向明的态度不明确”，“給我們的印象是他犯了盲目維护領导的錯誤”，“上了当”，“他对向明及他自己的錯誤未曾提过反党二字……”。

3、张成傑在工业部內对幹部的任用是任人唯亲，排除異己。如对韓紹群等同志是仇視排斥，整編时将他們下放；而对右派分子馬守法、王崇周等人則重用包庇。

（三）有意識的重用包庇右派分子和坏分子。

1、包庇右派分子苗丰羽。在市三級幹部会議期間，苗丰羽惡毒攻击市委，但他不向常委回报，当工业組要对苗丰羽展开辯論时，张成傑則假传市委指示說：“市委認为苗沒有什么突出問題”。当大会按問題排队将苗划为第一类提交工业組討論时，张

仍提出“苗划一类太重，不合适”，要秘書按二、三类另行整理材料。

2、右派分子王崇周，历史上幹过伪軍，品質不好，张成傑則極为重用，整風开始即吸收为整風領导小組成員，王在鳴放中發表一系列的反党言論，部內要求对王展开辯論，而张成傑則为其辯护說：“王的言論是一般思想認識問題”，在研究定王为右派时，张成傑坚持說王不够右派（已定为右派，按四类处理）。

3、馬守法調工业部后，张成傑極为重用，主张提为巡視員（这时幹部已經停止提拔），並亲自五次跑組織部坚持提馬为巡視員。在馬提拔之前，张成傑曾两次对馬守法說：“市委已批准了，不过有的同志对你有些意見……”。鳴放中馬守法有反党言論，张成傑認为是內部問題，可放在第四阶段解决（現已定为右派分子）。

4、原工业部秘書部守文，有反党言論，整編中下放鉄路大厂工作，在市三級幹部会議期間，张将部調来工业大組任秘書，大会秘書处及組織部都不同意，张成傑說：“不是什么大問題，不要計較小事”，坚持部可以作秘書（現划为右派）。

以上事实說明，张成傑已成为党內的右派分子，其主要錯誤是地方主义、右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在幹部政策上是任人唯亲，丧失立場，包庇右派。經市委常委研究，报省委批准，开除共党籍，撤消原有职务，另行分配待遇較低的工作，工資由十二級降为十七級。

中共济南市委监察委員会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段德甫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二日）

段德甫，男，四十六岁，家庭出身貧农，本人成份工人，山东沂南县人，一九三八年参加工作，同年入党。历任：支部書記、区委書記、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县委書記、专区合作分社主任、沂水专署专員、山东造紙厂厂长、党委常委、济南市委委員。

主要反动言行

1、反对党的領导，反对实行党委領导下的厂长負責制。党委討論职工代表大会常任制时他說："婆婆太多，事情难办。"把党的决定厂长执行的問題，說成是"党委是唱花旦的，我是唱黑头的"，並揚言不唱黑头了。党委决定提拔幹部时段未参加，事后征求段的意見，他說我不願作这个傀垒，拒不签名。他在党委会上很少發言，常說您决議吧，决議了我就执行，但会后又表示不滿，說会議开的不好。

2、包庇右派分子，給右派分子出主意想办法。党委决定将崔玉亭划为右派分子，他在党的小組会上說："市委沒有指示，右派分子是資产阶級右派，反右派是在知識分子中，在工厂有无右派？別左了，应愼重，有言論、有行动、有綱領才是右派，崔玉亭是老工人提拔的，是工人阶級內部的問題，崔是否右派，还是右派情緒。"

党委决定由段德甫主持会議斗爭右派分子崔玉亭时，他很不

严肃。第三次斗爭催时，自动退出会場，会后对崔玉亭出主意說：“坦白要实事求是，不通到市委、省委、中央去告，总有貫理的地方”。致使右派分子长期顽抗，不低头認罪。

段德甫的錯誤，主要是由卑鄙的資产阶級个人主义出發，不要党的領导，对党委进行攻击，以致發展到包庇右派，支持右派向党进攻，成为党內的右派分子。經过揭發批判，作了检討，表示願意悔改。經市委常委研究，並报省委整風領导小組批准，給予开除党籍，降职、降級、降薪的处分（工資降两級），分配到济南造紙厂任副厂长。

中共济南市委监察委員会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苗丰羽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苗丰羽，男，现年三十二岁，山东威海人，家庭出身貧农，本人成份工人，一九四五年入伍，一九四六年入党。历任战士、区委組織幹事、指导員、机关总支書記、济南机床二厂总支副书記、柴油机厂党委副书記、书記，济南市委委員，山东省党代表。

主要反党言行

一、苗丰羽是王路宾反党集团的主将，在省委召开的会議上和王路宾、张毅一唱一合，向党进攻。

（一）一九五七年省三月会議上攻击說：“省委对党內情況分析客观性差，对正面的东西分析不够，反面的东西显得过多，举例中說济南四十个单位鬧工資問題，与当前情况不符，批評要

公正合理”。挑剔省委报告对党内思想情况估計客观性差。“……很大进步，很大提高……，講的不具体，下达到基層会产生天下老鸦一般黑。”又說“从正面的党的事业的發展中看思想問題是需要的，越是分析的客观原則更易搞通思想，說市委2月扩大会議对这方面的分析还是客观的。”

（二）苗在一九五七年五月市党代大会上發言散布修正主义观点說：“全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阶級斗爭已經基本結束，阶級矛盾已經基本消灭”。“旧的工作作風。工作方法不能适应新形势和新任务的要求，缺乏民主的管理制度，这是企业目前民主生活不正常的主要原因，也是發生鬧事的主要原因等等”。

（三）一九五七年十一月省四級幹部会上，放出了一系列的毒箭，說“省委检討不深刻，如死人的問題检討不深刻，山东向明在此就死人，当是有片面性，社会主义辯論又死二百多人，大运动小运动就死人，对山东的情况分析不够，存在片面性……。”

二、攻击肃反、鎮反、反右等各項工作。

1、对肃反工作他發言說“是搞好了呢？还是搞坏了呢？我不明确，但是从我們几个大厂的情况看，很难符合中央指示的精神，按前后的情况，錯誤是主要的。”並举例說“我厂抓了九个，放了七个……。”他还攻击一九五五年社会鎮反，开始工作很粗，政策界限不清，並說九个人中只有一个人可捕可不捕的捕了，复查时政法部門大放特放，上下口径不一致，这样把敌人界限混淆了”。苗丰羽对肃反运动是不积极的，身为第一書記却很少过問肃反的情况。

2、在反右斗爭中他对右派分子同情姑息。右派分子韓从径恶毒地向党进攻，苗丰羽对这些反党言論，不但不加批駁，反而大加贊揚，說發言很有分寸等，当同志們組織反击时，苗丰羽反說是沉不住气，脑子有点發热。在研究确定右派分子时，苗丰羽和王路宾是一致的，他主张“可划可不划的应掌握不划为右

派”。由于苗丰羽的縱容、支持不少右派分子对苗有好感，如右派分子张用晦說“自苗書記来了党委有了两点論，能多方面吸取意见……”。

苗丰羽的右傾是一貫的，历次运动都是算賬派，他曾不止一次地說“柴油机厂的历次运动都是左的，死了些人，再这样下去就要犯錯誤，要算老賬的話你們就吃不消了。”刑事犯罪分子张执恕，工作有点成績，苗就在大小会上当“典型”例子，汽車司机侯在江的流氓行为苗丰羽明明知道置之不理。

三、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对党的方針政策进行恶毒攻击。

1、攻击粮食政策說“市委領导上群众观念差，群众向我們要粮食吃，不要餓他們的肚子，我們多次向市委反映，但是市委沒有很好的考虑。”

2、攻击农业合作化說“一九五六年春天农田水利打井运动太冒进了，省委有强迫命令作風，打出来的井有百分之八十报废”，又說“农业合作化后，农村活牛不如死牛皮值錢，一个小牛只卖五角錢，一张死牛皮就是几十元”。

3、攻击市委对工业領导和城市建設方針。他說“市委对工业的領导呼呼隆隆的作法，拿个象样的經驗不多，学習外地經驗也不够，不如董高时劲头大、活跃。”說“市委对城市规划以什么为中心不明确，修馬路、盖大楼倒占的不少”。二三四厂和山东化工厂合併后，苗丰羽說“市里逼着二三四厂上吊，又逼死了一个工厂。”

4、对工資政策苗丰羽也进行了攻击。苗对中央这些指示不满，在市委召开党委書記研究工資問題的会議上說：“讓發表自由思想嗎，不能沒有意見……”。

此外，苗丰羽和王路宾、张毅、张鑑修拉拉扯扯，互相吹捧。苗常說“路宾同志是大学生，但一点知識分子架子也沒有……”“张毅革命早水平高……。”而王路宾、张毅也常說苗丰羽精幹、年青有为。苗丰羽攻击省委时，王路宾說“看問题尖

銳、明确”。

苗丰羽自由主义也非常严重，散布流言蜚語，污蔑党的領袖。

苗丰羽平素一貫狂妄自大，个人突出目中无人，特别当选了市委委員以后更加突出，对上不尊重、不謙逊，对同級瞧不起，不信任，对下級不以平等待人。認为自己了不起，别人都不行，只有自己正确，对别人总是不滿意，常講：我最苦悶的是集体領导問題（意思是委員不起作用）。

苗丰羽的錯誤是大是大非問題，他在省委召开的会議上，积極向省委进攻，是王路宾反党的主将，他攻击了党的各項政策，和王路宾、张毅等人拉拉扯扯进行反党活动，是党內的右派，經市委常委研究决定，省委批准，开除党籍，撤銷原有职务，另行分配待遇較低的工作，工資降四級。

中共济南市委监察委員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王斌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王斌，男，現年四十八岁，山东省寿光县人，中农出身（其祖父、父亲时系地主），本人成份农民，一九三七年当过土匪，一九三八年入伍，同年入党。历任战士、班长、排长、公安处审訊幹事、股长、县公安局长、县长，省法院处长等职。現任济南市中級法院院长，济南市委委員。

主要反动言行

1、反对党的領导，拒不执行党与上級的指示决議，向党鬧

独立与党分庭抗礼，将法院看成自己的独立王国。一九五四年市委政法党組决定处十五年以上徒刑的案件，报市委批准，王斌拒不执行，市委發現后进行了批評，仍不执行。市委指示法院依法沒收反革命分子牛会卿的医院財产，王斌借口个别与牛同案犯逃亡台灣，为分化瓦解敌人而拒不执行。市委指示对法院幹部中的“不告不理”的旧法观点进行批判，王斌强調宪法、法院組織法已公布了，法院做察不合法，而不执行。王斌不仅反对党的領导，而且也不接受市人委与上級业务部門的領导与监督。王斌对省法院改判济南市的案件，極为不滿，並指示幹部“今后省發回的案件不要宣判，我看后再說，不行給他頂回去”。省法院为与王斌統一案件的認識，叫他去省他不去，找他不理采。並对法院的幹部說：“不用听他們当当。”說法院与市人委是附属关系，可以自由服从。

2、否定鎮反运动的成績，王斌一九五六年参加全国司法工作会議时积極散布“鎮反工作缺点錯誤是严重的”，回济南积極向預审处法院搜集錯案数字，並說鎮反工作的錯誤“天下烏鴉一般黑，各地錯案都不少，中央对自称沒有錯案的地区都批了”。王斌为了抹煞一九五五年鎮反运动的成績，在一九五六年組成的案件检查小組的成員中不讓具体参加鎮反办案人員参加。而将一些有严重右傾和有历史問題的作为检查組的成員，五人中即有右派分子三人，政治可疑分子一人。王斌並为敌人着想說：“多判一年刑就是三百六十天。”以“重刑輕判，輕刑免判”的办法放掉了一批不应輕判而輕判，不应释放而释放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

王斌在实际工作中貫徹执行了“独立审判”“有利被告論”的旧法观点，極力为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开脫或減輕罪責。如市中区法院向王斌彙报貪污犯李景春材料后，王斌主張判三年徒刑，区法院說区委意見判緩刑需要区委决定时，王斌說：“党委有紀律，法院有法律，应依法办事。”历史反革命胡

章解放后混入我工厂进行破坏，王斌却以周不是以反革命为目的，将周无罪释解，並指示柴油机厂复职补薪。再如反革命分子李德学系敌人少校，曾指揮爆炸我司令員許世友同志，因地址弄錯而炸了通訊連，並捕过我民兵、情报員。解放后隐瞞了反革命历史混入我軍。王斌强調李是一等荣軍而无罪释放。王斌从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八年五月这一时期，据已查清重刑輕判，輕刑释放的即达八人。王斌的这种荒謬主张充分証明他完全站在敌对阶阶的立場上，不去鎮压敌人懲罰罪犯，保护人民，而是完全相反，保护敌人，寬容罪犯，打击人民。

3、王斌在提拔任用幹部上，敌我不分，認敌为友。市委一九五六年决定市人委副科长級幹部批准权限由各党組决定后，王斌从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八年亲手提拔起来的幹部中，現已查明反革命一人，刑事犯一人，政治嫌疑和其他問題九人，佔新提拔幹部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如蔣兆禧（現为右派）任过伪职，王斌提蔣任秘書，市委組織部不同意，叫他作文牍秘書，后拉进党內，整風鳴放蔣發表右派言論以后，王斌还将蔣拉进了整風領导小組。在工資改革中，王斌对这些人均提了級，甚至有的提两級，当群众提出反对意見时，王斌解释說，法院知識分子逮的逮了，审查的审了，就剩这几个，应該照顧，市人委也同意等等。

此外，在整風运动中包庇右派。如右派分子蔣兆禧到处煽風点火，大肆放毒，李誠同志向王斌彙报蔣的情况时，王斌說蔣不是右派分子。群众对右派分子李繼成进行揭發批評时，王斌带李到市人代会去作記录，使李逃避了群众的斗爭。

上述材料說明：王斌已是一个徹头徹尾的資产阶級在党內的代理人，是党內右派，經过斗爭批判，基本上認識了錯誤，作了检討，並且有悔改表現。經市委研究决定、省委整風領导小組批准，开除党籍，撤消院长职务，分配到萊蕪鉄厂任車間副主任，工資降五級。

中共菏澤地委会議（扩大）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屈国华、杜湘、王魯光、褚速捷党籍的决議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三日）

中共山东省菏澤地委扩大会議，徹底揭露了屈国华（地委副書記兼专員）、杜湘（地委常委委員、宣传部長）王魯光（地委常委委員、財貿部長）、褚速捷（地委委員、宣传部付部長），申云璞（地委委員、单县县委第一書記）等人的右派反党集团。这个右派反党集团的罪行是極为严重的。从一九五五年省委檢查菏澤地委領导之后，这个右派反党集团就逐步形成發展起来，他們的反党不仅有完整的綱領，而且是有組織有計划有目的的，长期以来，他們阴謀把菏澤地区作为他們的独立王国，反对中央与省委的方針政策。

·根据会議揭發：屈国华是这个右派反党集团的为首分子。他同他的爪牙，利用职权，力圖篡夺党的領导权，进行分裂党的罪惡活动，企圖以資产阶級的面貌来改造党。他們到处污蔑："省委把菏澤地区的黑暗面看大了"，"省委歧視菏澤地区"，"菏澤地区的幹部在省里吃不开"，"菏澤地区是晚娘"，他們打着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旗帜，悪毒地攻击省委派来的菏澤地委第一書記楊發、第二書記狄生两同志，以此籠絡有地方主义情緒的人和他們一起进行反党活动。远在一九五五年，省委根据中央指示，在山东全党肃清向明富农路綫影响的时候，屈国华就以"菏澤受向明影响不大"为借口，拒絕执行省委的指示，並狂妄地說："省

委肃清向明影响”的作法“未必英明”。企圖否定肃清向明影响的必要性与正确性，以掩盖他們的反党罪行。

一九五五年夏，省委为了繼續肃清向明影响，曾派人帮助地委检查，以一九五四年菏澤地区在粮食工作中违背了中央关于“余粮多者多購、余粮少者少購、不余者不購、缺粮者供应”的粮食政策，以及各級幹部在工作中的命令主义、违法乱紀为重点，批評了地委領导上的缺点錯誤。扈国华当时公开承認了錯誤，並表示决心改正。地委检查領导之后，扈国华則背地散布不滿情緒，到处造謠中伤歪曲事实，說：“菏澤地区在粮食工作中所以犯了錯誤是由于省委分配的任务大造成的”，污蔑省委把“菏澤地区看成一团糟”，“以命令主义糾正强迫命令”，“你們（指省委）都是正确的，我們都是烏龟王八蛋”，企圖否定省委关于检查菏澤地委領导的必要性与正确性。更严重的是暗地里發动与支持在粮食工作中犯过錯誤受到处分的人向中央告状，企圖翻案。

扈国华还在許多重大問題上，一貫违抗中央、省委的方針政策。一九五五年鎮压反革命的时候，地委根据中央、省委的指示，决定依法逮捕一批罪恶严重的反革命分子，扈国华認为“菏澤地区几次鎮反已处理了不少，沒有那么多反革命了”，“捕人容易，捕錯了放的时候困难，捕一个得罪几个”。杜湘說：“鎮反不徹底，永远也不会徹底，鎮压一批只是少了一批”。扈国华对肃反工作不积極，中央曾指示在清理中層时，有問題的人仍可斗爭，但他拒不执行，並私自确定一律免予斗爭。据初步查証有五名反革命分子应該处理，在扈的掩护下沒有进行处理。一九五六年省委貫徹中央关于改造落后乡指示时，扈国华借口落后乡的面划的太大了，抗拒执行，說：“这个地区如果落后，过去抗日战爭，解放战爭的胜利就无法解释”。当改造落后乡的工作展开之后，扈国华則蓄意找岔子，到处寻找“石头”搜集材料，並以个人的名义給省委写报告，污蔑改造落后乡工作搞坏了。在整頓

基层組織的时候，扈国华說："楊毅同志看的黑暗面太大了，处理的面太宽了"，"要使违法乱紀灭种还得很长时間"。杜湘說："什么叫不純，給敌人抗过几年槍，我們来了又跟我們幹，这叫不叫不純，要純，除非这一代的人死淨了，下一辈才能純"！王鲁光則說："楊毅同志看的黑暗面大，未解决依靠誰的問題"。这实际上是站在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的立場上替他們辯护，企圖保护他們繼續統治劳动人民。

省委派楊毅同志来菏澤地委任第一書記，狄生同志任付書記后，扈国华即百般刁难，处处制造困难。楊毅同志刚来时，扈国华不理，后来只以二十分鐘的时間介紹了菏澤地区的情况。在工作中不仅不积極支持楊毅同志，反而背后破坏楊毅同志的威信，到处散布"楊毅同志看菏澤地区的黑暗面大了"。並狂妄的說"一个比一个，他不中"。更严重的是无中生有的到处污蔑楊毅同志。企圖把楊毅同志排挤出去，篡夺党的領导权。

扈国华为施展他的反党阴謀，还运用了剝削阶級的那套权术。一貫採用两面手法，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甚至到处自吹自擂，夸耀个人。更毒辣的是他打着馬列主义的旗子来反对党。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之后，他以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为幌子公开的向党进攻。扈国华到中央高級党校学習时，一面捏造事实向中央监委会控告省委，一面背着省委写信污蔑地委領导上不民主，恶毒地攻击楊毅同志，並要地委将他的来信印給地委科长以上幹部閱讀，实际上是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企圖以此煽动群众把楊毅同志赶走。扈国华的反党集团还經常借喝酒为名，借以拉攏进行反党。有一次在喝酒期間，扈国华污蔑省委对菏澤的看法是"意識决定存在"，褚連捷即說："人家說是个碗，就是个碗么"！他們还时常互相包庇相互捧揚，掩护他們的反党罪行。

这个反党集团的罪恶活动，省委、地委早就有所察覺，並曾多次对他們进行教育，他們不但不悔悔，反而更变本加厉向

党攻击。在整風中他們又互通情报，互相串連，煽風点火与党內右派分子結合起来繼續恶毒地攻击省委，当他們的反党罪行被揭發之后，扈国华則运用威胁手段阻止鳴放。他还多方設法包庇右派分子，阻碍反右派斗爭的順利开展。实际上成了右派分子的后台老板。

杜湘、王魯光、褚連捷，除上面已說到的那些事实之外，会議还揭發了他們的許多罪行。杜湘、王魯光是扈国华右派反党集团的骨幹分子，王魯光又是腐化墮落蛻化变質的分子。很多同志在揭發中認为，这个反党集团中扈国华是挂帅的，王魯光是軍师。杜湘不仅是扈国华反党的幹将，而且他所領导的宣传部，实际上变成了向党进攻的一个堡垒。褚連捷不仅是反党集团中的炮手，而且在整風中散布了一系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謬論。

会議着重指出：以扈国华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处心积極地进行反党的阴謀活动，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的社会的根源。

我們党正处在社会主义革命，阶級力量重新配置的大变动的时期，資本主义生产資料所有制，虽然基本被消灭了，但人們的思想状况还沒有轉变过来，資产阶級政治观点、資产阶級世界观和資产阶級思想，仍然在許多人的头脑中存在着，这就必然引起无产阶級和資产阶級思想之間的尖銳斗爭。这种斗爭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內来。特別当着社会主义革命深入發展，阶級斗爭激化的时候，党內的这种斗爭也就激化起来。扈国华的反党活动，正是随着阶級斗爭形势的發展，逐步加紧，逐步囂张，逐步疯狂起来。由此，也就赤裸裸的暴露了他們的反动面目。

同时，会議指出：扈国华、杜湘、王魯光、褚連捷、申云璞都是極端的資产阶級个人主义者。他們都有强烈的个人野心，他們所向往的，孜孜以求的，正是資产阶級的名誉、地位、待遇，个人利益高于一切。扈国华是个典型的热中权位的野心家，当他爬上領导崗位的时候，个人主义的私心也随之增长起来，把自己

領导的地区看成独立的小天下，認为自己有“功劳”，于是驕傲起來了，企岡永远保持自己的荣誉、地位和权力。但是当他个人野心达不到目的时，就由对党不滿，發展到仇恨党，与党对立，在党內拉拉扯扯，發展宗派主义活动，最后蛻化变質，走上反党的道路。杜湘、王魯光积極支持虘国华的反党活动，正是从利已主义出發。正由于他們立場上和思想上的一致，很自然地勾結起来，搞宗派活动，組成反党集团。

会議一致認为：虘国华、杜湘、王魯光、褚連捷是一伙不堪改造的資产阶級在党內的代理人。虘国华是反党集团的首脑，罪孼深重，是党內的極右派分子。杜湘、王魯光、褚連捷、申云璞是反党集团的骨幹分子，是党內的極右派。大会一致决議：开除虘国华、杜湘、王魯光、褚連捷党籍，撤銷党內外一切职务。（申云璞在单县忠实的执行了虘国华的反党綱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極右派分子，单县党代表大会上已决定开除其党籍）。

会議一致指出：徹底粉碎以虘国华为首的反党集团，是我們党內两条道路斗爭的重大胜利。为了巩固荷澤地方党組織在中央和省委領导下的团結和統一，增强党的战斗力，各級党組織和全体党員，应当認真記取的教訓是：

必須加强党的团結，提高政治警惕，反对一切分裂党的阴謀活动。目前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两条道路的斗爭仍然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阶級斗爭仍然存在。我們与虘国华反党集团的斗爭，就是阶級斗爭在我們党內的反映。我們的敌人一定要千方百計地寻找各种机会在我們党內来制造分裂，制造反党的派别活动，因此，我們必須随时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提高政治嗅觉，反对那些别有用心的家伙。

为了維护党的統一和团結，必須加强党的紀律，健全党的民主生活，經常开展批評与自我批評，虛心接受群众的批評和监督。坚决制止对批評者打击报复的行为。

必須坚决反对地方主义、自由主义，坚决地执行中央和省委

的指示和决議。每个党員必須認真学習党的方針、政策，不断提高自己的政策水平。反对擅自修改党的政策的无組織无紀律的分散主义現象。

必須堅决反对資产阶級个人主义，会議中揭露的事实証明：右派分子都是一些極端严重的資产阶級个人主义者。个人主义是万恶的根源。因此，要經常以共产主义、集体主义的思想教育全体党員，經常警惕資产阶級个人主义思想的侵袭，坚定革命意志，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反对鬧地位、鬧名誉、鬧待遇的行为。

必須努力学習馬克思列宁主义，学習辯証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提高政治理論水平，运用馬克思主义的立場、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問題，处理問題，从而克服一切資产阶級的立場、观点，反对各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謬論，捍衛馬克思列宁主义。克服工作中主观主义，只見树木，不見森林，只看現象不看本質的毛病。

我們相信，在党中央和省委的領导下，全区党員一定能够接受这一事件的深刻教訓，更紧密的团結起来，發揚革命朝气，团結广大人民为促进和完成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事业而努力奋斗。

中共安徽省委监察委員会
对于右派分子戴岳的处分决定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四日）

戴岳，男，四十四岁，江苏宿迁县人，地主出身，旧职員成份。一九三七年入伍，一九三八年入党。历任科长、办事处主

任、行署秘書处长、文教处长等职。現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省文联主席（党組書記）。

据揭發証明戴岳有如下反党事实

（一）安徽省文联以戴岳为首結成一个反党集团，有組織、有計划地进行反党活动。戴岳在“三反”运动中受处分（撤銷工作）后，認为是党对他的“伤害”，一直怀恨在心；一九五六年省党代大会未被选为省委委員，認为“个人政治前程从此定局了”，反党情緒不可遏止，說給他文教部副部长是“掛名”的，把省委看作为“是非之地”。由于他怀着个人野心，对党不滿，蓄意把文联造成他的独立王国，先后籠絡重用十几个有严重政治問題的分子（如反革命分子彭拜、殷乘兴，叛徒吳文慧、罗秋帆，胡風分子张禹等）作为他的心腹。一九五七年三月五日安徽日报發表了林洛里同志批評“江淮文学”編輯部資产阶級思想作風的文章，戴即認为是对他“攻击”，乘机率領反党分子王影、錢鋒、罗秋帆等，公开地进行了一系列反党活动。他造謠煽动說：“安徽日报發表批評‘江淮文学’的文章是省委叫写的，这是省委存心‘背对背’地搞文联”。又对他的反党集团核心分子們說：“党的文学事业遭到了‘攻击’，动員‘有党性、有魄力’的站出来”，並說：“有来无往也不好啊！”当即提出三点指示，以‘坚持工作，坚持检查’为幌子，利用‘反批評’向党猖狂进攻。他还責备反党集团分子‘行动迟緩，綱領不明确’，並且为他們作具体分工：錢鋒“包打官司”，王影核对和收集材料，石青利用“江淮文学”發表反党文章。王影等向中央写信誣告省委时，戴岳利用党組書記名义对他們說：“党組支持你們”。同时，派专人守住电話机打电話，催逼报社發表反党集团分子写的“江淮文学”編輯部假检查和王影的“抗議書”，並揚言“报社不發表就關到报社大門上去”。他还授意王影、錢鋒、石青打印林洛里的批評文章、編輯部的假检查、‘抗議書’上送

中央有关部門和散發到邻省，妄圖[illegible]支持和同情（被支部發覚制止）。省委[illegible]藏岳反党集团的錯誤，曾专門召开了座談会，会上省委作了正确結論，但藏岳仍然繼續进行反党活动，还在省委宣传会議上又指使文联右派分子向党进攻，妄圖推翻省委結論。

（二）攻击省委領导。他制造謠言說：“中央給省委来电报，要省委检查国民党作風，省委正在星夜检查”，“省委违背中央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安徽有收无放！”

（三）鳴放期間，煽風点火向党进攻。他在戏剧界、美术界座談会上公开号召右派“倒苦水”。把原决定参加座談会的人員，随时更动，減少党团員和积極分子，致右派分子在会上大放毒箭。当話剧团右派分子进攻猖狂的时候，他暗示話剧团可以用选举方法，选举一个非党副团长。反革命分子曹野（現判五年徒刑），在鳴放期間向藏岳說肃反“冤屈”了他，要告状，藏岳表示支持，並在其他人面前說曹野是百分之九十几的“好人”。

（四）反右派斗爭开始时，向右派洩露党的机密，暗示右派分子退却。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同志在地市委書記会議上作了关于如何开展反右派斗爭的报告，藏岳听了报告回到文联以后，即在有党內右派分子参加的文联的党內会議上作了全部传达，意圖提示右派分子收兵。

（五）反对农业合作化和“三改”措施。他在下乡工作时，只喜欢听坏的，不喜欢听好的，說：“成績一眼都看尽了”，又捏造說：“都說劳模张会庭是办社的旗帜，其实他們社里問題最多，人鬧吃、牲口沒料”，“怀远县重社群众打办社的幹部……”；对抗旱种麦他認为是“劳民伤財，得不偿失”；对双季稻極为反对，認为“不合算”。

从上述材料說明：藏岳出身于反动剝削阶級地主家庭，参加革命后，虽受党的多年教育，但其資产阶級思想未得到改造。由于其生活上腐化堕落曾犯过几次严重錯誤，受到党內两次处分，而

他沒有从中吸取教訓，改正錯誤，反而認为党对他“打击”，个人野心不能得逞，即长期与党离心离德，鬧对立，最后走上反党道路，完全墮落成为資产阶級右派分子。当其反党面目被揭露后，他百般狡賴，不作检查，最后在鉄的事实面前才避重就輕地作了交代。为了純潔党的組織，經本委研究决定並报省委批准，开除右派分子臧岳的党籍。撤消其省文联主席职务，留用察看。生活待遇由十一級降为十六級。

中共安徽师范学院委員会对于右派分子方向明的处分决定

（一九五八年十月五日）

方向明，男，现年五十岁，安徽太平县人，家庭出身佃富农，本人成份职員，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同年六月参加共产党。从一九五四年起，曾任安徽师范学院院长（党內曾任过党委书記、党委委員）、省人民代表、省政协委員、中共八大代表。方曾于一九二九年参加过国民党，历任国民党县党部幹事、县教育局代理局长、視察員、中学訓导員等职务。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时曾被国民党逮捕，同年十一月又被日伪逮捕。

方向明虽入党多年，但始終对党不忠誠。解放后，屡次拒絕执行党的决議和指示，挑拨离間，破坏党的团結。在大鳴大放时，严重丧失立場，縱容和支持右派分子向党进攻。在反右派斗争中，曾召开数次大小会議，对右派分子方向明进行了斗爭，根据所揭發並經查对属实的材料，方向明的主要反党罪行如下：

一、方向明經常以党內的“教育家”自居，吹噓自己最懂得知識分子的心理，懂得教学，是“內行”，並以此来反对党的領

导。他認为党委不能領导教学，主张“教授治学”。在大鳴大放时，他說：“报上已登大专学校党委制不合适，要加强院务委員会的領导，党委制要考虑。”同时，他积極地改組院务委員会，並把党員幹部从院务委員会中排挤出去。甚至公开要求当时担任党委副書記的高峰同志退出院务委員会。方向明非常討厭別人說党伟大、英明等話，他公然說这是“八股調”。他在审閱科学研究和函授工作計划时，硬要把“在党委領导下进行”等字样删去，公然說：“在党和政府的領导下等字样，是‘党八股’，应当取消”。方向明一向否認党組織的領导作用，在他担任党委書記职务时經常說：“党支部能做什么，人家对党支部的意見不少，党支部有些代替行政，会得罪知識分子。”因此，他坚决不同意支部書記参加有关系科室主任会議。同时还提出“要在党內布置，要支部書記不要在系科里当領导。”方向明極力反对依靠党的力量进行工作，他不仅很少接近党員幹部，而且还害怕党員幹部，他公开对人說：“我怕党員幹部难纒”，因而他反对向省委請求派党員幹部来院工作，但又誣蔑說：“省委宣传部，沒派一个好幹部給我”。

方向明屡次抗拒省委关于迁校和文理分院的决定。一九五四年省委决定将安徽师范学院迁至合肥，他一方面誣蔑：“省委胡搞”、“異想天开”；一方面为了达到其反对迁校的目的，又故意将合肥建校預算扩大到一千七百亿元(旧幣)。一九五六年省委决定文理分院时，方向明表面接受，但回校后立即召开党委会，並在会上說：“他們（省委）不懂，不了解情况，光我一个人說不行，你們也要去提意見。”企圖利用党委的組織与省委对抗。不仅如此，方向明还在群众中公开辱駡：“省里无人，省委不懂，省里的人都是低能”。还說：“教育厅算什么东西，什么都不懂，那一个能搞高等教育，有些事还給我制造麻煩。”更不能容忍的是，他曾对資产阶級教授說：“我們都是山沟里来的，你們是知識分子，說了有用”，“你們大家要說話，要造成輿論”，

企圖鼓动資产阶級知識分子来反抗省委的决定。

二、在大鳴大放时，严重丧失立場，縱容和支持右派分子向党进攻，当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时，方向明縱容和支持艺术科右派分子闹事，同意艺术科右派分子提出的关于"艺术科留在安师是省委本位主义"的謬論，方在艺术科学生代表会上煽动說："你們的意見是合理的，我們支持你們，你們应当多写稿子，要好好写，写出道理来，送到各个报社，特別是安徽日报，以引起各界人士的重視，造成社会輿論"。在方向明的几次煽动和催促之下，艺术科的学生果然写了"我們的意見"一稿分送到各报社，並写了"請願書"送到省委。在方向明的支持和煽动下，艺术科的右派分子还写了"为要求迅速筹組华东艺术师范学院而呼吁"的呼吁書，当这份反动的"呼吁書"在蕪湖新华印刷厂印出时，被市委書記鄭家琪同志發覚，当即打电話給我院党委，不要讓他們發出，並将反动的"呼吁書"送交我院党委处理。当时，方向明堅不接受，並說："这样会造成被动"，因而这份带有極大煽动性的反动"呼吁書"就被散發到全国各高等学校去了。

当省委传达了中央关于"抓紧时机大鳴大放"的指示以后，党委分工要方向明主持理科的鳴放座談会，他抗拒执行，故意拖延，后經党委一再督促，他才被迫召开了一次仅两小时的座談会应付了一下，还說是"理科不問政治，提不出意見。"当物理系总支副書記要方动員大家对党的方針政策提意見时，他說："那怎么能講，这不是会叫人家說放長綫釣大魚嗎？"結果使理科的牛鬼蛇神沒有徹底的暴露出来。

方向明还極力支持右派向党进攻。化学系右派分子李晟的極其反动的"十六条大綱"貼出后，方向明賞揚說："很好，你这个不錯，最好能把它写得更具体一些。"当右派分子王国斌、吳聊高借口沒有發"請柬"，搗散了鳴放座談会后，方向明則千方百計的安慰右派分子，並曾两次責令党委办公室秘書向右派分子

检討、道歉。当右派学生要求停課鳴放，方向明不仅鼓动学生贴出"要求停課鳴放"的大字报，同时还拒絕經过党委決定，在院务委員会上通过的鳴放与学習工作两不誤的布告上签署院长的名字。他甚至把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与在历史上党領导下的革命的学生运动相提並論。

在反右派斗争开始后，方向明当时身为党委書記、院长，不但拒絕参加斗爭，整日关門睡覚，不聞不問，連电話都不接，而且还千方百計地破坏反右派斗爭。他曾經对别人說："反右派我很躭心，不要把人家說几句話，就当成右派，我院知識分子都是教書的，那里能造反呢？他們（指党委）又在搞什么反右派斗爭，将来一定又象肃反那样糟。"同时，他还經常刮阴風，散布一些"斗爭过火了"，"斗不好，放下来算了"等冷言冷語，企圖使右派逃避斗爭。

方向明不仅包庇右派，拒絕参加反右斗爭，而且还極力趁机吹嘘自己，打击别人。当右派分子猖狂进攻时，方向明則幸災乐禍地打长途电話向省委报告說："現在学生鬧的很兇，学生对他們（指其他党委）提的意見很多，就是对我个人还好些，沒有什么意見。"在反右派斗爭取得了伟大胜利以后，他不仅不检查自己支持縱容右派向党进攻和破坏反右斗爭的錯誤言行，反而恬不知耻地在省委領导面前假报功劳說："在右派进攻时，只有我挺身而出，×××縮头了。"其实真正縮了头的，支持和縱容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正是方向明自己。

三、方向明極力誣蔑农业合作化，否定三改成績，夸大肃反缺点，反对文字改革。方向明在参加"八大"会議从北京回来后，曾造謠說："北京城外的农民因災荒生活很苦，曾拥到城里鬧过事，看到东西就搶着吃，以后被搞走了。"还說："无为一带农民生活很苦，因为三改沒有改好。这样下去共产党很危险，三改的作法是值得研究的。"他根本不承認农民生活有了改善。

方向明身为党委書記、又是五人小組組长，不仅不領导伟大

的肃反斗争，反而有意夸大肃反缺点，与右派分子一唱一和，要求平反。他說："肃反扩大化了，一下子集中了一百多人，超过中央所指示的百分数"；"集中学習的方式对知識分子不适合。"在肃反工作取得伟大胜利后，他对一教授說："肃反搞得过火了，当时我就想不通，不过当时我不敢講，講了会不得了。"他甚至公然在理科教师座談会上說："毛主席提出有反必肃，有錯必糾，在我院主要是糾正錯誤平反的問題。"

方向明也反对文字改革。他說："拉丁化，簡直是瞎搞，中国文字有几千年的历史，那么容易，日本鬼子改了几十年都沒有成功。"甚至还造謠說："郭沫若也反对文字改革。"不仅如此，方向明还經常散布一些不利于国际团結的言論，当有人看了苏联画报后，羡慕和贊揚苏联人民的幸福生活时，方說："你們太天眞了，这是宣传騙。"又曾說："在匈牙利和波兰事件后，苏联威信大大降低了，后来苏联两顆人造衛星上了天，才挽救了自己。"

四、方向明在政治上一貫右傾，不参加历次的政治运动，堅持資产阶級办学观点，反对作政治思想工作，一向主张办学要"安安静静，不要人为的忙乱。"他說"学校里主要应当是靜，一个接着一个（指政治运动）怎么能行。"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在实际上他都沒参加。同时他还經常說："在运动中做积極分子容易，在工作中做积極分子难。"

方向明很不願意参加党的会議，他对省委和中央召开的各种会議都表示冷淡的态度，有时便借口"有病"，"身体不好"或說"学校很忙"来逃避会議。即是参加了会議，回校后也是很少传达。方向明从不願参加党的組織生活，几年来只参加一次小組会；也不願看党刊，甚至公然說："我那有这些时間看那些东西。"

方向明特别欣賞"士为知己者死"的論調。他說："知識分子就是这样。"他对知識分子一味迁就，不講原則，甚至說：

"这些人搞翻了，他們不幹，你去上課呀！""学生是人家教出来的，学生会听他們話的，会罢課鬧事的。"同时，方向明一向坚持資产阶級办学路綫，反对做思想工作。他認为学校应当强調法制，否認政治思想工作的作用。

五、方向明經常玩弄两面派手法，作風極不正派，經常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挑拨离間，包庇坏人坏事。他經常吹嘘自己是"专家""內行"，並以"方博士"自居；而对其他的領导幹部則肆意打击、誣蔑。他經常說这个不行，那个不行，都不懂知識分子心里，游击習气太重，脾气太坏；只有"我懂得知識分子的心里，所以他們都听我的話，教师發生了問題，只要我一句話，就可以解决問題。"甚至他还不知羞恥地說："由于我懂得知識分子心理，教师都同情我，所以右派进攻时，我沒有遭到攻击。"

方向明經常玩弄两面派手法，把自己放在机动的位置上，开会时，不發言，不表态，平日工作又極不負責，經常关門睡覺。当工作做好了，有他的功劳；当工作沒有做好时，他就以第三者的面孔出現，指手划脚，評头品足，說这也不知道，那也不知道，都是他們（指其他党委）搞的，推卸責任，嫁禍于人。同时，方向明还經常挑拨离間，破坏党委团結。

方向明一向縱容和包庇其爱人刘文（右派分子）为非作歹。在方向明的包庇縱容下，当总务处沒有給刘文配备沙發，刘便破口大駡；刘文在調动工作时，还私带亲信幹部，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方向明对其爱人刘文这些行为，不仅不加批評，反說："刘文有她自己的群众基础"，"刘文可厉害哩！在皖南区党委工作时，除步新同志外，其他任何人都无可奈何她"。方向明还經常拉攏一批思想落后和政治上有問題的人，作为自己的亲信。他曾千方百計为反革命分子謝汝鎮（現已判刑，緩期执行）增加工資，曾亲自乘汽車登門拜訪反革命分子陈鹏（現控制使用），並說："我是代表党来訪問你，来安慰你。"同时还对别人說：

"安师人情实在复杂，我的一些朋友，到我这里很痛苦，鬼鬼祟祟都不敢出門，等到沒有人时，才敢出門"。

此外，方向明在生活上也是極其腐化的。他一貫矫柔做作，表面上把自己打扮成为生活朴素，廉潔奉公的正人君子；而实际上曾盗窃公家大批圖書，用公家的款子給自己买收音机。平日对保姆極端苛刻，甚至一个月換五、六次保姆。更卑鄙的是他經常用公款購买"丙酸睪丸素"，以刺激其性的生活，还經常打嗎啡針。

在斗爭中，方向明極不老实。在省委扩大会上，为了挽救他，省委和学校負責同志曾几次找他个別談話，要他检討交代，但他却一概拒絕，不肯检討，甚至要党組織派一个人帮助他写检討；繼則装病、不吃飯，以示抵抗。回校后不仅不老老实实交代，检討自己的錯誤，反而进行活动，与党对立，並說："我活了五十岁，今天才如梦初醒，我心也寒了。""反党么！現在又不是我一个，大头脑多得很呢！"，还說："我是无所謂的"，以此来表示他的滿不在乎。同时，他还布置其爱人刘文到其亲信××家中說："老方回来了，他們搞他，我要告到中央去。"又說："你們与我們接近較多，講話要留意，要当心！"当省委批准划为右派，对其展开斗爭时，起初他拒絕参加，甚至蛮横的說："就是你們把我丢到水里去，我也不参加。"；以后勉强参加了，又借口有病拒絕检討。經批評后，他写了的所謂"交代"，仍拒絕交代自己的思想动机，不肯进行思想批判。在核对材料时又百般抵賴。

根据方向明的犯罪事实及其一貫顽固的态度来看，方向明不仅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老右派，而且也是一个極右分子。

为此，根据中央八屆三中全会关于处理党內右派分子的原則，經院党委討論，並报請省委和中央批准，决定开除右派分子方向明的党籍，撤消其一切职务，留用察看（由9級降为14級），另行分配工作。